

FLC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 第4卷 第2期 | (总第12期) | 2020年6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4卷 第2期 | (总第12期) | 2020年6月 |

主 编: 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 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行主编: 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辑部主任: 任海燕 Managing Editor: Haiyan Ren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马歇尔·布朗 美国华盛顿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克劳德·劳森 美国耶鲁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布鲁斯·罗宾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安·海尔蒙 英国卡迪夫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劳瑞·沙耶尔 湖南师范大学

Editorial Board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shall Brow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Claude Rawson, Yale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ngyi C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ruce Robbins, Columbia University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n Heilmann, Cardiff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auri Scheye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主 管: 湖南省教育厅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4366 海外发行代号: QR9393
编 辑: 《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1536/H 国内发行: 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邮 箱: jflc@hunnu.edu.cn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代号: 42-380
地 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出版日期: 2020 年 6 月 28 日 整体设计: 周基东
电 话: 0731-88873041 定 价: 28.00 元 排版制作: 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 (CNKI) 收录, 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 CN43-1536/H* 2020 *q* 16 * 160 *zh*P*¥ 28.00 * 3000 * 16 * 2020-6

目 次

非洲文学专栏

- 001 主持人寄语：非洲文学研究专题 朱振武
- 002 身处地狱，心向天堂——索马里小说家努汝丁·法拉赫《连接》的创作发生 朱振武 刘雨轩
- 010 被囚禁的反讽者——《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的反讽研究 陆纯艺 冯德河
- 017 “艾拉出走”背后——戈迪默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中的现实关怀 潘尚瑞 蓝云春
- 025 《再也不得安宁》中的饮食碰撞与文化杂合 肖开提·开力 卢敏
- 032 论当代非洲文学对外国文学课程的补充与拓新 段静 李曾琦

文学文化研究

- 040 谈《白噪音》中现代超市的社会心理意义 李锋
- 048 论小说《地下铁道》文学符号的历史文化隐喻 林莉
- 059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物之“踪迹”与主体性之解构研究 兰秀娟
- 069 困境与超越——跨民族主义视域下《穷乡僻壤》之种族政治探析 陈天然

翻译研究

- 079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的需求分析与人才培养 郭聪 杨承淑
- 09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设计与实施 王珍珍 陶友兰
- 105 沙博理小说翻译中女性话语的创造性写作 任东升 段杨杨
- 114 文本杂合与零翻译 王雪明 李澜新

语言学研究

- 124 “一带一路”背景下阿富汗语言政策演变及启示研究 郭建荣
- 133 巴基斯坦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研究 贾春燕
- 144 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的习得影响研究 陈敏哲 侯芳 钟峰婷

Contents

- 001 **Zhenwu Zhu** African Literature
- 002 **Zhenwu Zhu, Yuxuan Liu** Living in Hell, Longing for Heaven: The Creation of *Links* by Somali Novelist Nuruddin Farah
- 010 **Chunyi Lu, Fengde He** The Imprisoned Ironist: A Study of Irony in *Devil on the Cross*
- 017 **Panshang Rui, Yunchun Lan** Behind “Aila’s Left”: Realistic Concern in Nadine Gordimer’s *My Son’s Story*
- 025 **Xiaokaiti Kaili, Min Lu** Food Collision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No Longer at Ease*
- 032 **Jing Duan, Zengqi Li** On the Supplement and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to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
- 040 **Feng Li**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odern Supermarkets in *White Noise*
- 048 **Li Lin** The Literary Metaphors in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 059 **Xiujuan Lan** A Study of the “Trace” of Things and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A House for Mr. Biswas*
- 069 **Tianran Chen** Dilemma and Transcendence: An Analysis of the Racial Politics in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ism
- 079 **Cong Guo, Chengshu Yang** International Medical Language Service Needs Analysis and Talent Training
- 092 **Zhenzhen Wang, Youlan Tao**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 105 **Dongsheng Ren, Yangyang Duan** Sidney Shapiro’s Creative Writ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Female Discourse in Fictions
- 114 **Xueming Wang, Lanxin Li** Textual Hybridity and Zero-translation
- 124 **Jianrong Guo**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Language Policy in Afghanista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133 **Chunyan Jia** A Study of Language Ecology and Language Policy in Pakistan
- 144 **Minzhe Chen, Fang Hou, Fengting Zhong** Effects of the Pre-emptive FoF Instruction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English Simple Past Tense

FLC

非洲文学专栏

主持人寄语：非洲文学研究专题

◎ 朱振武

非洲文学当然指的是非洲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认识到了非洲文学的重要性，相关成果也比较可观，但这些多是在西方话语统摄之下，而不是从非洲本土视角出发。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涵盖了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但始终没有对早已跻身世界文学并且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给予足够重视。

我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的零星译介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时期，相关研究则更加晚近，基本上与改革开放同步，特别事新千年以来，中国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在科研项目、学术专著、译著、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章方面收获颇丰，但立足中国文学文化，对非洲英语文学的肇始、发展、源流和流散谱系的研究明显欠缺，而系统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和教学更是处于缺位状态。

这里的“非洲文学研究专题”共收录了五篇相关论文，前三篇对非洲文学作品进行细读细析，从文学、美学、文化和比较的高度对作品进行深入解读，考察非洲文学的独特文化蕴涵、审美机制和创作主旨，考察其独特性和辨识度。《身处地狱，心向天堂——索马里小说家努汝丁·法拉赫〈连接〉的创作发生》对索马里作家法拉赫的创作进行了原创性研究，是研究索马里文学的重要成果；《被囚禁的反讽者——〈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的反讽研究》对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的小说中的反讽艺术及其深刻隐喻进行了诠释；《“艾拉出走”背后——纳丁·戈迪默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中的现实关怀》对南非代表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戈迪默小说中的现实关怀与美好希冀进行了解读。

《〈再也不得安宁〉中的饮食碰撞与文化杂合》则另辟蹊径，从饮食文化出发对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代表作进行了另类分析，从中揭示出西方文化对尼日利亚传统文化的渐次瓦解和吞噬，观察尼日利亚新青年在两种文化碰撞下的抉择、思索与探求。《论当代非洲文学对外国文学课程的补充与拓新》对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中非洲文学教学的缺位进行了探讨，对其重要性、必要性和拓新意义进行了论证，是一篇很有当下意义的文章。

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国运长盛不衰的秘诀在于善于融合和汲取其他文明的精髓。非洲文学研究特别是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及其教学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异域文学文化养分，对于繁荣我国文学文化、滋养中华文明大有裨益。这也是这个栏目里的文章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身处地狱，心向天堂

——索马里小说家努汝丁·法拉赫《连接》的创作发生

◎ 朱振武 刘雨轩

内容提要：法拉赫是当代索马里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家，在其小说《连接》中，他一方面借主人公吉布勒赫之眼，展现了一幅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索马里社会图景，并对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之一宗族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和平的美好向往，同时力图通过构筑新型的社会关系，打破并重建“连接”。《连接》体现了法拉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理想探寻。

关键词：努汝丁·法拉赫 《连接》 索马里文学 非洲英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I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0)02-000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Title: Living in Hell, Longing for Heaven: The Creation of *Links* by Somali Novelist Nuruddin Farah

Abstract: Nuruddin Farah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contemporary Somali literature. In *Links*, Farah shows the broken and devastated Somali society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protagonist Jeebleh. He exposes and criticize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social problems, which is the clanism. Furthermore, he expresses his strong longing for peace in the novel and tries to break and then reconstruct the “links” by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relations. This novel reflects Farah’s deep concern and ideal explo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his country as an intellectual.

Keywords: Nuruddin Farah, *Links*, Somali literature,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Authors: Zhenwu Zhu,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Yuxuan Li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努汝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 1945—)是当代索马里文学的代表作家。作为致力于同世界沟通的索马里本土作家，法拉赫用在本国并不常用的英语进行创作。他阅历丰富，思维活跃，擅长采用扎根于本地的“都市化写法”(颜治强 275)，作品题材广泛而多样，主题明晰而具有特色。法拉赫的长篇小说通常以 20 世纪的索马里为背景，深入索马里严峻复杂的社会现实，主题多涉及“国家、宗族和个体的身份问题，女性在非洲社会的地位问题，以及人权与自由同专制的斗争”(Thiong'o 716)。截至目前，法拉赫已发表十三部长篇小说、五部剧作和一部非虚构著作，获得过英国、瑞典、津巴布韦、法国和美国的多种文学奖，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法拉赫以系列三部曲闻名，迄今为止，已经完成了三个三部曲系列小说，第四个三部曲也正在创作中。他的代表作《连接》(*Links*, 2003)是第三个三部曲“昔日缺陷”(Past Imperfect)系列中的第一部。在这部小说中，法拉赫将自己的亲身经历置换到作品主人公身上，从一个流落异乡多年的归国侨民的视角出发去记录 90 年代索马里内战下的社会现状。小说站在了本土“外来人”的制高点上，审视并反思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思想价值。

一、法拉赫的创作发生：“连接”从何而来？

法拉赫 1945 年生于意属索马里兰的拜多阿，少年时代因战乱奔徙国内各地，青年时期先后在印度和英国求学。两次求学的间隔中，他出版了处女作长篇小说《来自弯曲的肋骨》(*From A Crooked Rib*, 1970)。这部采用女性视角书写女性所受压迫及其反抗的小说，是索马里的第一部英语文学作品，法拉赫也因此声名鹊起。但他随后的创作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当时正值索马里革命时期，执掌政权的是西亚德(Muhammad Siad Barre)及其独裁政府。法拉赫的剧作《真空中的匕首》(*A Dagger in Vacuum*, 1970)被认为“不够革命”而遭到禁止，而《来自弯曲的肋骨》也因为被批评为充满小资情调，无视国家命运，本人遭到当局传讯(鲍秀文、汪琳 311)。接着，因第二部长篇小说《裸针》(*A Naked Needle*, 1976)触及到专制统治，被政府直接视为叛国，法拉赫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活。他先是客居意大利、美国和西德，后又回到非洲辗转于尼日利亚、冈比亚、苏丹、乌干达和南非等地，从事写作和任教。1996 年，独裁政府垮台后不久，法拉赫重归故土，回到了索马里，然而包括索马里在内的东非地区时局仍不稳定。1999 年，法拉赫举家搬迁至南非的开普敦，继续在文学中守望祖国。

可以说，法拉赫半生皆在颠沛流离中度过，是一位流散作家。政治的原因导致法拉赫无法立足于本国，但远隔重洋的他始终笔耕不辍，总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用纸墨挥洒爱国热血。

纵观其作品，他始终将索马里作为书写的对象，并“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以及亲视的历史展开淋漓尽致的描摹”（朱振武、袁俊卿 143）。他创作生涯中的首个三部曲名为“非洲专制变奏主题”（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an African Dictatorship），从这个标题便可看出，其目的是批判西亚德政府的统治。第二个三部曲“血红的日头”（Blood in the Sun）系列则聚焦于“分裂”这个主题，表面上讲述的是普通人之间亲情爱情、家庭血缘，实际上折射出对国家、部落和个体身份认同的探讨，以及对父辈所传下来的宗法传统和国家之间伦理道德的深刻思考。第三个三部曲“昔日缺陷”系列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内战时期的摩加迪沙，通过几个命运相互关联的归国移民的视角去展现军阀混战中的索马里。关于内战，法拉赫曾表示，越来越多的海外侨民回到索马里参与城市的重建，而他想要观察人们是如何度过内战的：“他们如何表达自我，如何收集破碎的自我，以修复受损的记忆，治愈伤痛。”（Appiah and Farah 58）于是，社会的破败、边界的争端、政治的冲突、他国的干涉、宗教的叛乱和人情的纠葛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同时也在无形之中与前面两个三部曲实现了主题上的一脉相承，是对前两者的总结和归纳。

《连接》是“昔日缺陷”系列的第一部，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主人公吉布勒赫几乎就是法拉赫本人的翻版——曾留学意大利，二十年前被独裁政府视为“叛国”而下狱，后被秘密遣送出境流亡美国。吉布勒赫的密友拜尔也受到牵连无故被囚二十年，最终因政府倒台才得以趁乱逃出监狱。吉布勒赫本以为时局稳定下来便乘机回国祭拜母亲，却不料目睹了军阀混战中的摩加迪沙：暴徒滥杀无辜、人民衣食无定、外国军队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拜尔天使一般的侄女拉丝塔与其玩伴一同失踪，下落不明，二人亟需找回她们。而事实上，当结局最终揭晓，正是拜尔同母异父的兄弟、生性冷酷多疑而又残忍虚伪的高级军官卡卢沙绑架了拉丝塔。小说通过吉布勒赫的眼睛，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90年代索马里社会图景，对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之一，即宗族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表达了对和平的不懈诉求与美好向往，同时又力图通过构筑新型社会关系，打破个中“连接”，重建新的“连接”。整部小说体现了法拉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理想找寻。

二、地狱的泥沼：冷峻复杂的索马里社会现实

90年代的索马里，随着西亚德政权的垮台，整个国家实际上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南北两方的军阀将首都摩加迪沙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武装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打着人道援助之名行军事干预之实。同时，部落的分裂强化了固有的宗族主义思想，激化了部落间的矛盾，也加重了局势的不稳定。此时的索马里笼罩在一片宛如地狱般的内外交困之中。这些均在《连接》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法拉赫从一开始就没有隐瞒要将摩加迪沙揭露为当代地狱的意图。《连接》共有四部分，每部分都设有题记，而这些题记皆出自但丁《神曲》的地狱篇。他有意将死亡之都摩加迪沙比喻为《神曲》中的地狱，开篇所引用的第一句题记便来自《神曲》第三章，但丁跟随维吉尔来到地狱之门时所见到的门上骇人的文字：“由我这里，直通悲惨之城。由我这里，直通无尽之苦。由我这里，直通堕落众生。”（37）但丁笔下的地狱阴森可怖，充斥着凄惨和罪孽的灵魂，几乎与当时的索马里如出一辙。“吉布勒赫的索马里之行与但丁的地狱之行平行发展”（林晓妍、卢敏 116），小说的情节进程也随着其归国行动线索缓步推进。阔别祖国二十年的他终于踏上了国土，但从那一刻起，这片土地上的蛮荒混乱、深重罪恶便如同那九层地狱图卷般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摩加迪沙本是吉布勒赫所深爱的城市，但故乡并非他记忆中那样的宁静美好，而是因战乱变成了“毁灭与恐惧的中心”（刘易斯 242）。小说中这样描写：

摩加迪沙在他面前伸展开来，他颤抖的手仿佛一触可及，生存在可怕痛苦中的人们的家园。一位诗人可能会把索马里形容为一艘没有英明船长掌舵而在暴风雨中摇摇欲坠的船。另一位诗人可能把这里描绘为一片遭到损毁和废弃，女人变成寡妇，孩童沦为孤儿，病弱无人照料的土地。而第三位诗人则会把它描述成一个悲剧国度，被那些贪得无厌渴望攫取更多财富和无限权力的疯子们所洗劫。诸多被无谓收割的生命，诸多徒劳无用的暴力。（Farah, *Links* 15）

而吉布勒赫自己的身边也危机四伏，他眼睁睁地看着携带枪支的年轻民兵如同匪帮一样四处横行，光天化日之下随意射杀路上的无辜行人；他下榻的酒店房间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翻查；他和朋友拜尔的行动与对话似乎也被卡卢沙所限制和监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法拉赫有意把主人公吉布勒赫设定为一位研究但丁的学者，如此一来小说内外相互支撑映照，他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本没有经历过这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一切，但当他在《神曲》中所读到的地狱景象切切实实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眼前时，是否更加触目惊心呢？而吉布勒赫无法置身事外，正如西默斯对他所说：“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不由自主被卷入其中，无可避免地成为这个国家麻烦的一部分。”（215）是的，他早就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

小说题名《连接》，具有多重涵义，与故事中所呈现的地狱般的景象具有密切关系。要理解它，首先要对索马里的社会制度有所了解。索马里是游牧社会，没有政治集权传统，氏族是最大的有效政治单元，而父系血统则是索马里社会组织的固有原则，它同政治契约相结合，成为约束氏族成员的行为准则。超越氏族范围的最广泛的亲族联系就使一些氏族联合成部落，这些部落组成了传统社会中的索马里民族。英文中的 link 有“连接”“联系”“关联”之意，使用的是复数而非单数，恰恰暗示了索马里社会不同氏族之间、氏族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

的血缘与亲属联系。宗族主义导致了南北军阀所代表的不同氏族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如今这种战乱不休、社会分裂的根源之一。同一部落的人纵然素不相识，却受制于其中错综复杂的血亲或从属关系而被迫承担一些并无意义的“义务”。

这种宗族主义的某些思想影响着年轻人，并深刻地展现在小说之中，比如四处可见的配枪民兵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心智尚未成熟却干着烧杀抢掠之事，显然是受到了部族的支配和影响。吉布勒赫的母亲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彻。在发现丈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赌徒后，她毅然带着儿子出走，同时避免儿子与氏族产生联系，并总是教育他要成为一个“不附属于其他任何人的”（Farah, *Links* 96）。果然，身为教授的吉布勒赫多年后衣锦还乡，与他母亲并不相熟的部落长老们立刻出现，冠冕堂皇地请他出钱资助氏族的民兵，被他一口回绝。部落族长便派人刺杀他。这也恰恰印证了母亲曾对吉布勒赫的告诫：“（你的族人）必将成为你最凶险的敌人，如果你不选择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捅死你。”（96）宗族主义的伪善一面在小说中暴露无遗。

法拉赫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将该三部曲的主人公皆设置为归国侨民，正是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生活在索马里的人们饱受专制统治和战乱纷争之苦，因为受制于宗族而互相残杀，双手沾满了亲人的鲜血。而这些归来者在道德上更加干净，他们可以从客观的视角带着第三只眼睛审视国家的过去与现在。然而，当他们在这里待得越久，便愈越发身不由己，因为只要身在这片土地，就不得不拿起武器参与战斗。这也从反面证实了这种宗族主义后患之深。

三、天堂的光辉：追寻与探索，打破与重建

众所周知，《神曲》是一部喜剧，穿过“地狱”和“炼狱”，但丁历经灵魂的锤炼和洗礼，最终步入了天堂，迎来曙光。同《神曲》一样，《连接》的前半部分尽管被阴霾所覆盖，但基调始终是昂扬向上的，结局也很圆满，可以说吉布勒赫的索马里之行实质上是一场追寻与探索之旅。法拉赫在忠实书写国家历史现实和深重苦难的同时，总是心怀希望，向往光明。他在作品中力图通过打破旧有的人物关系、构建新型的人物关系来为国家前途命运谋求出路，充分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家国情怀。

贯穿整个小说主线的是寻找拜尔下落不明的侄女拉丝塔。她的形象极为关键，但鉴于她的失踪，读者只能从他人口中了解她。拉丝塔是拜尔的妹妹之女，出生时名字叫“拉琼”，在索马里语里意思是“希望”。她总是很安静，吸引着人们并安抚着他们，在她的身边能够不受到伤害，于是她便成了和平的象征。除此之外，拉丝塔很早慧，有着出众的语言天赋。这些独一无二的特质使得报纸和媒体将她称为“奇迹”。在拜尔看来，侄女拉丝塔仿佛“就是为了因

国内种种冲突而四分五裂的社会而生”（Farah, *Links* 302）。有评论指出法拉赫将拉丝塔“类比为《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预示着索马里的美好未来”（林晓妍、卢敏 116）。由此表明，拉丝塔的失踪实际上暗含着对索马里和平之陷落、希望之缺失的隐喻，吉布勒赫等人寻找她的过程自然也是对和平的探索。他们的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正是因为不愿放弃对和平安宁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小说的末尾，卡卢沙莫名身亡，而拉丝塔毫发无损归来，这样的安排似乎暗示了邪恶势力只是一时占了上风，希望终究会在波折之后显现。不言而喻，此一结局正是寄托了法拉赫尝试与光明未来相“连接”的美好愿景。

除了对和平的向往，《连接》中的人物关系也同样引人注目。从真正的血缘角度来看，卡卢沙和拜尔同母异父，当为真正的兄弟。实际上，由于卡卢沙和吉布勒赫的父亲属于同一部落，他们两人被认为是同族，而拜尔却成了“外人”。但小说中，吉布勒赫却恰恰和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拜尔成了莫逆之交。而从人物性格角度来看，故事也呈现了另一番景象。卡卢沙心狠手辣，残忍尚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少年时杀死虐待自己的继父，成年后身为高级官员，但背地里却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同时又为巩固政权绑架拉丝塔，这实际上就是《神曲》里的“谎言之父”（father of lies）——魔鬼的化身。拜尔则与卡卢沙截然相反，他温和善良、乐善好施，为穷苦困顿无家可归的人们开办医疗救助站和流民栖容所，努力安抚着一方百姓。吉布勒赫更是理智与道德的使者，作为一个有着索马里血统却深受欧洲文明浸润的归国侨民，他在所见所闻中不断对国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传统进行自省与反思。这正是作者法拉赫的自身写照。通过两方的鲜明对比，不难看出法拉赫试图在小说中打破固有的以血缘和氏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交结构，要在一种更高的“认知和觉悟”（颜治强 303）的层面上构建出新型人际关系。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各种新型联系。酒店经理阿里曾向吉布勒赫坦言，即便自己拥有在英国取得的酒店管理学位，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管理酒店，但他依旧选择回到索马里，只因此处是祖国。法拉赫甚至借其口以言志：“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儿子，我们都属于它，你和我。我无怨无悔，一点也不。”（*Links* 39）吉布勒赫的朋友、联合国雇员、爱尔兰人西默斯，拥有宽广的人道主义情怀，将索马里的和平与发展当做自己的事业，坚持与吉布勒赫并肩同行。这些仁人志士与这片土地的“连接”由此更加紧密。当然，不能忽视的还有两位女性角色，即吉布勒赫的母亲和拜尔的母亲——她们敢于同自己的丈夫离婚，断绝与他们氏族的联系，依靠自己的力量相互扶持。尤其是拜尔和卡卢沙的母亲，她是一位有主见的女性，从不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说要去意大利学习接生技术成为助产士就毅然决然地去了。她自力更生，拒绝放弃工作，拒绝做专职太太。她在丈夫想要纳妾时能够愤然离开，后来又两度再嫁。两位勇于挑战夫权和部族的母亲身上均闪烁着新时代女性的光辉，体现了法拉赫对构建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一次探索。

“伴随着吉布勒赫的回归，小说的标题‘连接’道明了一系列动机。吉布勒赫回到摩加迪沙，是为与祖国重建‘连接’，同时这也是一场自我发现之旅，让他与自己、与那些渴望重建

身体政治的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物们相联系” (Moola 157)。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是无法分割的, 无论相隔多远都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相连。吉布勒赫不远万里归国考察探寻, 在这过程中与故土的人们沟通, 最终得以升华自身。同样, 法拉赫通过记录和书写与祖国建立联系, 在抨击与批判中完成了对国家未来出路的思考与探寻。

政治的原因致使法拉赫流亡海外多年, 但异于时常表现移民生活或流散经历的其他流散作家。从最初的作品《来自弯曲的肋骨》中勇于逃婚的牧女艾布拉, 到对外批评国家集权、对内批评宗族家长制的“非洲专制变奏主题”三部曲, 以及探索国家、部落和个体身份认同问题的“太阳里的血”三部曲, 再到“昔日缺陷”三部曲中归国侨民的对内审视, 法拉赫的小说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书写着母国。他选择用英语创作, 亦是为了将索马里与世界相“连接”。作为索马里第一位英语文学作家,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索马里作家, 法拉赫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一国之文学。正如托尔斯泰因作品中总是深刻揭示出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反映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图景和剧烈的社会变动, 而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样, 法拉赫也曾表示希望在写作中“看到这个世界和我的朋友们, 就像一个人看到一面镜子在另一面镜子中的反射”(“Why I Write” 1592)。世人所知道的索马里是那个连年战乱、至今局势尚未稳定的非洲小国, 但在法拉赫的眼里, 那依旧是他的祖国。他选择用极其写实的态度描摹自己的国民和国家, 把它作为一种使命, “无论何时, 无论何人询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书, 我都会回答我写作是为了我们的后代, (让他们明白) 一个国家的真实历史”(1599)。

法拉赫身上的这种流散和本土的双重特质, 在《连接》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展现。战乱及纷争所造成的地狱般的景象背后, 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法拉赫在挖掘与揭露它的同时, 也心怀希望, 努力去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探索一条可走之路。“一个作家去书写明天, 他期待就是这种明天的到来, 以及拥抱他所书写的明天”(Gray and Farah 134)。历史所带来的创伤固然使得如今的索马里千疮百孔, 但相信这不过是前进道路上必须经历的短暂阵痛, 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 才能迎接美好的未来。身处地狱泥沼, 这是法拉赫的担忧所在, 心向天堂之光, 却是他的抱负所在。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Appiah, Kwame Anthony, and Nuruddin Farah. “Nuruddin Farah.” *Bomb*, no. 87, 2004, pp. 54-59.

Bao, Xiuwen, and Lin Wang, editors.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Famous Writers in 20th Century*.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2016. [鲍秀文、汪琳编:《20世纪非洲名家名著导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Dante, Alighieri. *Divine Comedy: Inferno*. Translated by Guobin Hua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9. [但丁:《神曲·地狱篇》, 黄国彬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Farah, Nuruddin. “Why I Writ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4, 1988, pp. 1591-99.

——. *Links*. Penguin Books, 2005.

Gray, Stephen, and Nuruddin Farah. "Interview with Nuruddin Farah." *English in Africa*, vol. 27, no. 1, 2000, pp. 131-39.

Lewis, I. M.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omali*. Translated by Jun Zhao.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2. [刘易斯:《索马里史》, 赵俊译。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Lin, Xiaoyan, and Min Lu. "Intertextuality of Farah's *Links* and Dante's *Inferno*."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18, pp. 114-19. [林晓妍、卢敏:《法拉赫的〈连接〉与但丁“地狱篇”的互文性》, 载《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3期, 第114-19页。]

Moola, F. *Reading Nuruddin Farah: The Individual, the Novel & the Idea of Home*. Boydell & Brewer, 2004.

Thiong'o, Ngũgĩ wa. "Nuruddin Farah: A Statement of Nomination to the 1998 Neustadt Ju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72, no. 4, 1998, p. 716.

Yan, Zhiqiang. *On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Novel in the East: A Survey of South Asia, West Africa and East Africa*. People's Publishing, 2012. [颜治强:《东方英语小说引论(南亚、西非、东非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Zhu, Zhenwu, and Junqing Yuan. "Diasporic Literatur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Age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A Case Stud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7, 2019, pp. 135-58. [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第135-58页。]

◇责任编辑: 罗辉

被囚禁的反讽者

——《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的反讽研究

◎ 陆纯艺 冯德河

内容提要:《十字架上的魔鬼》是恩古吉在监狱的极端环境中写下的小说,小说一反恩古吉以往真实重述历史的基调,以独立后的肯尼亚为历史背景,以反讽为主要手法,展现了看似荒诞实则真实的独立后肯尼亚社会。通过反讽,恩古吉将真实与虚假、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共同书写进这部小说,充分展现质疑与斗争的反讽精神。这部作品是他挑战权威,批判现实,为民族未来大声疾呼的见证,也是肯尼亚英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 反讽 《十字架上的魔鬼》 恩古吉·瓦·提安哥

中图分类号: I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0)02-001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Title: The Imprisoned Ironist: A Study of Irony in *Devil on the Cross*

Abstract: *Devil on the Cross* is a novel written by Ngũgĩ wa Thiong'o in the prison. The novel does not continue to retell the history as Ngũgĩ's previous novels do. It takes independent Kenya as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rony as its main technique to show the seemingly absurd but actually real Kenyan society. By using irony, Ngũgĩ combines truth and falsehood, justice and evil, light and darkness into this novel, fully demonstrating his ironic spirit of questioning and fighting. This novel is the witness of his challenging authority, criticizing reality and speaking out fo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enyan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s: irony, *Devil on the Cross*, Ngũgĩ wa Thiong'o

Author: Chunyi L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Dehe Fe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Shandong, China.

“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法，但更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法农 8）。作为肯尼亚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原名 James Ngũgĩ）第一部用基库尤语写作的小说，《十字架上的魔鬼》（*Devil on the Cross*, 1981）象征着作家与英语写作告别，转用非洲语言书写非洲文化、担负非洲文明、说出非洲故事，是一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小说。这部小说一反恩古吉以往真实重述历史的基调，以独立后的肯尼亚为背景，以反讽为主要手法，描绘了一场光怪陆离的“魔鬼盛宴”。盗贼劫匪们在黄金山山洞中争夺“最佳偷盗抢劫皇冠”，吹嘘攀比自己如何剥削和压榨民众的血汗，可谓群魔乱舞、丑态百出，极具反讽意味。恩古吉运用反讽，将真实与虚假、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共同书写进这部小说，在人物的演变、情节的反转，以及叙述的不可靠中，揭示了独立后的肯尼亚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在看似轻松的氛围中展现肯尼亚人在独立后的百态人生。

一、反讽中觉醒的女性

在肯尼亚传统的父权社会中，部落中有一定声望的男性组成议会，共同裁定大小事务，而女性没有议事权，一切听从男人的安排。虽然在肯尼亚沦为英属殖民地之后，传统部落社会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一步步走向瓦解，但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即便是在 1963 年民族独立后，肯尼亚妇女依旧无法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在以往的东非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负面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控诉女性在婚姻上的不忠，甚至将她们塑造成部落的叛徒。在恩古吉的前期作品中，也没有出现和男性角色具有相同地位的女性形象。主人公都是肩负民族使命的男性，女性角色不过是在男性角色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一些助推作用。即便是采用多种叙事声音写就的小说《血染的花瓣》（*Petals of Blood*, 1977），女性声音也仅占其中的四分之一，且女性角色旺加从始至终都是一位边缘人物。

《十字架上的魔鬼》以瓦利恩尔这一女性为主人公，讲述了她从逆来顺受到彻底觉醒的成长与斗争之路。最初，瓦利恩尔认为自己累遭逆境的原因是她的黑皮肤，“她曾经不止一次用一种叫‘奥蜜和雪火’的雪花膏涂在自己的脸上，想改变自己的肤色”（恩古吉，《十字架上的魔鬼》10）。然而，她越是排斥自己的肤色和身份，生活给她制造的困难就越多。她在年轻时被富翁诱奸，并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一悲惨遭遇理应让她吸取教训，有所醒悟，但当她碰到自以为是“真命天子”的恋人时，她又将姿态摆得极低，在心里一遍遍暗想“今后一定要好好爱他，对他百依百顺，就是骂也不还口”（20）。恩古吉在描写瓦利恩尔的早期言行时，虽然采用的是客观平静的笔调，只陈述人物的言行，不做任何评价，但透过瓦利恩尔矛盾的言行，作者对她的反讽态度自然地呈现出来。为了反衬瓦利恩尔言行不一、满腹纠结的特点，恩古吉在小说中又塑造了瓦恩噶丽这一女性形象。作为“当年肩扛手提为丛林里的游击战士运送枪支弹药”（47）的茅茅起义者，瓦恩噶丽具有正直、坚毅的品格，她充当卧底前往魔

鬼盛宴以抓捕流窜在内罗毕的强盗劫匪。她心怀国家，心系人民，尽管力量微薄，也依旧愿意为消灭犯罪献出生命。她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反衬瓦利恩孕早期徘徊犹豫、庸庸碌碌的性格，更是为了树立恩古吉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从瓦利恩孕到瓦恩噶丽是女性走向独立的一个过渡。瓦利恩孕渴望拥有白皮肤，对待恋爱中的不平等地位始终都是顺从态度，对社会中的歧视与罪恶也冷眼旁观，不做声也不对抗，这一切都源于她对非洲身份的不自信与不认同。在她潜意识中，黑人就是比白人卑微，非洲女性就应该对男性百依百顺。虽然其独立意识也有觉醒的痕迹，希望凭借自身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且以被辞退为代价坚定地拒绝了做老板情人的无理要求，但是这种意识始终是摇摆不定的，这也造就了她再度被恋人抛弃的结局，甚至让她萌生自杀的念头。然而，在瓦恩噶丽等起义者的影响下，瓦利恩孕不再认为自杀是摆脱人生苦难的唯一选择，也不再涂抹雪花膏追求白皮肤，转而对自己的肤色、智力和心灵充满自信，也认同了非洲女性的身份，并且一反裹足不前的态度，投入国家复兴的伟大事业。

从反讽到肯定，恩古吉书写了这位非洲女性由被压迫和顺从走向觉醒独立的人生经历，但这也不只是为女性独立大声疾呼，更是对整个非洲社会的警示。“在集体无意识中，黑皮肤等于丑恶、罪孽、愚昧、不道德”（法农 150），众多的表达法将黑人与罪孽画上等号，如果非洲人民对自己的肤色与身份产生质疑，甚至为了进入主流而渴望成为白人，那么整个社会就会被自卑情结所笼罩，复兴非洲文明更是无从谈起。西方社会不满足于控制非洲的经济和政治，而是试图入侵所有的文化领域，包括教育、宗教、语言、文化等，以此达到掌控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目的，模糊非洲人民的自我认识和定位。就像恩古吉所说的“真正成为奴隶是在他自己认可了的那一刻”（*Writers in Politics* 12）。恩古吉首次以女性形象作为小说主角，暗示着传统非洲文学中的边缘化女性终将走到文学的中心；又运用反讽手法，警醒非洲女性乃至整个非洲社会正视自我身份，以自信昂扬的态度走到时代的中心，参与到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为消灭剥削与压榨做出贡献。

二、反讽中的质疑精神

译者蔡临祥将《十字架上的魔鬼》称为他翻译过的最好看的一本小说，小说好看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情节的一波三折。恩古吉有意安排了多处反转情节，在出人意料的同时，利用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反差制造反讽效果，既引发读者深思又传达恩古吉的内心想法。肯尼亚在1963年取得国家独立，这对包括恩古吉在内的作家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代表着用文字痛斥殖民主义，对抗西方殖民者的苦难岁月已经过去，人民在抗战文学的熏陶下夺回了国家主权，肯尼亚终于可以在非洲同胞的领导下走向繁荣富强。然而，现实的残酷击碎了作家们的幻想，在《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独立后的肯尼亚社会得到了深度的揭露。农民瓦恩噶丽失去了土地，在内罗毕找工作屡次碰壁，眼看她遇到了一位同胞并很可能得到工作时，非洲同胞却叫来警察以流窜罪逮捕了她。本国合法公民竟然需要在许可后才能在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走动，这

样的规定真可谓匪夷所思。盗贼们在黄金山山洞中大肆夸耀自己压榨大众的事迹，吹嘘如何利用土地买卖、开办学校、参政等方式发家致富，竞相争夺盗窃首领之位。瓦恩噶丽叫来警察抓捕盗贼，却反被警察抓进监狱。穆图里带领的工人和学生起义军也遭到镇压。在恩古吉笔下的后殖民社会中，“事情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有理会变成无理，原告会变成被告”（*Writers in Politics* 185）。财富成为了永恒的判官，将有罪变为无罪，将瑕疵变成美德，把反叛变为顺从，把丑陋变成美丽，以富有程度为准绳，社会毫无公平可言，真理正义无迹可寻。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法律却仍然维护着上层社会的利益，恩古吉以反讽为墨，描画出一幅黑白颠倒的社会图景。

非洲的国家和人民一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奴隶时期、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伴随着三个阶段而来的都是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暴行，从这一意义上讲，后两个阶段和奴隶时期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别，人民不是受到殖民者的压迫就是受到本土上层阶级的剥削。独立后的肯尼亚官僚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比殖民者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具有迷惑性，利用同样的黑皮肤和非洲血脉，他们表面上与人民友好而亲近，实则是西方世界的代言人。西方殖民者看似被赶出了肯尼亚的土地，但实际却在非洲安插了利益集团。相比独立前，西方势力隐藏在更安全的地方，省去了直面冲突的麻烦，却能坐享肯尼亚人民用血肉和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偷盗和抢劫变成了西方世界留给肯尼亚的“财富”，金钱被认为是文明的核心，财富被理解为国家进步的尺子。面对层层欺骗，肯尼亚人民应当如何识破隐藏在虚伪背后的真相，揭开西方傀儡的真实面目，恩古吉以反讽作答，意在发挥反讽的矫正作用。正如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所说：“哲学家们认为，哲学不能没有质疑，同样的道理，真正的生活不能没有反讽。”（338）通过描绘反转的情节，恩古吉打破了读者们所期待的“好人有好报”的理想结局，将好人置于险境，让坏人免罪脱逃，以此体现后殖民社会的险恶与荒诞。对与错、正义与邪恶、黑暗与光明等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在利益与金钱的促使下模糊了边界，甚至可以随意转化。恩古吉不只是利用反讽嘲笑和批判这个是非混淆的后殖民世界，更是为了宣扬反讽中蕴含的质疑与反抗精神。

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在面对后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时，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以为尽力遗忘就能免受痛苦。然而，“如果我们的院子里坑坑洼洼到处是坑，我们只用点枯枝乱草胡乱一盖，然后就可以说没有坑了”（恩古吉，《十字架上的魔鬼》3）？恩古吉在小说开篇就已经否定了这一麻木纵容的处事态度。如果所有人都对肆意横行的压榨视而不见、一味忍让，那么人民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为了让人民能更清晰地看到这其中的危害，恩古吉在小说中又塑造了曼图利亚这一人物形象。瓦利恩尔在前往“魔鬼盛宴”的途中遇见曼图利亚，两人随后成为恋人。曼图利亚是大学里的一名非洲研究员，一心想创作一部融合传统乐器和部族民歌的史诗，成为肯尼亚民族的最强音。但是他出生富有，从未尝过人间疾苦，无法坚定地跟人民走到一起，对国家缺乏强烈的热爱，对隐藏在人民中的寄生虫也没有满腔的仇恨。他在妥协和批判中摇摆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也不敢质疑社会的不公，只想做一名不倾向任

何一方的旁观者。这样的中立态度使他谱写的曲子无法代表群众的呼声和实际需要，更无法诠释整个肯尼亚的民族精神。曼图利亚的中立态度是绝大多数肯尼亚人民的选择，他们是被压迫者，承受着深重的苦难却不敢言说。为了唤醒民众日渐麻木的意识，以质疑的精神反观社会的不公，夺回真正属于人民的主权，恩古吉在小说最后制造了通篇最大的转折，也迎来了反讽的最高潮。曼图利亚和瓦利恩尔历经磨难，即将结婚，就在订婚典礼上瓦利恩尔第一次见到曼图利亚的父亲，却发现他竟然是当初诱奸她生下一子的老富翁。所有的往事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变成过去，只要社会依然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黑暗的势力就将如影随形，对底层人民进行新一轮的欺压和剥削。瓦利恩尔最后用革命者给她的枪杀死了老富翁，这也意味着她与过去曼图利亚式的妥协彻底决裂，她看到的已经不止是骗与被骗、欺压与被欺压、掠夺与被掠夺的两个世界，而是一个充满质疑与反抗的世界——革命的第三世界。恩古吉巧妙地设计诸多反转情节，以出其不意的结局打破读者的预期，利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增强反讽意味，把后殖民社会的荒诞可笑赤裸裸地摆在人民眼前。他以反讽中蕴藏的质疑精神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随波逐流的中立态度不仅无法浇灭掠夺者的气焰，而且还将助长他们的野心，把肯尼亚彻底变为一个群魔乱舞的国家，人民血汗的结晶将成为西方世界不断壮大的养料。因此，只有勇于质疑才能从独立的美梦中醒来，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对抗黑暗的现实，把国家的未来从错误的发展道路中矫正过来。

三、亦真亦假的反讽世界

1977年，恩古吉被任命为内罗毕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乌干达诗人奥考特（Okotop' Bitek）担心恩古吉被肯尼亚的教育及权力机构认可后，就不再有兴趣将肯尼亚传统口头文化加入其作品乃至文学课程中去，也不会再义无反顾地为复兴肯尼亚文学奉献所有。然而，《什么时候结婚要看我自己》（*I Will Marry When I Want*）彻底打破了奥考特的担忧，大批的工人、农民、学生乘着巴士和卡车蜂拥至剧场，争相观看恩古吉这一部为人民写就的戏剧。该剧用基库尤语书写，融合肯尼亚民歌、舞蹈等传统元素，以独立后的肯尼亚为背景，揭示人民的艰难处境。戏剧暗讽肯雅塔（Kenyata）政府，因此遭到禁止，恩古吉因参加戏剧公演的示威活动，未经法庭裁决就被关押进狱。《十字架上的魔鬼》是他在狱中写下的小说，创作过程极为艰辛，只能将文字写于厕所的手纸上。在这样的高压管控和监视下，恩古吉在小说开篇《作者的话》中否认了故事的真实性，他称“书里的故事是臆造的，故事中所提到的人物和地点如伊乌莫罗格、卢瓦伊尼和伊西西里等都是作者的创作，在现实中是没有的”（《十字架上的魔鬼》3）。然而，恩古吉却将伊乌莫罗格置于真正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瓦利恩尔在内罗毕的遭遇真实重现了非洲女性不公平的现实地位。虽然盗贼的发言有涉及开办器官制造工厂、建立奴隶研究园、贩卖空气等荒诞而可怕的内容，但他们利用房地产、土地、教育等方式敛财的行为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恩古吉表面上一再宣称小说的非真实性，但事实上这部作品却与现

实息息相关，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反差带来了情景式的反讽，是作者在政府的监视下所采取的非常手段。《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郭绍虞 63）面对独立后政府的舆论管控，恩古吉的做法与中国古代大臣对国君的“风”法颇有相似之处，用以退为进的曲折之语修饰直白的真相，用亦实亦虚的故事间接地批判社会中的丑恶，嘲笑人物的荒诞想法，在控诉政府不作为的同时也达到了劝说的效果，却不至于落下把柄。作为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恩古吉偏爱反讽的重要原因是他深陷时代的困境，无法直接言说内心的想法，只能以反讽这种间接的方式取而代之，这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除了主动言明小说的虚构性之外，恩古吉利用口头文学创造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整个故事借由一位基康迪舞艺术家（Gĩcaandĩ Player）之口讲述。基康迪是基库尤诗歌艺术的一个流派，诗人们把基库尤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谜题的形式编写进诗歌，通过破解别人诗歌中的谜题，以及将自己的信息编写进复杂的隐喻等方式相互竞争。基康迪艺术主张观众参与其中，跟随艺术家一边唱歌一边解谜，诗人时常将一些隐晦的政治主张藏于谜面之中，等待聪明的观众破解谜题。小说中，恩古吉将基康迪艺术家称作一名“正义的先知”，让他叙述整个故事，“揭开黑暗中隐藏的秘密，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恩古吉，《十字架上的魔鬼》4），而由于基康迪艺术以猜谜形式隐蔽真相，把所有的想法都变成直白浅显却又意蕴深厚的文字，文本中的所有隐含意义都靠读者自行挖掘，叙述者不作任何评价，叙述的真实性也全凭读者自行判断，因此是一名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位叙述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个讽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恶棍们狂喜地毁灭一整个国家的幸福，盗贼的致富方式得到详尽的叙述，细致到每一份充满谎言的办学宣传词都呈现于文本中。此外，他们的每一辆豪车，甚至连早、中、晚三餐的豪华食谱也被一一罗列。恩古吉一方面提醒读者叙述的不可靠，读者无需相信盗贼们的罪行，无需为献出生命的英雄扼腕叹息，也可以怀疑整部小说叙述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耗费笔墨从外观、语言、行动等各方面塑造一个个盗贼形象，同时展现瓦利恩尕从受尽欺压到彻底觉醒的人生经历，暗示读者这个荒诞社会的真实性。恩古吉有意模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创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反讽世界。库克（David Cook）和欧肯姆克普（Michael Okenimkpe）指出：“《十字架上的恶魔》和恩古吉之前的小说中存在不一样的反讽。”（116）在恩古吉之前的小说中，反讽都是通过一个全知的叙述声音，在一个合理的世界中讲述主人公对社会的各种反应。例如，在《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中，主人公穆苟背叛起义领袖基希卡是反讽的，因为每一个肯尼亚人都应该与自由战士们一起解放肯尼亚，这一道理深入人心，而穆苟却坚信他的背叛是正确的。然而在《十字架上的魔鬼》中，世界本身就是黑白颠倒，《一粒麦种》中的民族正义在盗贼们眼里不值一提，由强盗主导的世界打破了善与恶的界限，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善也能变成恶。因此，恩古吉利用不可靠的叙事者，以不可靠的方式讲述真实的社会，表达真情实感，让读者在阅读中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

成正确的判断”（申丹、王丽亚 83），使得读者在阐释小说时能超越叙述者的视角，从而体会到作者隐藏于字里行间的情绪，感悟小说中蕴含的不可直白言说的反讽意味。

有人曾问，非洲作家何时才能停止书写殖民主义、种族、肤色、剥削等主题，去简单地写关于全人类的东西？恩古吉这样回答：“他们没有经历过无以言表的痛苦、绝望和死亡，但非洲仍然在遭受这一切。”（*Writers in Politics* 76）正是因为非洲人民仍遭受着压迫和剥削，所以即便被囚禁、被病痛折磨，恩古吉仍不愿放弃对现实的书写。监狱生活限制了恩古吉的人身自由，舆论的管控又限制了言说的自由，但所幸思想的自由不属于任何人管辖。恩古吉依然以反讽为武器，号召非洲人民正视自我身份，以非洲文明为荣，鼓励人民勇于质疑与批判，走向革命的第三世界。与此同时，他用反讽探讨真实与虚假的界限，重现了一个看似荒诞、实则真实的肯尼亚社会。恩古吉始终坚信“非洲作家的第一要义就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朱振武、韩文婷 101），《十字架上的魔鬼》就是他挑战权威，批判现实，为民族未来大声疾呼的见证，也是肯尼亚英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ook, David, and Michael Okenimkpe. *Ngũgĩ wa Thiong'o: An Exploration of His Writings*. Heinemann, 1997.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lated by Bing Wan. Yilin, 2005. [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Guo, Shaoyu. *A Sele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Essays*. Vol 1.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1979.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Kierkegaard, Søren A. *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stant Reference to Socrates*. Harper & Row, 1965.
- Shen, Dan, and Liya Wang. *Western Narratology: Classical and Postclassical*. Peking UP, 2010.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Thiong'o, Ngũgĩ wa. *Writers in Politics*. James Currey, 1997.
- . *Devil on the Cross*. Translated by Linxiang Cai. People's Literature, 2016. [恩古吉：《十字架上的魔鬼》，蔡临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Zhu, Zhenwu, and Wenting Han. "Exploration of the Literary Road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African Dream: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Nigerian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4, 2017, pp. 97-102. [朱振武、韩文婷：《文学路的探索与非洲梦的构建——尼日利亚英语文学源流考论》，载《外语教学》2017年第4期，第97-102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艾拉出走” 背后 ——纳丁·戈迪默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中的现实关怀

◎ 潘尚瑞 蓝云春

内容提要: 戈迪默在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中透过一对黑人父子的双重视角叙事, 刻画出一位沉默的黑人女性艾拉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生动形象。通过艾拉独具非洲英雄主义的“出走”, 戈迪默在写作中展示了南非现实社会对私人生活的干预与影响。艾拉“出走”的背后不仅体现出戈迪默对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社会现实的艺术性书写, 同时也寄托着她对南非未来发展的现实关怀与解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美好希冀。

关键词: 纳丁·戈迪默 《我儿子的故事》 现实关怀

中图分类号: I4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1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Title: Behind “Aila’s Left”: Realistic Concern in Nadine Gordimer’s *My Son’s Story*

Abstract: Through the double perspectives of the black father and son, Nadine Gordimer depicted the vivid image of Aila growing from a silent black woman to a determined revolutionary in *My Son’s Story*. The African heroism “Aila’s Left” reveals the interven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reality on private life in South Africa in Gordimer’s writing. Behind “Aila’s Left” is not only Gordimer’s artistic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reality of South Africa during the apartheid period, but also her realistic concer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outh Africa and her hope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partheid system.

Keywords: Nadine Gordimer, *My Son’s Story*, realistic concern

Author: Shangrui P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Yunchun Lan, Associate Professor, Han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作为非洲大陆第三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近六十载的写作生涯中深刻描写了南非社会个人与社会复杂而混乱的关系，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深度思索南非及非洲人民的发展前景，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她的作品“始终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反抗种族压迫构成其作品的主旋律”（朱振武 20）。《我儿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是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出版的一部力作，小说从黑人社会活动家索尼和他儿子威尔的双重视角出发，透过索尼一家的生活史，描绘出一幅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生活全景。

戈迪默从小长于南非严苛的种族隔离政策之下，写作聚焦始终避不开南非特殊的社会环境。九岁那年她写下第一首诗，诗中表达了自己对南非著名政治家克留格尔（Paul Kruger）的赞扬之情。20世纪40年代，戈迪默以短篇小说享誉国际。随后她将重心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写作主题延续了一贯的种族主义、自我价值、自由公正等问题探索。她的写作风格自20世纪70年代发生转变，开始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明显且尖锐的政治性。政治主体性问题是研究或创作南非文学乃至整个非洲文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非洲的历史任务就是非洲学的历史任务，将两者脱离开，即将政治和艺术分开，谈论非洲文学，等于宣布拒绝处理非洲文学中最核心的政治主体问题”（蒋晖 138）。《我儿子的故事》写于种族隔离政权末期，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小说通过索尼与威尔的叙述刻画出索尼之妻艾拉上演的一场“艾拉出走”，揉以其他角色探索黑人解放运动的不同历程，构建出一个颇具“独创性与启发性”（毛信德 506）的南非故事。艾拉的出走并非只是单纯的反抗父权制，而是南非特殊社会环境下一场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出逃。这场拥有特殊意义的“出走”蕴涵了戈迪默在写作中对南非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启示。

一、隐于家庭的失语者

戈迪默一直在写作中探寻一种适合南非的叙事技巧，即一种包含南非经验的小说形式，对叙事技巧的探索“为后现代主义叙事诗学的重新评介做出了重要贡献”（Newman 1）。在《我儿子的故事》中，她以儿子威尔的第一人称视角为主、父亲索尼的第三人称视角为辅展开叙事，既赋予故事一定的真实性，又用客观视角补足第一人称视角涵盖不到的细节。随着欧洲文学与语言的强力渗透，南非的本土文化被迫处于弱势状态。这种文化霸权状态在语言与文化方面显得更为突出，“殖民者在非洲大力推行殖民教育，推广殖民语言，播撒西方宗教和西式价值观。[……]非洲原住民的主体性出现了问题”（朱振武、袁俊卿 143）。由这种文化霸权产生的文化审查制度导致南非一代优秀的黑人文学家被迫流亡海外，作品被禁，无法为国发声。戈迪默在这部小说中完全采用两位黑人男性的叙事视角，是她在写作中如实阐释南非现实的艺术手法的创新尝试，“用叙事权的转交”（路庆梅 74）表明她试图以一位白人作家的身份同黑人作家连接起来，让非洲黑人在文学中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将南非故事的叙事权艺术化地移交给黑人同胞的同时，戈迪默也通过家庭内部妻子和母亲的“失语”来突显南非大多数黑人的生存困境。小说透过威尔和索尼的回忆叙事，在叙事初期将艾拉塑造成一个完全隐于家庭的失语者形象。众人眼中的艾拉是一个几近完美的贤妻良母，在这部以心理描写为主的小说中，艾拉的外在形象塑造是书中最为丰满的，她本人也是“整部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形象”（高文惠 117）。与之相反的是艾拉的内心活动与行为轨迹却只能从威尔和索尼的视角中捕捉。她外表出众，举止得当，优雅从容，前半生的人生经历堪称世俗幸福的典范。遵循传统的婚姻习俗，她在兄长的介绍下嫁给时任小学教师的索尼，婚后在操持家务之余接受丈夫的指导学习知识，有一份收入尚可的清闲工作。威尔眼中的母亲大部分时间在厨房灶火间忙碌，索尼与艾拉的交流也基本局限于家庭内部——不是在卧室就是在厨房，暗示自小生活在“她家那个闭塞的女人窝里”（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7）、到了年龄就结婚的艾拉从未涉足过真实的社会。她在家庭内部满足于儿女双全、有小家有工作的生活，惧怕社会外部肤色分明的隔离制度，从而与心怀大义的丈夫心生隔阂。

长期处于温顺与沉默的“失语”状态下，艾拉与丈夫索尼的分歧也愈发明显。《我儿子的故事》以热情高涨的黑人解放运动时期为历史背景，当时南非涌现出一大批青年，以学校和工厂为阵地对抗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小说中的索尼是当时南非黑人青年领袖代表人物的投影。虽然黑色皮肤让他无法接触到好的教育，但他自小聪慧好学，从莎士比亚、卡夫卡等优秀欧洲作家名著中汲取养分，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学业有成的人。索尼察觉到社会对黑人的残酷考验，在一次又一次地投身社会变革后，他成为一名与当局为敌的社会活动家，坚定地为人黑同胞谋求平等与自由。他力争从黑人之城柏诺奈搬到白人郊区，与布尔人成为邻居。至此，沉静优雅的艾拉第一次表示她的不愿意。她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有机秩序和美学原则”（35），每天装扮得体，即使在监狱中探望索尼时也不忘穿着优雅；每晚睡觉前要涂抹厚厚的护手霜以免留下操劳的印迹；日常行为举止表现出的优雅与高贵让白人邻居也高看她一眼。这套生活秩序与美学原则象征着艾拉内心对安稳有保障的温馨家庭生活的渴望，住在黑人隔离区柏诺奈城的生活对她来说反而是一种保护。在隔离区不用和白人打交道，身处熟悉的黑人文化环境让她安心。她第一次态度明确地向索尼表示拒绝，但依然无法阻止全家搬入白人郊区。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隔离区的存在违反了人性与社会发展潮流，不分性别，黑人公民势必都会萌发出争取平等的意识。因此艾拉顺从丈夫的意见搬入白人郊区，继续以贤内助的身份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在严苛且不公的社会制度下，小家庭的温馨岌岌可危。《我儿子的故事》写于南非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正值“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向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展开全面进攻的10年”（杨立华 117），主人公索尼受大环境的影响，陷入政治狂热中，到处奔波演讲，宣传平等呼吁自由，最终被监管严密的当局投进监狱。艾拉面对丈夫的被捕，短暂茫然后再次恢复沉静。她沿袭了先前世俗意义上的贤内助形象，一边安抚儿女一边努力工作维持生计。工作之余带着孩子和换洗衣物探监。但索尼此时的内心需求已不再是来自家庭的关爱，

他的内心有更大的抱负与责任感。从威尔的视角中父母间的异样已经浮出水面，他们之间的沉默不同以往，如果说以前父母间的沉默少言是因为二人在家庭事务上的默契与尊重，那么在监狱探望父亲时的沉默则是“一种真正的沉默，不传递任何信息”（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42）。除却恪守为人妻子的本分，艾拉对索尼的焦虑与需求一无所助。而与艾拉的贤妻形象截然不同是国际人权组织的白人工作者汉娜。她在探望时运用各种暗语传递各种消息给索尼，鼓励索尼挺过难关，出狱后继续迎接战斗。索尼全身心依赖汉娜，而汉娜也成为监狱中的索尼与家沟通的桥梁。此时此刻“家”的含义上升为索尼与黑人同胞一同奋斗的战斗大本营，而艾拉所代表的温馨小家离他内心的诉求越来越远。艾拉的沉静曾是他最为欣赏的特质之一，但在斗争运动面前，这份沉默变成了“从不说他想要她说的话”（51）。汉娜的出现、狱中的生活与残酷的制度使得艾拉和索尼的爱情彻底走向瓦解。

小说中艾拉除了美貌如黑珍珠之外，最突出的特质就是沉默与温顺，她在整部小说的叙述中始终处于失语状态，表现出的温顺也是“作为黑人民族性格中一部分的民族意志”（王涛170）。威尔撞破了父亲与白人女子的不伦之恋，从此与父亲无声对立；女儿贝比在家庭阴影和社会环境的双重打击下选择割腕自杀；唯有艾拉始终沉默。自杀被救后的贝拉出人意料地逃离了这个不复温馨的家庭，愤然出境成为一个流亡的革命者，索尼的伤心与威尔的愤慨再一次衬托出艾拉异常的沉默，她的沉默是难以被解读，甚至由于她身为家庭主妇的身份而难以被关注的沉默。沉默掩盖了个体对家庭破碎与社会隔离的伤心与恐惧，同时为她后续的“出走”埋下伏笔。

二、连接海外的革命者

戈迪默甚少在小说中塑造一些完美的、理想化的英雄主义人物，艾拉却是例外。戈迪默在故事后期将艾拉的“出走”完全塑造成了一场带有理想色彩的英雄主义式的出走。陷入政治狂热的索尼在个人情感中融入了政治抱负，通过索尼视角意识流的叙述，索尼将他与汉娜的感情定义为“他和她所共有的那个献身的世界的情感”（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115），艾拉则是无法与他同步成长、只能探讨家庭事务的妻子。汉娜在索尼的叙述部分中占比越来越多，艾拉则变得似有若无，唯独在威尔的观察中读者才得以窥探一二：艾拉突然办妥了护照，出国探望她流亡海外的大女儿贝比。几乎没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娜拉式的“出走”——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探亲回国后又确实回归了家庭。但她的改变也是悄无声息的。抛去了过去贤淑美丽的形象，她剪短了一头秀发，穿着也以随意和轻便为主。她和索尼的交流越来越少，活动范围也从家庭厨房走到了社会，不再总是自我封闭在家中。直到说着南非荷兰语的白人军官找上门来，众人才惊觉艾拉这场“出走”背后的真相。她也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借着数次探亲的名义与海外互通消息、传递武器，策划国内的武力抗争运动。

在20世纪80年代，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主要途径从和平谈判转为武力抗争。成为革命

者的艾拉依旧保持沉默的特质，但此刻的沉默已不再是恐惧与悲伤，而是转变为一种优势。面对被捕不卑不亢，受审时沉默不语，拒绝透露详细信息，她的沉默让世人敬佩。她用沉默完成蜕变，不借力于丈夫而是凭借自身特质挺身而出迎接战斗。探望女儿和外孙是她成功出境的有力保障，带给外孙的手工制品是她运送秘密物品的载体，她亲手打破了过去信奉的生活秩序与美学原则，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与革命事业彻底合二为一。在丈夫与儿子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她成为一名英雄战士，彻底摆脱屈从于丈夫和儿子的附属地位，从渴望安稳家庭的贵妇成长为投身革命的英雄，“入狱了同时又自由了”（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209）。审判当天，出庭接受审判的她不再是一个儿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如同威尔所说“从那时起我就把她看作‘艾拉’了”（219），她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出现在众人面前。与艾拉的成功相对的是小说中另外两位社会活动家——丈夫索尼和他的情妇汉娜。索尼在斗争后期将政治热情和自我欲望混为一谈，一方面他渴求黑人与白人的平等，一方面又出轨了白人政治家汉娜，无数次地感觉自己无论是生活还是革命都依赖汉娜。在斗争后期，他与汉娜纠葛不清的私情显然影响了他的事业；而汉娜在小说中一直作为艾拉的对立面出现。艾拉是典型意义上的非洲美人，汉娜却是大大咧咧的欧洲女性。但是汉娜的革命情怀相对于艾拉，显得有些蜻蜓点水般的不切实际，她对黑人的关注与关怀中掺杂了太多的同情，而非是真正平等待人。小说最后她被调离南非也暗示了她对南非斗争运动的付出并没有实际效应。

保释等待再次审判期间，艾拉在过去索尼所在的位置上与律师们磋商，接待不断来访的解放运动同盟们。她终于抛去了整个小说中的“失语”状态，从容不迫地回答丈夫和儿子的疑问，解释她的立场，拒绝儿子为她出庭作证的解救方案。在整个解救艾拉的行动中，身为家人的索尼与威尔被排除在外。领导层最终安排她出逃南非，在南非之外的非洲大陆上继续她的革命事业。与她并肩作战的不再是过去代表家庭男主人的丈夫与儿子，而是女儿贝比。贝比也是小说中值得关注的女性角色之一。贝比继承了母亲的美貌，性格上与艾拉对立。贝比从小大胆叛逆，步入青春期后正式拒绝做安于家室的传统女子，在经历了父亲的背叛和社会的歧视后曾企图自杀，随后又偷越出境加入自由战斗队。她在卢萨卡的解放运动中遇到伴侣并相爱结婚，他们的结合不再受制于政治理念，而是在政治抱负与个人情感中找到了平衡，真正实现了母亲与父亲有所缺憾的革命情怀。

在政治制度不断干预私人领域的现实下，《我儿子的故事》深刻探讨了索尼一家的家庭生活是如何在公共领域的干扰下一步一步走向解体的。小说最后烧毁房屋的那场火既象征着过去种种肮脏与悲痛的毁灭，也象征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场大火是索尼一家人的重生，亦是南非所有受压迫群体的重生。艾拉最后的出逃标志着艾拉自我的自由解放和传统家庭的彻底“出走”。她的“出走”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英雄主义升华，不再有“出走后怎样”的疑问，她已坚定地将个人生活与革命事业相结合，在人类解放的远大志向下成就自我。瑞典文学院在授予戈迪默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特别提到，艾拉在小说最后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毛信德 506）令人惊讶，也是对小说人物刻画及其启示性内涵的肯定与赞赏。

三、寄予厚望的理想者

戈迪默一生都在抗拒自己被贴上“政治写作”和“女性写作”的标签，她在《我儿子的故事》中借威尔之口表明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记录下被争取自由的斗争决定了的生活是怎么回事”（259）而非是些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这与她所信奉的写作理念——“睁眼看生活”（Gray 264）是相一致的。身处南非这个私人生活由政治现实决定的特殊环境，要想如实展现南非人的生活就避不开政治环境，“女性主义被认为是一个与国家的实际问题无关的问题，这个国家的实际问题是将黑人多数从白人少数统治中解放出来”（Gordimer, “The Prison-House” 333），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艾拉的“出走”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同时，艾拉“出走”不仅仅是出于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更多的是出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关怀考虑。

艾拉最初想要拥有一个安稳小家庭的愿望本无可厚非，然而丈夫的不忠成为一个导火索，导致原本幸福的小家走向解体。艾拉在“出走”之前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的解放运动事业，她从自己的家庭角色出发，以一个贤妻的身份为丈夫提供助力。她始终以沉静和坚定的心态支持丈夫和他的革命事业，但小说中索尼的不忠是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拥有更为复杂和厚重的特殊意义。他对妻子艾拉存在的定义是家庭和母性，看不到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情妇汉娜的白人身份与为黑人鸣不平的事业心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的政治抱负和个人欲望相互交织，他的个人情绪混杂了变异的社会环境影响。大江健三郎在致信戈迪默时特别提及了《我儿子的故事》中的“不忠”主题，认为小说中由于社会环境造就的特殊“不忠”显得叙事主题意义宽广而深厚。艾拉的“出走”具有非常明显的女权主义特征，尽管戈迪默对女性主义始终持怀疑与矛盾的态度，但是正如她对大江健三郎的回信中所言，作者对写作的探索会将作者引入“特殊的人类生存的复杂性之中”（《在希望与历史之间》87），她在刻画艾拉这个人物形象时不自觉地将对南非现实的思考融入其中，又因艾拉的女性性别身份不由自主地创造出一个女权主义典范。

如果说欧洲的娜拉出走是因为经济权的问题“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 32），戈迪默则在《我儿子的故事》中指出非洲的艾拉出走后还可以走上革命之路。丈夫的不忠、女儿的流亡让艾拉在沉默中爆发。尽管从索尼和威尔的意识流叙事中无从得知艾拉的内心活动，但这一叙事空白的设置反而让艾拉这个人物形象更富有吸引力。经历家庭的破碎，艾拉独立、坚韧和沉静的特质让她思索这个社会和自我存在的意义。值得关注的是，艾拉的“出走”完全是她本人的决定而非任何人尤其是夫权的帮助所致。从艾拉对索尼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尽管丈夫是一名优秀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但她显然是在流亡海外的革命者比比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观察之后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她剪去长发，不再在意着装搭配，这意味着她脱离了过去束缚自我的温婉女性气质，彻底从过去的生活中“出走”。从小家到大家，从小我到大我，从恐惧自卑的沉默到坚韧自强的沉静，她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表现出沉默却坚定的民族特征，从而在决定南非命运的变革中不屈不挠地完成使命，“在南非上演的历史剧中确

立了自己作为合法演员的地位”（Sonza 107），同时也在社会现实环境的干预下书写了一场具有非洲特色和理想英雄主义色彩的“艾拉出走”。

身为土生土长的南非本土作家，戈迪默在那个特殊年代拥有过白肤色带来的优待，也拥有更多复杂而艰难的思考。戈迪默本人接受过普鲁斯特、契诃夫、屠格涅夫、辛克莱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家的熏陶，写作风格接近欧洲文学。这一特点使戈迪默的长篇小说深受西方世界的好评，她的写作无疑打开了国际社会了解现代南非的一扇窗口，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就曾称“南非以外的人对现代南非的了解，也主要是通过阅读南非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戈迪默的作品”（305）。但是等到非洲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免就会产生一个疑问：非洲文学的发展也要走欧洲文学的路吗？戈迪默在写作初期不免将欧洲作家作为非洲作家创作的楷模，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立场不再坚定。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她写作的目的并非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为了“阐释生活”（Bazin 574），但是南非特殊的社会环境导致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个人的选择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政治环境的影响。小说中的索尼将政治抱负与个人欲望混为一体，对汉娜本人的欲望混杂了政治热情，消解了爱情的同时伤害了家庭。威尔憎恨汉娜的出现抢走了父亲，但却无法控制自己在梦中对汉娜这种金发女郎的欲望。父子二人深受西方殖民文化入侵之害，在现实的抵抗与潜意识的渴求中挣扎。而艾拉在索尼入狱时拒绝过汉娜所代表的人权组织的帮助，在白人邻居中不卑不亢，面对白人当局的审判临危不乱。相较于索尼和威尔，她的革命道路完全是独立自主思考的结果，并未受到太多西方价值观的干扰。《我儿子的故事》中除了艾拉以外，每个角色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唯独艾拉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女性英雄主义角色。与出名早的索尼不同，故事最后的艾拉在解放运动中很明显比索尼取得的成就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戈迪默所思考的南非独立道路：南非黑人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戈迪默一生所著颇丰，她的写作“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生活”（朱振武、刘略昌 144）。这部出版于种族隔离过渡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力作沿袭了先前的写作风格，聚焦现实生活，又别出心裁地透过一个黑人家庭的解体表达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探讨了个人生活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如何实现自我的话题。这部小说主要以儿子为叙述者，讲述围绕父亲索尼展开的故事，但小说题目却以《我儿子的故事》为题，明显与故事情节相悖。戈迪默在小说结尾借威尔之口点出这个故事并非个例，而是以索尼和威尔为代表的所有南非人的故事——“我们的”（257）故事。透过威尔与索尼的见证，艾拉通过这场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出走”，向世人展示了南非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个人选择的交互影响，同时小说也寄予了戈迪默对南非“黑白分明”的种族隔离现状该如何发展的思考，是一部文学艺术性与政治启示性俱佳的力作。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zin, Nancy Topping. "An Interview with Nadine Gordime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36, no. 4, 1995, pp. 571-87.
- Coetzee, John Maxwell. *Stranger Shores*. Translated by Hongzhang Wang.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2010. [庠切:《异乡人的国度》,汪洪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 Gordimer, Nadine. *My Son's Story*. Translated by Yaping Mo. Yilin, 1998. [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莫雅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 . "The Prison-House of Colonialism: Ruth First's and Ann Scott's *Olive Schreiner*." *Telling Times: Writing and living, 1954-2008*, by Gordimer, W. W. Norton, 2010, pp. 329-34.
- . *Living in Hope and History*. Translated by Xiaoying Wang. Lijiang, 2016. [戈迪默:《在希望与历史之间》,汪小英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
- Gray, Stephen. "An Interview with Nadine Gordime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22, no. 3, 1981, pp. 263-71.
- Gao, Wenhui. *Attachment and Stripping: Black African English 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lonial Culture*.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15. [高文惠:《依附与剥离——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黑非洲英语写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Jiang, Hui. "The Historical Prerequisites, Universal Forms and Basic Problems of the Studies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no. 5, 2019, pp. 127-41. [蒋晖:《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展开的历史前提、普遍形式和基本问题》,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第127-41页。]
- Lu, Qingmei. "On the Writing Gestures in Nadine Gordimer's *My Son's Story*."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o. 1, 2012, pp. 70-75. [路庆梅:《论纳丁·戈迪默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中的写作姿态》,载《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70-75页。]
- Lu, Xun. "What Happens after Nora Left." *Selected Essays of Lu Xun*, edited by Xiufeng Zhang, 21st Century, 2010, pp. 31-36. [鲁迅:《娜拉出走后怎样》,载张秀枫编《鲁迅杂文选集》(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第31-36页。]
- Mao, Xinde, editor.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Collected Presentation Speeches and Lectures*. Zhejiang Gongshang UP, 2013. [毛信德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与获奖演说全集》。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 Newman, Judie. *Nadine Gordimer*. Routledge, 1988.
- Sonza, Jorshinelle T. "'My Turn, Now': Debunking the Gordimer 'Mystique' in 'My Son's Story.'"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5, no. 4, 1994, pp. 105-16.
- Wang, Tao. "The Double Strategy of Narrative: on the National Metaphor of Personal Narrative in *My Son's Stor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no. S1, 2003, pp. 169-71. [王涛:《叙事的双重谋略——论〈我儿子的故事〉中个人叙事下的民族隐喻》,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S1期,第169-71页。]
- Yang, Lihua, editor. *South Afric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2010. [杨立华编:《南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Zhu, Zhenwu, and Junqing Yuan. "Diasporic Literatur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Age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A Case Stud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7, 2019, pp. 135-58, 207. [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135-58,207页。]
- Zhu, Zhenwu, and Luechang Liu.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an-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lation and Influence in China." *Soochow Academic*, no. 2, 2015, pp. 140-54. [朱振武、刘略昌:《“非主流”英语文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载《东吴学术》2015年第2期,第140-54页。]
- Zhu, Zhenwu.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Xuelin, 2019. [朱振武:《非洲英语文学的源与流》。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

《再也不得安宁》中的饮食碰撞与文化杂合

◎ 肖开提·开力 卢敏

内容提要:《再也不得安宁》是阿契贝写于尼日利亚独立前夕的一部小说，作者在文中多处建构了西、非两种饮食文化的碰撞，从而揭示尼日利亚传统文化逐渐被西方文化所瓦解的现实。小说中的饮食文化书写不仅寄托了阿契贝对于尼日利亚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殖民的态度，也在小说故事情节推进中升华为尼日利亚新青年在两种文化洗礼下如何抉择的思索与探求。

关键词:《再也不得安宁》 钦努阿·阿契贝 饮食文化

中图分类号: I4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2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4

Title: Food Collision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No Longer at Ease*

Abstract: *No Longer at Ease* is a novel written by Chinua Achebe shortly before the independence of Nigeria.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collision between Western and African food cultures in the novel so as to reveal that the Nigerian traditional culture is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writing of food cultures in the novel reflects Achebe's attitude towards the western cultural colonization of traditional Nigerian cul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it gradually transcends into the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f how to choos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for the Nigerian youth.

Keywords: *No Longer at Ease*, Chinua Achebe, food culture

Authors: Kaili Xiaokait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Min Lu,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在非洲英语文学中，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发展迅速且成就显著，出现了一大批非洲英语文学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 1930—2013）是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朱振武称阿契贝为“非洲的发声者”（1）。阿契贝童年时期在奥吉迪的教会学校接受小学教育，8岁时就开始学习英语。阿契贝曾公开支持在非洲人的作品中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放弃母语是否正确？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背叛，产生强烈的罪恶感。可是我别无选择。我被迫使用这种语言，我也愿意使用这种语言。”（转引自陶家俊 61）他在用英语创作的生涯里先后发表了被世人称为“尼日利亚四部曲”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再也不得安宁》（*No Longer at Ease*, 1960）、《神箭》（*Arrow of God*, 1964）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 1966）。其中阿契贝于1958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瓦解》讲述了一位尼日利亚伊博族部落英雄跌宕起伏的个人历程和悲惨的命运结局，为我们展示了西方殖民者入侵尼日利亚前后的社会现实。阿契贝在该小说创作中不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还对伊博族部落的传统饮食文化作了许多描述，为读者打开了尼日利亚传统饮食文化的大门。时隔两年后发表的《再也不得安宁》在讲述了西方殖民入侵尼日利亚后第三代人的故事的同时，也探讨和思考了西方饮食文化带给他们的冲击及其与本土饮食文化的碰撞。

一、传统饮食文化的日新月异

《再也不得安宁》中的主人公奥比是一个有着英国留学经历的伊博族青年，归国后的他在英国殖民政府部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有一位漂亮的未婚妻，本想要有一番抱负的他，最终却因为贪污受贿失去了一切。小说还通过具体的饮食文化习俗的碰撞书写，从侧面反映了阿契贝对于西方文化入侵的警惕，也在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展现了当时尼日利亚新青年在文化冲击下的艰难探索与挣扎。

在阅读小说《再也不得安宁》后，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阿契贝对饮食文化不再像《瓦解》里那样花费大量笔墨，因为在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中，尼日利亚传统文化已经深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以致于当地的传统饮食文化开始逐渐走向没落并且产生出一种“西-非”（西方与非洲）结合的现象。例如阿契贝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柯拉果，它本是西非人民最为喜爱和最为看重的果品。特别是伊博族，将其视为生命之果，认为它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之物，因而在吃前还会有向祖先或者神灵祈祷的仪式。即便是如此具有珍贵意义的食品，也未能在西方饮食文化的冲击下幸免。《再也不得安宁》这部小说就从多处反映了柯拉果逐渐失去其历史地位与民族意义的过程。

首先，吃柯拉果的仪式出现了西-非结合的特征。在小说《再也不得安宁》的第一章中，柯拉果第一次出现是在乌姆奥菲亚进步协会召开的关于奥比贪污案的会议上，“主席做了短暂祷告后拿出三个柯拉果”（6）。随即，这群进步协会的成员集体面对这三枚柯拉果进行祷告。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他们祷告之后都说了“阿门”（7），由此可见这些乌姆奥菲亚进步协

会的成员都是信仰基督教的。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这些成员并没有像他们前一代人那样向自己本民族的神灵或者祖先进行祈祷，在此，吃柯拉果前举行的传统祷告仪式已发生了改变。主人公奥比的父亲以撒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以撒是基督教传教士，他认为吃柯拉果的仪式必须按基督教的方式进行，这使同族人误认为他家人不吃柯拉果了。在小说中，他的解释是，“我们吃柯拉果，但不拿柯拉果去拜神”（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55）。在以撒看来，身为基督徒的伊博人可以吃柯拉果，但绝不会拿着柯拉果去祭拜和供奉异教的神灵，而这个所谓异教的“神灵”就是尼日利亚传统民间神话中的那些神，这说明以撒把基督教作为信仰的宗教，而把尼日利亚传统崇拜看成是异教。紧接着在以撒家做客的奥多格乌知道了以撒对于食用柯拉果的态度后，在接下来吃柯拉果前的祷告是这样的：“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保佑这个柯拉果，吃了它能对身体有益。起初如何，最后亦然。阿门。”（56）这是属于基督教式的祷告，以撒很满意，认为这才是正确食用柯拉果的仪式，并且乘机建议奥多格乌皈依基督教。除去这两个细节描写外，柯拉果在阿契贝的小说中还出现了多次。在阿契贝第一部小说《瓦解》中，吃柯拉果时还有两样必不可少的物品：胡椒和白石灰。例如乌诺卡给前来讨债的客人拿出柯拉果吃时是这么描述的，“里面盛着一个柯拉果、一点胡椒和一块白石灰”（*Things Fall Apart* 2）。胡椒是用来作调味剂的，白石灰“是人人家中都预备着给客人们在吃柯拉果之前在地上画线用的。”（《瓦解》66）。但在《再也不得安宁》这部小说中，几次重要的仪式上却并没有出现白石灰和胡椒，原因无他，正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传统吃柯拉果的饮食文化已经出现了西-非结合化的特征。

其次，柯拉果已淡出人们的视野，逐渐边缘化。在传统伊博人的饮食文化中，到他人家里拜访做客，主人首先会拿出柯拉果招待客人，但是在文本中以奥比为代表的新一代伊博年轻人中，柯拉果并不是招待客人的必备之物。例如奥比去同乡约瑟夫家住的那几天，约瑟夫并没有拿出柯拉果来招待奥比，或许他家里本就没有柯拉果；还有奥比和女友克拉拉受邀前去国务大臣奥阔里家拜访，身为尼日利亚人的奥阔里面对同族人的到来，也是没有拿出柯拉果或者棕榈酒等传统饮食来招待，而是询问他们喝什么酒，并命令仆人端上来了雪莉酒、啤酒，以及自己要喝的掺了苏打的威士忌；文章后半部分，寻求奥比帮助的马克小姐到奥比家的时候，奥比也没有拿出柯拉果招待她，反而是问她“来杯可口可乐怎么样？”（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98），很显然，在青年一代的伊博人之间，已经完全不重视传统饮食文化了，相反他们更偏向于西方的饮食文化，在这一点上以柯拉果为代表的传统食物已被年轻人所冷落，它们正逐渐退出中心地位。

二、本土饮食文化的变迁之因

上文梳理了小说《再也不得安宁》中以柯拉果为代表的传统饮食文化的变迁，而导致这类传统饮食文化产生变迁的原因是多样的，殖民者一方面在不断鼓吹自己的文化是多么的优越，另一方面又通过种种形式打压当地的传统文化。当面对西方文化时，传统文化处于劣势，

年轻人面对多样的西方饮食选择，自然而然地投入西方的怀抱，抛弃了本民族的传统饮食习惯。

非洲国家被殖民的历史往往都有相似之处。以尼日利亚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便在此建立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殖民统治，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尼日利亚是非洲大陆上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活动的场所大都是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拉各斯作为西部重要的港口早就被殖民者盯上，这里也是“英国在尼日利亚建立起的第一块殖民地”（张象、姚西伊 26），因此这座城市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格外大。《再也不得安宁》发表于1960年，时值尼日利亚宣布独立，而作品讲述的故事时间正是尼日利亚独立的前夕。此时，拉各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殖民烙印，甚至许多生活习俗也已经完全西化，恰如主人公奥比早年间所听闻的那样，“那里没有黑夜，因为晚上的电灯像太阳一样耀眼；只要一招手，一辆小汽车就会为你停下来”（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14）。该城市作为英国在非洲的第一块殖民地，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发达，到处都充斥着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子。在饮食这一方面，也有大量的西方饮食涌入尼日利亚，像冰啤、可口可乐、小面包、威士忌、香槟等。这些外来饮食不仅出现在各类餐厅，也成为尼日利亚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饮食。主人公奥比回国后与好友约瑟夫在一家据称是叙利亚人实则为英国人开的餐厅吃饭，奥比想吃传统食物，于是向朋友咨询这家店是否有尼日利亚菜，可是小说提到“稍微有点儿档次的餐厅都不供应尼日利亚菜”（37）。文中的这些高档餐厅自然是西方殖民者所经营的，而这些西方经营者的目的就是向尼日利亚地区输出其饮食文化，进而对当地饮食文化进行打压、管控。高档餐厅不提供尼日利亚菜，表明当地饮食不被西方人认可，而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本土传统饮食文化的结果就是自我贬低，丧失自信。

除了殖民入侵对饮食文化产生影响外，最主要的还是被殖民者——尼日利亚本土人民——对这些西方外来文化的接受。当英国殖民者将他们的文化带到这片土地上，尼日利亚人不得不转变观念，由最初的抵抗到后来接受这些有别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先进”文化。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强制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转引自朱立元 364）。以主人公奥比为例，他从小接受的就是英式教育，随后又去英国留学三年，而集资送奥比去往英国的是乌姆奥菲亚进步协会，注意这群进步协会成员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尼日利亚人。文中的这些迹象都表现出尼日利亚本土人民已经完全接受英国殖民者带来的文化，他们深受熏陶，在日常生活方式上都有西化的痕迹。拉各斯是个西化的花花世界，而西方文化以更多的选择方式诱惑青年一代。他们穿着打扮西化，接受西式教育、宗教信仰，日常吃喝玩乐等都投入到西方文化的怀抱里。

三、饮食文化体现的西-非汇流

《再也不得安宁》这部小说中西方殖民文化大范围覆盖在尼日利亚这片土地上和人们的心

中,当地民众深受西方殖民文化影响,形成法农(Frantz Fanon)所说的“黑皮肤,白面具”(1)的自卑情结,他们选择两种饮食文化时会不由自主地偏向于西方。但是随着非洲民族主义崛起,“黑人性”(Négritude)得到宣扬,非洲人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传统饮食文化。奥比这一代年轻人,在小说中被称为新时代的“先锋”(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80),虽自幼接受西方殖民教育并一路沐浴在西方文化下,但他们也逐渐向本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靠拢,下面通过小说分析几处关于先锋者们对于传统饮食文化的态度。

克里斯托弗承认说,一边从伊古丝汤里抓出一大块肉。他们用手吃甘薯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吃味道更好。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再像第一代人那样害怕别人说他们不文明。(22)

他只道,大概两个星期前,他被叫到克里斯托弗住的公寓,见了两位对尼日利亚很感兴趣的爱尔兰女孩[……]女孩们确实对尼日利亚很感兴趣。她们在这里只待了三个星期左右[……]晚餐吃的是裹有蔬菜和肉的油炸大蕉果。女孩们说她们非常喜欢,虽然从她们的鼻涕和眼泪可以看出,这菜对她们来说太辣了。(128)

以上是小说中两处关于年轻一代在“吃”这方面的描写:第一段是回国后的奥比与好友克里斯托弗在家里吃饭的场景。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却直接用手抓着吃传统食物。对于用手作者也给出了两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觉得用手吃会显得不文明,这就表明他们又开始向传统饮食文化回归。第二段是在晚餐时分奥比与好友克里斯托弗招待两位爱尔兰女孩吃了非常辣的油炸大蕉果,在这里他们带爱尔兰女孩吃的不是西方饮食而是作为传统美食的油炸大蕉果,也间接体现出奥比这代人对自己的传统饮食文化充满了自信,并开始对外输出。

除了吃以外,再来分析小说中的“喝”。例如与传统棕榈酒相比他们的酒桌上放的更多的是冰啤、果汁等其他饮料。阿契贝在描述奥比这一代人喝酒的场景时,几乎没有一位饮用传统的棕榈酒,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是棕榈酒。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概括地讲,“拉各斯的棕榈酒已经被稀释得不能称之为酒而是水”(86)。棕榈酒质量的降低是它失去饮用者的主要原因,被稀释的棕榈酒带不来往日先辈享用时的感受,如今喝棕榈酒简直就是在做低贱的事情,年轻人已经彻底接受了西方的酒水。

“想喝点儿什么?女士优先,这是白人带来的规矩。我尊重白人……果汁?肯定没有!我家里没人喝果汁……给小姐拿瓶雪利酒”;“啤酒?要不来点儿威士忌?”“我不喝烈性酒。”奥比说。“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都这样。”(72)

以上这段是奥比带着克拉拉受邀前往国务大臣奥阔里家中做客的对话场景。奥阔里身为尼日利亚人，待客之道却是西方化的。即使主要目的是来喝酒，提供的酒也都是西方的酒水，没有传统的棕榈酒，这也是小说所反映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即部分西方饮食文化已完全融入到当地群众的生活中，类似于这种酒水的选择他们更偏向于西方。通过小说中这一代人对于饮食文化态度的双重性——“既有传统亦有西方”，阿契贝表达了自己对于两种文化的态度是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既不从前景也不从背景，而是从中间立场来看待事物”（*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9）。也正如学者辛格（Raman Singh）对阿契贝这种立场所作的总结性阐释：“非洲文学的共同作用在于否定欧洲文化，重建非洲传统文化。我以为阿契贝将这两种文化并置，减少偏执一端的冲突。但最终的结果是这两种文化必须一直保持和平相处。”（167）

虽然一开始尼日利亚的传统饮食文化在西方殖民文化的冲击之下，遭到“打压”直至没落的边缘，但是传统饮食文化仍旧源远流长且在本土群众的内心里根深蒂固，就如阿契贝笔下深受西方教育模式浸润的新一代尼日利亚青年，在饮食文化的选择上并不持全盘西化的态度，而是适当重拾了本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自信，使得两种文化同时汇流在尼日利亚这片地区。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它们就如同被剥开的棕榈果一般“其中的一颗黑得发亮，另一颗白得像粉”（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19），即阿契贝眼中的这两种文化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应当融会贯通在尼日利亚这片土地上。

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饮食”一直是最被关心的问题之一，毕竟民以食为天。在大多数读者的认知中，生活在非洲的人民普遍食不果腹，瘦骨嶙峋，例如尼日利亚另一位小说家奥克里（Ben Okri）在其小说《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 1991）中就很现实地描绘了非洲贫穷落后的环境及人民所遭受的饥饿之苦，而此类小说让读者误以为非洲是一块饥饿大陆。但是通过阅读阿契贝的这部长篇小说《再也不得安宁》，我们发现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饮食文化还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尼日利亚传统食物不仅有柯拉果、棕榈果和棕榈酒等，还有甘薯、木薯、苦叶汤、伊古丝汤、加里、炖菜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融合其他文化充满异域风情的食品。非洲本是一片丰饶的土地，但是几个世纪的西方殖民将其变成了“饥饿大陆”，通过阅读非洲文学中的饮食文化，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和饮食男女的非洲。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Achebe, Chinua. *Things Fall Apart*. Fawcett World Library, 1969.

——. *Things Fall Apart*. Translated by Zongyu Gao. Chongqing Publishing, 2008. [阿契贝：《瓦解》，高宗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Random House, 2009.
- . *No Longer at Ease*. Translated by Qunying Ma. Nanhai, 2014. [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 马群英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lated by Bing Wan. Yilin, 2005. [法农:《黑皮肤, 白面具》, 万冰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Singh, Raman. “No Longer at Ea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Values in the Fiction of Chinua Achebe.” *Neohelicon*, no. 16, 1989, pp. 159-67.
- Tao, Jiajun. “Language, Art and Cultural Politics: On Ngũgĩ wa Thiong’o’s Anticolonial Thought.”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06, pp. 59-65, 123. [陶家俊:《语言、艺术与文化政治——论恩古吉·塞昂哥的反殖民思想》, 载《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第59-65, 123页。]
- Zhang, Xiang, and Xiyi Yao. “On British Indirect Rule of Nigeria.” *West Asia and Africa (Bimonthly)*, no. 1, 1986, pp. 26-35. [张象、姚西伊:《论英国对尼日利亚的间接统治》, 载《西亚非洲(双月刊)》1986年第1期, 第26-35页。]
- Zhu, Liyuan, editor.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4. [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Zhu, Zhenwu. “Chinua Achebe: Africa’s Voice.” *Literary Journal*, no. 7, Aug. 2018, pp. 1-2. [朱振武:《钦努阿·阿契贝: 非洲的发声者》, 载《文艺报》2018年8月第7版, 第1-2页。]

◇责任编辑: 马妮娅

论当代非洲文学对外国文学课程的补充与拓新

◎ 段静 李曾琦

内容提要: 在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培养具有文化理解力和沟通能力的外语人才变得愈发重要。随着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一方面中非经贸交流越来越频繁与深入, 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上, 出现了当代非洲文学在国际文坛上崛起与我国外国文学课程中相应内容的缺失形成的鲜明反差。本文介绍了当代非洲文学的复杂性与世界性两个总体特征, 对国内外外国文学课程设置的现状进行了描述, 并论述了当代非洲文学对外国文学课程的补充与拓新意义。

关键词: 当代非洲文学 外国文学课程 外国文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32-08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钦努阿·阿契贝口述小说研究”(17YBA007);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 17 项目“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 TPACK 专业发展研究”(214)

作者单位: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

Title: On the Supplement and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to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ith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2013, on the one hand, Sino Af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in-depth.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witnessed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rena and the absence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in the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complexity and cosmopolitanism,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iculum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expounds the supplementary and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to the curriculum of foreign literature.

Keywords: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Authors: Jing Du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Zengqi L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文学一直是古老非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非洲文学主要以口头的形式产生和流传,形成了大量生动活泼、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史诗)、格言谚语、动物寓言等。然而,一方面由于这些作品基本是口传文学,没有用文字加以记录和传播,另一方面,由于自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对非洲进行的“他者”叙事,非洲大陆在世人心目中成为了一块没有文学和文明的“黑暗之心”。不过,这种刻板的印象正在因当代非洲文学的迅速崛起而得到改变。自20世纪50年代起,非洲文坛涌现出阿契贝(Chinua Achebe)、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黑德(Bessie Head)、法拉赫(Nuruddin Farah)、奥克瑞(Ben Okri)、丹格仁布格(Tsitsi Dangarembga)、阿迪奇(Chimamanda Adichie)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频频斩获国际文学大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发行海外。对此,我国学界虽有关注,但显然还不能跟上时代和国家发展的步伐。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团结与合作的方向迈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交流与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2018年9月3日至4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同致力于推进中非合作论坛建设,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政治经济交流的快速增长,对中非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互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代非洲文学成为理解非洲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思维方式的重要窗口。

一、当代非洲文学概述

在当代非洲,文学远非停滞于古老的口头传统和活泼的大众文化,而是在不断产生内涵丰富、技艺高超、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以来,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震荡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欲望,他们努力在国际上发声,让世人知晓非洲经历的历史和灾难、非洲人民的生活和希望,力图还非洲文化和文明以本来面目。非洲历史和地域的复杂性,其与西方世界长期的殖民和从属关系,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和命运上的同质性,都造就了当代非洲文学的复杂性和世界性两个总的特征。

19世纪末,西方对非洲的殖民入侵达到巅峰,此后长达半个世纪,非洲缓慢平和的农耕文明遭到帝国主义枪炮的摧毁,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被基督教侵蚀,以部落酋长制为主体的社会架构被西方强行移植的多党制、精英政治所割裂。非洲大陆至此停步不前,成为世界上最为贫瘠、疾病丛生、灾难连连的“黑暗之心”。正因如此,当代非洲文学中既回响着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战斗号角,也涌动着对西方文明的膜拜;既有对自身现状的剖析和反思,也有对

未来走向的探索和争论。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当代非洲作家将教育视为其文学创作的第一要义。被誉为“现代非洲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就强调，作家必须“帮助社会重拾对自己的信任，并抛弃因多年的诋毁造成的自卑感 [……] 作家不能逃避对人民进行改造和再教育的责任”（105）。

时间维度上的跌宕起伏还与空间维度上语言生态的错综格局相互交织。当代非洲文学从语言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使用宗主国语言创作和本土语言创作两类。使用宗主国语言创作的有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喀麦隆等国的法语文学，尼日利亚、加纳等国的英语文学，安哥拉等国的葡萄牙语文学等。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则更加丰富多样，如非洲北部地区的阿拉伯语文学，东部地区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和索马里语文学，西部地区的豪萨语文学、南部地区的班图族语文学，阿非利卡语文学等。很多地区的文学创作是本土语言和外来语言并存。语言的多样性背后是非洲文学的身份之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作家曾分别以瓦里（Obianjunwa Wali）、提安哥和阿契贝为代表展开一场著名的论战，讨论的核心便是使用本土语言还是殖民语言进行创作，是否关系到非洲文学的独立和身份的确立。一方面，用本土语言创作的文学，能更好地体现非洲文学的“人民性”，但因许多国家没有形成通用的民族语言，也导致作者的发声不能传达给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用宗主国语言进行的创作，虽然拥有了更多的海外读者，但却“缺少了他们本民族的人，民族同胞不能阅读自己本民族的故事”（任一鸣、瞿世镜 38），这无疑是民族主义作家的悲哀。对此，笔者曾经做过如下论述：

在长期的殖民现实和西方知识体系的宰制下，非洲文学的身份问题始终存在各种争议，难以最终确立。殖民宗主国文化对非洲人民思想、语言、生活等方面的渗透，以及非洲本土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界定现代非洲文学不可回避的背景因素。（段静 43）

目前来看，非洲作家论战的结果并没有导致两种语言类型文学的二选一，而是加深了非洲作家和学者自身对当代非洲文学属性和身份复杂性的认识。

当代非洲文学的世界性体现在它与东西方文化的交错与融合中。当代非洲文学几乎与西方对非洲的殖民史相生相伴，既反映了与西方的对抗，又吸纳了欧美文学的元素。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和评奖在一定程度上依附西方话语体系。最有名的“非洲作家系列”便是由英国海尼曼出版社出版。该系列前后跨度达三十年，推出了一百多部经典的非洲文学作品，将包括阿契贝、提安哥、索因卡（Wole Soyinka）在内的一系列非洲作家推向了国际文学舞台。时至今日，虽然非洲受教育人群正在不断扩大，但是非洲文学作品拥有海外读者人数超过本土读者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此外，尽管非洲国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其文学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从属于原宗主国。如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英联邦作家奖、非洲凯恩文学奖、英国橘子奖、布克国际文学奖、德国书业和平奖、法国费米

那奖、普利策奖、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耶路撒冷奖”等奖项都是由欧美国家发起设立，将其本土和原殖民国的文学创作包括在内。这些都造成了当代非洲文学与西方话语体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当代非洲文学与东方文学的关系更近似于“神交”。“非洲的反殖斗争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斗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蒋晖 web）。由于相似的历史遭遇，非洲国家也曾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加纳国父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和塞内加尔国父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都曾在各自的留学所在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都曾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试图寻求一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历史发展不仅说明了非洲与人类整体命运的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也为非洲文学创作——尤其是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发展勾画了重要的背景和底色。在提到非洲文学时，我们不应该将之视为一块遥远贫瘠、神秘荒蛮的大陆上的偶然产物，而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内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与世界文学同呼吸共命运的内生关系。然而，正如学者蒋晖所说：“作为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我们对另一个大陆所尝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失败的原因以及经验和教训关心不够、研究甚少，真正对非洲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还是西方学者。”（web）这种缺憾，在中国倡导世界政治多极化、世界文化多元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更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二、我国高校外国文学课程设置现状

晚清时期，外语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将功课分为8科，在中国文学门里首次出现了“西国文学史”，包含英、法、德、日、俄等五门国别文学史。“西国文学史”的出现打破了“通儒”“贤人”为中心的儒家教育传统，带动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据资料记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课程计划中，“外国文学”课程引领语言类课程、与中国文学课程互为照应；与文史哲课程协调共进，此时“外国文学”课程建设已步入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共建的西南联大，其“外国文学”课程集结3校优势资源，选修课程多达41门，其组织规模和内容体系令当今高校的相关课程设置望尘莫及，是“外国文学”课程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陆健秋 44）

与过去外国文学课程的蓬勃发展相比，当前，就占外语类专业主体的英语专业而言，文学课在实际教学中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突出表现是授课量和教学内容已被大大压缩

了,“文学课的教师正趋于边缘化”(崔少元 52)。我国的外语类院校一般在本科生的三年级阶段开设英美文学课,学习一年时间,每周的课时数是2节课。现有的大部分文学教材,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和罗经国编注的《新编英国文学选读》均是按照每周4学时编写的。实际上,许多院校都开不到教材所要求的课时。若以每周2学时计,1学年也不过72学时,两学年总共才144学时。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要学完“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文学史”等课程,其时间之紧、内容之多、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其效果恐怕也只能类似于走马观花。为此,2017年编制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强调课程设计回归人文本位,将文学方向列为英语专业方向课程五个序列之一(蒋洪新 5-6)。

在有限的外国文学课时里,英美以外国家的文学史更加失去了一席之地。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目前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设置情况,尤其是英美以外国家文学史的开课情况,笔者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国外语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及教师。在将近100名师生中,仅有约30人表示所在学校有关于非洲文学及文化的课程,比例未达一半。而在这些高校中,关于非洲文学及文化的课程多数为选修课,且课时较少。把非洲文学及文化作为必修课的学校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北京物资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及长沙理工大学。

另一方面,在中国高校语言文学系所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中,同样存在着“重西轻东”的现象。以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为例,其外国文学课程均以西方文学史、西方美学史、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为主体。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的外国文学基础课《外国文学史》,讲授的主要是19世纪以来在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广泛流行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这三大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复旦大学的“20世纪西方文论”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论流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而同时开设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课程,又分为“西方文学概念重构”与“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两大部分,涉及六种主要的批评流派。对西方文学的研究和学习不可谓不细致深入。

此外,比较文学课程为了解外国文学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作为这一文学研究佐证的主要对象,仍然是西方文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的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是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方向,致力于:(1)整体上的西方文学史及中西文学关系研究;(2)按照语种和国别进行的英美文学、古希腊文学、德国文学及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3)专题研究,如文学与思想史、基督教与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乌托邦文学、西方女性文学等。开设的课程有:“莎士比亚戏剧赏析”(本科)、“西方文学名著导读”(本科)、“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生)、“西方文学史概论”(研究生)等。

从以上资料和调查可见,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在教学比重中已经被大大压缩,在教学内容上几乎已经等同于英美文学教学,形成“重西方、轻东方”的僵化格局。作为东方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文学,还没有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关注。非洲文学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

和教材编撰等工作与当前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还存在较大距离。青年学生乃至广大的文学读者群，对非洲文学知之甚少，遑论熟稔非洲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当前，中非经贸合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深层次的中非文化交流却尚待起步。造成文学课处境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师、教材、学生、教法等都是制约文学课顺利实施的主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文学在促进文化理解和互鉴、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

三、当代非洲文学对外国文学教学的补充与拓新

将当代非洲文学纳入当前的外国文学教学中，并适当增加其比重，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改革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丰富学科内涵，赋予时代新意。外国文学本意指除中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然而，由于历史政治、学科建设、出版传播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基本上以英美文学为主体，文学选读不外乎英美作品。偶有涉及东方文学的内容，往往也仅占课程教学的极少部分。这与当代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总量中的占比，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力都极不相称。就英语专业而言，外国文学教学既应包括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这样传统的西方英语文学，也应包括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加拿大文学这些英联邦国家英语文学，还应包括非洲文学中用英语创作的文学。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上，既要精通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艺思想，也要博采其他地区的本土哲学和民间文艺之长，这样才能真正拓宽自己的眼界，反哺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补充当代非洲文学的内容，能够纠正以往教学偏于一隅、以偏概全的局面，促进外国文学学科的多样化。这是外国文学教学的应有之义。

第二，拓展对文学内涵、功能、表现手法等一系列相关议题的认识。非洲文学是非洲人民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生活体验和心理历程等的总结和呈现，有着独特的文化源头、发展背景和内生特质。非洲人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神，甚至每个人都自带了一个小神——“气”，负责掌管自己的情绪和行动，与信奉“一神”的基督教截然不同。非洲人没有“国王”的概念，他们长期以部落聚居，大到战争小到家庭纷争的各种事务均通过由部落首领召集的集体大会加以讨论和决定。这样的传统使非洲人民对自我的认知与他人和集体紧密相连，也形成非洲文学独特的内涵和风貌。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侵略和奴隶贸易重创非洲，当代非洲面临着修复和重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艰巨任务，非洲文学因此也肩负了比任何其他地区文学更加鲜明的政治功能。被誉为“现代非洲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就提出：“作家不能逃避他们理应承担的再教育和精神重建的责任。”（105）从现实情况来看，当代非洲文学无疑胜任了复位并传播非洲文化，替非洲在国际上发声的历史使命。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有文字的历史很短，殖民入侵之前长达数千年的文学主要以口头的形式传播。口头文学成为非洲人传承文化经验，构建集体生活，塑造思维方式的基本元素。

当代非洲作家将口头传统融入书面文学的创作中，以解构西方以文字为代表的书面文学经典和其背后蕴藏的一元中心主义价值观，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表现方式。目前，非洲文学中的口头性正日益引起关注，其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的新形式和新视角值得不断地深入挖掘。

第三，重审世界文学的构成。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往往被解读为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平等共生与交流融合，却忽略了歌德本人具有的民族国家观念和精英主义意识。他最有名的一句论述是：“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了令人高兴的一步。”然而，这句话的下文却是：“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⁴⁾在赞扬中国文学之后，歌德话锋一转，说：“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它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爱克曼 144）可以说，歌德的世界文学观是以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为前提，以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为榜样建立的。如果我们多看看其他地方的文学，例如非洲文学，便能发现：博大深厚的人文底蕴，丰富精彩的语言词汇，奇智多巧的表现手法等，并不仅限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传统，而是以不同形式呈现在不同的民族文学中。所以，当今我们所倡导的世界文学，应该是各民族文学的精华和代表。它们承载着各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意识，又能在人类命运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取得共鸣。尽管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还受制于经济实力产生的话语权，以及出版、传播等因素，但它们在价值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第四，为“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培养精通国别文化的外语人才。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始终围绕着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从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活动。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更是提升了对外语人才，尤其是精通英美国语言和文化的的人才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我国的开放政策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更大的延伸，国家对外语人才的素质要求也更加多元化。《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切实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创新发展。外国文学教学不应仅将目光停留在传统的英美文学上，而应适当增加其他国别文学和文化的讲授。尤其是当代非洲文学中包含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殖民语言创作的作品，既生动地呈现了当代非洲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又为对殖民语言的改造和利用提供了经典的范本。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视野开阔、拥有多元文化观和文化适应能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进而全方位提升我国文化领域的开放水平。

改变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内容和格局，能促进相关研究向区域文学和国别文学深入，并带动相关教材和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更新，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更多详实的一手资料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此而言，当代非洲文学是一座亟待开挖的宝藏。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chebe, Chinua. "The Novelist as Teacher." *Af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edited by Tejumola Olaniyan and Ato Quayson, Blackwell, 2007, p. 105.
- Cui, Shaoyuan. "Globalization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On the Status Quo of Teach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or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3, 2000, pp. 52-55. [崔少元:《全球化与文学教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现状探微》,载《外语教学》2000年第3期,第52-55页。]
- Duan, Jing. "Orature, Performance, and Narration: The Study of Oral Narration in African Writte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s*, no. 1, 2017, pp. 37-45, 157. [段静:《口述、表演与叙事——非洲书面文学中的口头叙事研究》,载《国外文学》2017年第1期,第37-45,157页。]
- Eckermann, Johann Peter, editor. *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 (1823-1832)*. Translated by Guangqian Zhu. People's Literature, 1982.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3—1832)》,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on World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Dacan Fan.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edited by David Damrosch, et al., Peking UP, 2013, p. 4. [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范大灿译,载达姆罗什等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4页。]
- Jiang, Hongxin, and Minmin Xie. "Reflections on Formulating the New National Syllabus for College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o. 1, 2017, pp. 1-10. [蒋洪新、谢敏敏:《关于起草〈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新版)〉的几点思考》,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年第1期,第1-10页。]
- Jiang, Hui. "When Africa Meets Socialism." *Guancha Syndicate*, 20-22 Aug. 2016, www.guancha.cn/jianghui/2016_08_20_371940_s.shtml. [蒋晖:《当非洲遇上社会主义》,观察者网,2016年8月20—22日, www.guancha.cn/jianghui/2016_08_20_371940_s.shtml。]
- Lu, Jianqiu. *Studies on Foreign Literature Curriculum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si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2018. [陆健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课程设置研究:从清末到民国》。硕士学位论文,南京邮电大学,2018。]
- Ren, Yiming, and Shijing Qu. *A Study of English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3. [任一鸣、瞿世镜:《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罗辉

FLC

文学文化研究

谈《白噪音》中现代超市的社会心理意义

◎ 李锋

内容提要: 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展现了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当代美国人在商业社会中的严重焦虑。书中大量购物场景的描写,体现了超市对美国人生活的深刻影响。从购物行为、购买力、包装与广告、商品陈列四个方面来看,现代超市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深刻的社会心理意义——故事中的人们通过在超市的购物行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并通过购买力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商品的包装与广告在培植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同时,操纵和奴役了后者的思想,而超市货物的陈列方式,则代表了现代人的生活秩序与规则,能够给购物者一种强烈的安定感。

关键词: 唐·德里罗 《白噪音》 消费文化 超市 身份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40-08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犹太研究所,上海 200083

Titl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odern Supermarkets in *White Noise*

Abstract: *White Noise*, written by Don DeLillo, shows various problems in a postmodern society, especially contemporary Americans' anxiety in the business settings. The novel's abundant depictions of shopping scenes reflect the impact of supermarket on Americans' daily lif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odern supermarkets in the novel from four perspectives, namely, shopping behavior, purchasing power, packaging and advertisement, and placement of goods. People in the story are establishing their identities through shopping and displaying their values through purchasing power; while cultivating consumers' purchasing desire, packaging and advertisement have manipulated and even enslaved their thoughts, and the way goods are placed in the supermarket represents order and rules in modern life, thus giving shoppers a keen sense of security.

Keywords: Don DeLillo, *White Noise*, consumer culture, supermarket, identity

Author: Feng L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唐·德里罗 (Don DeLillo) 的小说《白噪音》(White Noise, 1985)^[1] 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 记述了大学教授杰克在一学年当中的生活经历与所思所想。这部作品展现了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 特别是超市购物行为对现代美国人生活的深刻影响, 以及在媒体无孔不入、信息大量充塞的当代社会, 现实与幻象的相互交织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小说的核心主题就是现代人对死亡的巨大恐惧和极力躲避——正因为此, 《白噪音》被奥斯蒂恩 (Mark Osteen) 称为“美国死亡之书”(转引自德里罗 8)。

书中同这一死亡主题紧密相关的两个事件是杰科夫妻定期的超市购物之行和化学品泄漏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德里罗本人在访谈中曾提到, 自己在关注美国的环境问题时, 便注意到超市里荧光的亮泽及有毒物质泄漏的新闻报道, 显然是与这二者相对应的。其中超市对于这部小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通过在这里的购物行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 并摆脱内心对死亡的恐惧; 与此同时, 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购买力、商品的包装与广告、超市货物的陈列方式等, 也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功能。

一、购物行为: 身份的建构

超市是《白噪音》全书故事的主要背景之一, 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象。同以百货商店为代表的传统经营业态相比, 超市在商品定位 (以中低端的生活必需品为主)、盈利模式 (主要依靠低采购价和高销量)、销售方式 (以顾客自选为主)、结算方式 (一次性结算) 等方面都更为贴近后现代的理念和特征, 即大众化的需求定位、去中心化的网状布局、碎片化的快速行为, 以及更强的个体自主性。

在故事发生的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社会, 超市购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而是已然上升为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社会行为, 让消费者实实在在地感知到物质存在的伟力。主人公杰克即是如此, 他在超市里选择 (或放弃) 某种商品时, 能够强烈感受到一种由此而来的支配感——在后现代社会, 商品已从纯粹的物品变为一种符号, “人们不再注重其使用价值, 而更加注重‘物’本身蕴含的社会意义。对‘物’这种‘象征符号’的主要占有方式无疑是‘消费’”(周敏 205-206)。此外, 由于超市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售货员, 这一中间媒介的缺席, 让购物者得以直面商品, 其选择的自由度无疑大大增加, 也强化了其内心的支配感。当然, 这种感觉的获取是以牺牲一定的人际沟通为代价的, 即像张艳庭所言的, “这种人与物的直接对话, 既是一种解放, 但也使超市购物有了一种机械化、冷冰冰的特征”(web)。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小说中的杰克平素同家人和朋友之间的沟通极少, 而正是凭借在超市中的购物行为, 他才得以将自己同妻子、儿女 (以及部分同事) 维系到一起, 给这个原本规范有序、冰冷无情的公共空间赋予了一定的人性色彩。至于在超市里具体买什么东西、是否用得上, 对他而言反倒是次要的。在回家的路上, 杰克坦承购物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

我似乎觉得，芭比特和我所买的一大堆品种繁多的东西、装得满满的袋子，表明了我们的富足；看看这重量、体积和数量，这些熟悉的包装设计和生动的说明文字，巨大的体积，带有荧光闪彩售货标签的特价家庭用大包装货物，我们感到昌盛繁荣；这些产品给我们灵魂深处的安乐窝带来安全感和满足——好像我们已经成就了一种生存的充实。（德里罗 21）

有时候，杰克甚至会为了购物而购物，买一堆当前根本用不到、将来也不知何时才用得上的商品。究其原因，就在于杰克内心“这种对金钱的力量和整个消费群体的沉迷 [……] 在货币层面上重新树立起了他的个人价值感”（Weekes 294）。

事实上，这种心理在商业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体现出购物这一社会行为对现代人身份（identity）的界定功能。文化批评家尼克松（Sean Nixon）曾指出，“在商业从业者成功瞄准的人群当中，商品世界在塑造特定的消费主义身份观与社会仪式感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5）。消费社会学的说法则更为具体，“消费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行动。人们消费什么和不消费什么，并不仅仅是对自己可支配的货币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认同行动。‘我’消费什么、怎样来消费，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定位和评价，也就是说，是自我认同的体现”（王宁 60-61）。在这里，我们不妨套用笛卡尔认识论的话语方式，将之称为“我买故我在”。

在《白噪音》的故事中，购物行为（尤其同广告结合起来）便具有这种神奇的力量，“媒体广告使人相信，购物能够让人摆脱个人的创伤。在购物的时候，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身份，即他们到底是谁”（Babaee et al. 32）。对于这种将身份建构与购物行为联系起来的现代消费观，德里罗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因为在流水线批量生产、产品高度标准化的时代，人们购买的商品都是严重趋同的，这就必然导致在身份建构和身份彰显的过程中，个人的独特性也随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个性身份”（impersonal identity）。

除了获取充实感与安全感之外，杰克甚至利用购物行为来摆脱自身对死亡的恐惧，即德里罗所说的普遍存在于现代美国人意识中的一种“不消费即死亡”的心态。遗憾的是，这一方法的时效非常有限，既然购物可以代表生命，照此逻辑推断，到收银台付款即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终结与死亡。因此，威克斯（Karen Weekes）认为，德里罗表面上展现的是当代美国社会中“不消费即死亡”的现象，但实际上根本就是“消费并死亡”的困境（300）。

二、购买力：个人价值的体现

纵观人类历史，资本主义社会比之封建贵族社会的一大进步之处，就在于“个人表现”得以取代家庭出身，成为社会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径，这对打破阶级壁垒、促进公平竞争可谓

意义重大,然而由此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物质主义的盛行,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代表作《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中所坦承的,“财富积累是个人表现最为便利的衡量手段”(133)。这种物质主义倾向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体现十分明显。米勒德(Kenneth Millard)在评价1970年以来的美国小说时曾指出,“美国人的追求范围有时简直成了购买力的问题,这种不加辨别的物质主义经常成为美国小说家的描写对象”(112)。

《白噪音》即是如此。如前所述,杰克通过在超市购物来建构个人身份、实现自我价值,而且,购买的东西愈多,他内心的自我认可度就愈高:

我用钱买下商品。我花的钱越多,钱的重要性似乎越小。我比这些款子更大。这些款子像倾盆大雨一样冲刷我的皮肤。这些款子事实上以我实际的存款形式返还给我。我感觉到自己豪爽气壮,意欲彻底地慷慨大方一回。(德里罗 94)

显然,通过货币交换而来的商品,作为一种抽象的消费符号(而非切实的日常消费品)给购物者带来强烈的满足感和兴奋感。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物成为符号,从而就不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于与其他的符号的差异性关系之中。有点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神话,符号-物在它们之间交换。由此,只有当物自发的成为差异性的符号,并由此使其体系化,我们才能够谈论消费,以及消费的物”(56)。在超市中,杰克通过货币(及其体现的购买力)实现了自己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寻,并借助这一消费体系中的差异性来定位身份;在此过程中,物凭借其符号价值,将人和符号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而对于物的消费,彰显了符号系统的差异,使得消费品异化为一种符号语境中的意指逻辑。

除了超市购物之外,类似的满足感在杰克与ATM机的联系中也得到充分体现。ATM机是一个类似于超市的意象,两者都是现代商业和科技的象征符号:跟超市相似,由于出纳员的缺席,ATM机以人与物之间的直接接触,取代了银行中传统的人际交往;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通过量化的方式,对用户产生界定身份、赋予力量的功效。例如,杰克去查询银行卡中的余额,当ATM显示的数字验证了他的应得收入时,他立刻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

早上我步行去了银行。我在自动柜员机上核查我的存款。我插进信用卡,输入密码,键入我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文件搜索和烦人的计算,屏幕上终于有气无力地出现了数字,它与我自己估计的大致相当。一阵阵解脱和感激的暖流通过我全身。这个系统赐福于我的生活。我感觉到它的支持和赞同。系统的硬件,坐落在某个遥远城市中一间上锁的房间里的中央处理机!多么令人愉快的交互作用!我体验到某种深深的个人价值——但是并非金钱,绝非金钱——已经被证实和肯定。(德里罗 50)

恰如杰克内心的力量感源于他在超市中的购物数量和消费数额，ATM屏幕上显示的账户余额，决定了他的满足程度及对未来的自信程度，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毕竟“财富和收入的首要意义，是扩大消费者选择的范围”（鲍曼 75），而不是作为资本的增利功能。

遗憾的是，同超市购物一样，这种心理慰藉只能是暂时的，亦是不稳定的，一旦显示的余额存在问题（比如机器故障，或者显示收入低于其心理预期或消费需求），并影响到随后的消费能力，杰克必将陷入极度的焦虑与不安。

三、包装与广告：思想的奴役

超市之所以吸引消费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中的商品包装和宣传广告。加什玛利(Ahmad Ghashmari)专门指出《白噪音》中商品外观对顾客的影响，“购物者被颜色、尺寸、包装所吸引；正是外表吸引并牢牢抓住其注意力，并且激发起购买欲望，不管对自己有用与否”，换言之，“货品琳琅满目的超市已将现实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外表取代真实产品的超现实”（181-82）。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消费社会，购物选择有时候并不取决于消费者本人真正需要什么，而是取决于生产者想要销售什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后者会采取包装和广告等各种手段，极力培植前者的购买欲望，使其获得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感，这就导致消费行为的性质逐渐发生改变，即鲍德里亚所言的人类经济生活从“需求-供给”模式转向“欲望-浪费/享乐”模式。

根据商业伦理学的观点，这一有悖于自然的情况意味着以下三点：（1）广告通过制造需求，把供需法则给颠倒了过来。供给已不再是需求的功能，反倒是需求成了供给的功能；（2）广告和营销容易让顾客产生非理性的、琐碎的消费需求，而这会扭曲整个经济。满是消费产品和物质享受的“富裕社会”，其实在很多方面比所谓的“欠发达经济”更加糟糕，因为资源都被耗费到私人消费品上，无法用于更为重要的公共福祉和消费需要上；（3）通过创造消费需求，广告和其他营销手段违反了消费者的自主性。消费者以为自己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是自由的，可如果这种需求是由营销产生出来的，他们并不自由（DesJardins 208）。总之，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无可避免地被广告所操纵，却沉浸在拥有“自由选择的意志”的幻觉中。

除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之外，广告和媒体还成功占领了现代人的潜意识，剥夺了他们的最后一点自由。杰克的女儿斯泰菲在睡梦中的呓语居然是“丰田赛利卡”（Toyota Celica）。这么一个简单的汽车品牌，两个几乎没有意义的单词，在做父亲的杰克听来，却“发音美丽动听而又神秘莫测，金光灿灿之中闪现着奇妙”，甚至让他“感觉到一种意义和一种存在”（德里罗 171）。由此可见，在表象丛生、真假难辨的后现代社会，以商业广告为代表的各种信息复制和图像传播已达到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程度，人们只能生活在由其产生的“超现实”中，无法识别事物的本真面貌。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创作这部小说的80年代，主流的广告媒体还只是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超市画册等传统纸媒；假设这部小说再晚创作二十年，面对互联

网与手机广告的强大可怖，相信德里罗一定会对此做出更加形象和富有震撼力的刻画与诠释。

杰克的同事、大众文化系教师默里是书中为数不多的跳出物质层面、关注精神层面的智者。虽然也深受消费主义影响，但默里有着自己的一整套购物理念。他专门购买没有品牌的“普通食品”（generic food），而对产品包装与广告不甚在意。“普通食品”的包装极其简单，除了产品名称、原料、营养成分、制造厂家和条形码这些最基本的信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广告开支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其制作和销售成本相对低很多。这种食品最早出现于1981年的美国超市，以其相对低廉的价格受到部分消费者的欢迎，并在1983—1984年（即《白噪音》故事背景所处的年代）达到销售顶峰。有不少人认为，“普通食品”在口味和营养价值上要逊于品牌食品，但其实当时美国的多数“普通食品”生产，在原料和工艺流程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在很多对消费者所做的蒙眼测试中也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普通食品”还是往往给人以“次品”的感觉，并在80年代后半段开始走下坡路（可见心理作用对市场有多重要），部分零售商为此甚至对普通食品进行再度包装，打上自己商店的牌子，以维持销量。到1988年，“普通食品”已经从美国市场上完全消失。

至于默里购买“普通食品”的目的，除了省钱之外，还体现了他所谓的一种“新式的消费节制”，是“对某种精神上的共识做出了贡献”（德里罗18-19）。就这一点而言，默里并没有被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完全奴役，思想境界似乎比杰克更高一筹。此外，默里还把超市看成是一个“从精神上充实我们、装备我们”（40）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充满了精神数据，所有的字母、数字、颜色、声响、代码都蕴藏着深刻的含义，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破译，他甚至将超市的环境同西藏文化中的死亡艺术联系起来，大谈人类应对死亡的正确态度。

四、货物陈列：秩序的象征

除了建构身份与制造需求之外，小说中的超市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功能，即存在与秩序的象征。从表层看，超市只是购物行为发生的物理场所，但在更深层次上，超市代表了现代人的生活秩序与规则，能够给购物者一种强烈的安定感。

以其空间布局为例，根据消费者心理学的观点，“一家商店的布局方式会影响消费者对商店‘个性’的认知”（福克塞尔等253）；也就是说，原本在内容和功能上大致雷同的超市，由于布局方式的差异，便具有了某种结构上的独特性，给身处其中的消费者不一样的心理体验。

事实上，几乎所有超市的区域划分和货物摆放都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出于销售利润的考虑：（1）就时长而言，消费心理学家曾对顾客在商店内的行走方式进行过系统研究，发现“消费者在自我服务的商店中花费的时间更多些，路过、端详更多的物品并可能购买”（254）。超市在此方面显然具有天然优势，它可以赋予顾客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和驾驭感，让其愿意在此逗留；（2）就具体路径而言，多数超市都会规划设计出一条近乎单向的行走路线，让顾客最大限度

地接触待售商品，同时也使得购物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线性叙事属性（linear narrativity），让身处其中的顾客产生一种叙事过程中的可预期感（当然，顾客可以自行决定究竟是遵循还是打破这一路线）。拥有了更多主体性的顾客，如同被赋予了更多阐释权的读者，在超市这样一个“后现代文本”中不断地行走和选择，参与其意义的建构与解构。

正因为此，在《白噪音》的故事末尾处，杰克常去的那家超市由于种种原因重新摆放了货架，这件原本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让顾客感觉到极大的困惑和迷惘：

超市货架被重新摆过了。这发生在某一天，事先却未有预告。过道里弥漫着焦躁不安和惊慌失措，老年顾客的面孔上可见沮丧惊愕。他们行走时神志恍惚，时而止步、时而前进；衣冠楚楚的小堆人群在过道里发呆，试图弄明白货架摆放的格局，搞清楚其中的逻辑，试图回忆他们是在哪儿见过麦酪。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理由需要重新摆放货架，也发现不了其中有什么意思。（德里罗 360）

这种混乱局面，即是源于超市中原有秩序的突然缺失，以至于顾客骤然间失去了方向感和稳定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唯一没有更改货架的，反倒是那些没有品牌、包装简单的“普通食品”，这意味着那些看起来最平淡无奇的东西，往往才是生活的根本所在，而除此之外的内容，其实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只会混淆视听、干扰判断。至于顾客最终极不情愿地接受新的超市布局，则象征着现代人对规则变化的无奈适应。

其实，杰克选择以希特勒为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也跟其对秩序的极度渴望有关。在他心目中，纳粹德国虽然罪大恶极，但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谨严的秩序和纪律，能够给人以心理上的安定感，可以帮助自己有效抵抗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他给儿子起名海因里希，跟纳粹党卫军首领同名，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与此同时，在这个一切都已商品化、符号化的后现代社会，希特勒也成了—个消费符号：首先，作为一个相对冷门的研究对象，他无疑是杰克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的来源；其次，书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希特勒领导的战争暴行和种族屠杀，而仅仅提到他的个人形象和公共演讲，这就使得希特勒成了一个“规则体系中的能指，并不显示这个名字的道德含义，而是学术市场上的一件用来交易的商品”（Reeve and Kerridge 307）。因此可以说，杰克对希特勒研究的选择，说到底也是一个商业行为，跟他在超市中对货物的选择并无本质区别。

总之，超市既是《白噪音》的叙事背景，也是贯穿全书的重要意象，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功能。人们通过在超市的购物行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并通过购买力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超市商品的包装与广告在培植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同时，也操纵和奴役了后者的思想，而超市货物的陈列方式，则代表了现代人的生活秩序与规则，能够给购物者一种强烈的安定感。以上超市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折射出当代美国人在商业社会中的种种焦虑。

注释 [Notes]

- [1] “白噪音”原是一个声学术语，指的是一种功率频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信号或随机过程。加州州立大学的文学教授邦卡（Cornel Bonca）曾将作为现代科技产物的商品所发出的噪音称为“消费文化的白噪音”，是“晚期资本主义自身酿制的苦果”（33），而在这部小说中，白噪音用来“喻指超越一切的死亡之音，表现美国人心灵深处的焦虑”。见刘海平、王守仁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4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253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bae, Ruzbeh, et al. “Sketch of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2, no. 1, 2014, pp. 30-33.
- Baudrillard, Jean. *Le système des objets*. Translated by Zhiming Lin. Shanghai Century, 2001.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1。]
- Bauman, Zygmunt.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Translated by Ziming Qiu and Lan Li. Jilin, 2010. [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Bonca, Cornel.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the Species.” *College Literature*, vol. 23, no. 2, 1996, pp. 25-44.
- DeLillo, D. *White Noise*. Translated by Ye Zhu. Yilin, 2002. [德里罗：《白噪音》，朱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DesJardins, Joseph. *An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Ethics*. McGraw-Hill, 2011.
- Foxall, Gordon R., et al. *Consumer Psychology for Marketing*. Translated by Lifang Pei and Runyu He. China Machine, 2001. [福克塞尔等：《市场营销中的消费者心理学》，裴利芳、何润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 Friedman,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 Ghashmari, Ahmad. “Living in a Simulacrum: How TV and the Supermarket Redefines Reality in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 *452°F: Electronic Journal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 3, 2010, pp. 171-85.
- Millard, Kenneth.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Fiction since 1970*.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6.
- Nixon, Sean. *Advertising Cultures: Gender, Commerce, Creativity*. Sage, 2003.
- Reeve, N. H., and Richard Kerridge. “Toxic Events: Postmodernism and DeLillo’s *White Noise*.” *Cambridge Quarterly*, vol. 23, no. 4, 1994, pp. 303-23.
- Wang, Ning. *Consumer Psychology: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2001. [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Weekes, Karen. “Consuming and Dying: Meaning and the Marketplace in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 vol. 18, no. 4, 2007, pp. 285-302.
- Zhang, Yanting. “Supermarket: Townspeople’s Shopping Aesthetics or Carnival.” *Eastday*, 26 Feb. 2017, mini.eastday.com/mobile/170226145114638.html. [张艳庭：《超级市场：市民阶层的购物美学或狂欢节》，东方资讯网，2017年2月26日，mini.eastday.com/mobile/170226145114638.html。]
- Zhou, Min. “Daily Life as ‘White Noise’: A Cultural Reading of DeLillo’s *White Nois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4, 2015, pp. 202-11. [周敏：《作为“白色噪音”的日常生活：德里罗〈白噪音〉的文化解读》。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202-11页。]

论小说《地下铁道》文学符号的历史文化隐喻

◎ 林莉

内容提要: 美国非裔作家怀特黑德的新作《地下铁道》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把美国历史上奴隶制的残暴和主人公戏剧化的逃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部讽喻美国当代政治图景的传奇故事。《地下铁道》中存在着无处不在的文学符号,它们所隐含的历史文化寓意,不仅使小说内容更加丰富多义,生动地再现了一段美国历史,抨击了曾经的奴隶制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类文明的颠覆,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关键词: 科尔森·怀特黑德 《地下铁道》 隐喻 狂欢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48-11

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Title: The Literary Metaphors in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Abstract: In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the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Colson Whitehead subtly blends the reality and fiction into a legendary story to reflect the current American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re are ubiquitous literary metaphors in the novel, which conve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se literary metaphors not only make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 richer with multi-meanings, vividly show a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attack the slave system once ex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distorted human nature and subverted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foundly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the human nature.

Keywords: 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metaphors, carnival

Author: Li Lin, Professor,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China.

科尔森·怀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 这位厄普代克 (John Updike) 所说的“挥洒自如的天才作家” (Maus 36), 是 21 世纪第一位凭借一部小说同时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的作家。怀特黑德 1969 年出生于纽约, 1991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 大学期间和美国著名青年诗人扬 (Kevin Young) 成为好朋友, 毕业后为美国老牌杂志《村声》(The Village Voice) 撰写专栏, 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人文学科强校, 并担任怀俄明州立大学等高校的驻校作家。1999 年其处女作《直觉主义者》(The Intuitionist) 进入笔会/海明威奖的决选名单; 第二部长篇小说《约翰·亨利日》(John Henry Days) 进入普利策奖决选名单; 2003 年的散文集《纽约巨像》(The Colossus of New York) 被誉为 9·11 后最好的纽约故事。迄今为止, 怀特黑德共写过七部小说和两部非虚构作品, 其创作题材广泛, 风格迥异, 被《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 称为“文学变色龙” (Maus 64)。

应该说, 怀特黑德已经成为美国中青年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2016 年 8 月, 构思长达十六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的出版更是让他备受关注。小说出版的当年就入选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书目, 同时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收入夏季书单。11 月, 《地下铁道》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次年 4 月, 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自此“地下铁道旋风”席卷全美, 迅速引起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密切关注。奥巴马总统说: “这部小说让我们回忆起发生在几代人间的奴隶买卖之痛。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将痛苦公之于众, 还在于它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小说家厄普代克也说: “怀特黑德的作品实现了写作的应尽之务, 它刷新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纽约时报》评论说: “这部有力甚至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让读者从惨烈的行文中明白了美国蓄奴制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创伤。小说家借鉴了博尔赫斯、卡夫卡以及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写作手法, 更让读者回忆起美国人不畏艰险, 不论历史倒退的车轮, 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决心。他的故事在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过去乃至美国当下都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观察家报》评论说: “怀特黑德锋利的叙述是如此才华横溢 [……] 很久没有一本书能这样打动我并让我时刻想着读下去。这是一个令人深思、令人愤怒、并展现作者超绝想象力的故事, 不仅为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点亮一盏明亮的光, 同时也在小说这种文学题材上开辟了新的方向。”(怀特黑德 封面)

阅读《地下铁道》会让读者联想起莫里森 (Toni Morrison) 的《宠儿》(Beloved)、哈利 (Alex Haley) 的《根》(Roots) 及电影《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 里的一些情节, 然而这部小说却有其独特的叙事特点和内容。作者将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具有比喻性质的地下铁道废奴网想象成一个真实的铁道网络并在小说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加以叙述。小说讲述了一名黑人女奴逃离白人种植园的故事。黑人少女科拉是一个在白人家庭中受尽欺辱和强暴的女奴, 终日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由于受到白人奴隶主残酷的虐待, 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在别无选择之后, 她开始了逃离生涯。期间, 地下铁道带着她离开曾经的伤心地, 奔向自由之路。地下铁道在给科拉带来安全感和希望的同时, 也预示着一个未知的理想的世界。

然而，每次重回地面之上后，残酷的现实总是带给她绝望。小说的最后，科拉慌忙踏上地下铁道的最后一程，却不知道这段铁道到底会通向哪里，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和悬念的设计使得小说情节更加扣人心弦。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逐一解析小说中的重要文学符号，从而分析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寓意。

一、小说中的民间节庆筵席符号隐喻

所谓符号是指信息的载体和信息传递的媒介物。符号涉及的范围相当宽泛，凡是人类所承认的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均可被看作符号。现代符号学研究者一般都将符号看作是在一定场合传达某种信息的有意义的媒介物。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文化符号形式论、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解码理论、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商品符号学，都是引人注目的符号学研究。符号包括所指和能指，现代符号学奠基人之一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把人类的文化符号分为标志、图像、象征三种形式。象征和隐喻本来是符号中的一种形式，这种书写方式可以让所指变成能指，具有构形功能，即赋予无形的人类的情感经验，精神风貌等文化理念以形式。各种文化形式或象征形式——神话、语言、宗教、巫术、艺术等——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赋形化、符号化，这是一个内容转化为形式的文化积淀过程。文学隐喻研究从传统的外部研究进入到内部研究，是隐喻研究的第一次转变。对文学符号的隐喻研究则更有助于挖掘小说的深层含义。

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诙谐的表演或仪式，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符号具有更为深刻的隐喻含义，在《地下铁道》中占据重要地位。小说开篇就是一场夸张、隆重并充满欢乐基调的黑人筵席描述。工作完毕后的奴隶聚集在农庄的空地上吃饭、喝酒，为一位眼瞎腿瘸的老黑奴庆祝不知多少岁的生日。这个所谓的生日晚会是黑人自建的节庆仪式，绝非黑人日常的生活和吃喝。

乔基的生日每年只有一两次。他们想搞一回适当的庆祝。这历来是星期天的下午，他们的半天工作日。三点钟到了，工头发发出收工的信号，北种植园赶紧投入准备，手忙脚乱地做起杂物。修修补补，清除苔藓，堵住屋顶的裂缝。一切以宴会为重，除非你获准外出，进城卖手工艺品，或多打一份零工。就算你不想赚外快——不会有人真心不想——但身为奴隶，也不可能放肆到告诉一位白人你不能工作。别说什么这是某个奴隶的生日。人人都知道黑鬼没有生日。（怀特黑德 13）

这场生日狂欢的参与者是这个庄园的全部黑奴，体现着备受苦难的黑人对自由的乌托邦社会的向往。受苦的黑人奴隶生活暂时得到再生与更新。正如小说中的描述，“年轻的奴隶和

年老的奴隶聚集到了马道两旁。男人们挤作一团，交换着苹果酒的罐子，感觉自己的耻辱慢慢消散”（怀特黑德 28）。

民间节庆筵席除了是自建节日这个特点之外，通常都有集市和丰富多彩、自成体系的广场娱乐活动。一些巨人、侏儒、残疾人和学会了特别技能的野兽参加表演，在上演宗教神秘剧和讽刺闹剧的日子里，到处都笼罩着狂欢节的气氛。举行世俗的日常庆典仪式时，通常也有诙谐的表演，小丑和傻瓜是必不可少的参加者，他们讽拟严肃庆典的各种活动，所有这些以诙谐因素组成的仪式-演出形式，与严肃的官方（教会和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它们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巴赫金 7）。例如在《地下铁道》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让一个年轻的奴隶背诵《独立宣言》。“迈克尔从前的主人对南美鹦鹉十分着迷，因此推断，如果能教一只鸟学会打油诗，那么教一个奴隶记点东西，八成也能行得通”（怀特黑德 37）。会背书的奴隶迈克尔就时常被要求在狂欢筵席上背《独立宣言》以博得主人们的笑声。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描述，强调了在美国奴隶制期间，黑人完全被当成了动物一样的非人类，同时嘲讽了在奴隶制时期的《独立宣言》根本不是对黑人实际生活状态的正确描述。

民间广场狂欢节的第三个特点是参与狂欢的人们暂时取消了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的某些规范和禁令，形成了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此时的人们没有任何距离，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自由地接触。宇宙、社会和肉体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展现出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是一个欢快而安乐的整体。

当音乐响起，跳舞开始，他们对乔基的感激之情进一步提升。他又一次选对了做寿的日子。除了日复一日的奴役，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一种人人都有有的紧张，一种集体的恐惧。它不断积聚，增压。最后这几个小时却化解了很多遗憾。他们得以面对早晨的苦工，以及往后的一个个清晨，一个个长日，因为有了重新填注过的心气儿，哪怕它还是那么贫瘠，也因为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良宵，还有下一个可以期盼的寿宴。他们围成一圈，把人的精神留在里面，与非人的外界隔开。（33）

人类在对待世界和生活的态度上往往有双重角度，即严肃的（就其组织方式和音调气氛而言）祭祀活动和嘲笑、亵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仪式游戏）；有严肃的神话还有诙谐和辱骂性的神话；有英雄，同时还有讽拟英雄的替身。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之现实的同时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是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巴赫金 8-10）。也可以说：在狂欢节上，生活本身在演出。这里没有舞台、栏杆、演员、观众，即没有任何戏剧艺术特点的演出。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

由的形式，是自己在最好的方式上的再生与更新。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同时也是它再生的理想形式。

由此可见，《地下铁道》中奴隶在星期日下午的庆生狂欢节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被奴役、被虐待的民众以诙谐的形式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即普通民众的节庆生活，这些节庆活动于是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音乐停了。众人围成的圆环碎裂了。作为一个奴隶，总有些时候要迷失于短暂自由的漩涡。如在垄沟，当一阵突如其来幻想引起了波动；或在清晨，当一个梦的神秘慢慢展开。在一个温暖的星期日的夜晚，在一首乐曲的中间。然后它来了，一定会来的，那是监工的叫喊，是要你上工的召唤；那是主人的影子，是一个提醒：在永恒为奴的状态里，只有这微芒般的一刻，你还算是个人。（怀特黑德 34）

正如历史上，也像在小说中展现的那样，节庆活动往往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密切联系。死亡与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通过一定节日的具体形式，形成了节日特有的节庆性。

二、小说中人体惩罚符号隐喻

莫德尔（Arnold Modell）从神经学的角度探索了隐喻的认知功能，他认为“隐喻是情感思维的通货”（7）。隐喻表现了神经心理过程，不自觉地对情感进行归类，确立过去与现在的异同；隐喻能进入未知的事物并促进移情发生。隐喻不仅传递不同域之间的意义，而且通过域之间的整合，产生新的意义或使意义发生改变。由于所涉及的域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其意义改变的可能性也几乎是无限的。隐喻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物特性。隐喻能产生无限的想象，即隐喻是想象的核心。莫德尔认为身体隐喻转换的感觉可以作为创建幻想的模板。人们能够把身体的感觉和情感组织成概念和感性隐喻。既然隐喻是人类生物特性的一部分，作为表现人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经验的文学作品自然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身体隐喻（10）。

《地下铁道》中和民间节庆筵席密切关联的另外一个情节就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人体惩罚叙述。

乔基的生日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科拉还没好利索。脸上遭到的重击一度让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还给一侧的太阳穴造成了明显的创伤。肿块已经消失，但是银狼吻过的地方，现在留下了一个让人心悸的X形疤痕。很多天还在渗漏。这是宴会之夜给她留下的印记。更为糟糕的是第二天早晨康奈利对她的鞭打，就在笞刑树无

情的大树枝下。(41)

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每一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甚至更为残暴的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其中包括示众、鞭打、烙印等。小说中的酷刑似乎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这些惩罚仪式首先展示受刑者,同时给受刑者刻上耻辱的烙印,这种烙印或者通过在身体上留下的疤痕,或者是通过酷刑的场面,在犯人的身体周围或者身体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忘记示众、戴枷受辱、酷刑和历历在目的痛苦。事实上,从规定酷刑的法律角度看,公开酷刑和死刑让所有人把它看成一种凯旋仪式(福柯 36)。例如小说中一段白人奴隶主宴会的描写:

特伦斯订购了新刑具。刑具装设于前草坪,四周绿草如茵。两个工头把大安东尼锁牢,让他悬吊在那儿,这是头一日。第二天,一队来宾坐着四轮大马车驾到[……]优雅的女士和绅士,是特伦斯外出公干时结识,还有一位伦敦的报馆记者,专程前来报道美国风情。草坪上铺设餐桌,他们围坐而食,细细品尝艾丽丝做的鳖汤和羊肉,奉上对厨师的种种赞美,反正她本人绝不会听到。他们用餐期间,大安东尼受着鞭刑,而他们细嚼慢咽。甜点上来了[……]与此同时,对大安东尼的惩罚还在继续。(怀特黑德 53)

可以看出,奴隶主对奴隶的惩罚具有深刻的符号意义。刑罚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它会造成伤害。这就意味着,处于刑罚核心的痛苦不是痛苦的实际感觉,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的观念,即“痛苦”观念的痛苦。惩罚利用的不是肉体,而是表象(representation)。更确切地说,如果它利用肉体的话,那么肉体主要是某种表象的对象,而不是痛苦的对象。痛苦的记忆应该能够防止罪行重演。肉体的惩罚可以防止犯罪的蔓延。痛苦本身不再是惩罚技术的工具,白人奴隶主要尽量扩展惩罚的表象,而不是体罚的现实。

除了刑罚本身,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刑具也表现了奴隶主对黑人奴隶曾经的血腥镇压,“她首先看到了镣铐。几千条,挂在墙壁的钉子上,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藏,手铐,脚镣,用于手腕、脚踝和脖子的枷锁,各种形式,各种组合。防人逃跑、使人无法移动手脚的镣铐,把身体悬吊在半空中进行殴打的锁链。有一排儿童专用的镣子,还有与之相连的小铐子和小铁环”(73)。这些刑具表现了奴隶主对黑人奴隶使用过的残暴手段,也间接地控诉了奴隶制的非人性特点。南方的白人奴隶主似乎发现黑人的身体是权力控制的对象和目标,需要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于是白人奴隶主就用血腥的权力强加给这些黑人身体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黑人奴隶被不断地操练,并在他们身上采用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手段,试图锻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又“驯顺”的黑人肉体。这样既让黑人奴隶有极大的工作能力,同时又把后者置于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之下。

《地下铁道》中美国南方奴隶主对黑人奴隶采取的另一种人体惩罚措施是监视居住。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区别对待各个肉体、各种疾病和症状、各种生与死，并将人员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地下铁道》中多次出现这种隔离空间，例如科拉曾经在不同区域居住过的伶仃屋、红砖公寓、白人房屋上面密不透风的阁楼等。这些密闭的隔离区域暗示着奴隶主对奴隶无所不在的控制和压迫。

科拉慢吞吞地走向伶仃屋，那是奴隶主放逐苦命人的地方。没有地方讨还公道，没有法律，就算有，这法律也是每天都重写着[……]落难伶仃屋，与那些被监工的惩罚弄成跛子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与那些被你能看到和不能看到的各种方式累断了脊梁骨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与那些错乱了神志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与无家可归者为伍。（怀特黑德 19）

被搁置在隔离区域的人的身体同时也成为一个工具或媒介，一种可触动的财产。人们干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劳动，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奴隶主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根据这种惩罚，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于是，最严厉的惩罚不仅施加于肉体，曾经只是降临在肉体上的死亡更是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奴隶主真正想要打击的是奴隶的灵魂而非肉体，小说家通过这样的描述更加深刻地抨击了美国曾经的奴隶制对文明的践踏和对人性的扭曲。

在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白人奴隶主的权力方面，公开处刑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以及用惩罚取乐的快感。小说中这样描述到：

她看不透西泽。在那三个早晨，她遭到鞭打时，西泽就站在人群前列。奴隶们观看同为奴隶的遭受凌辱，是进行品德教育的一贯做法。表演期间，临到某一时刻，也不止一个时刻，所有人都不得不背过脸去，因为他们对那奴隶的痛苦感同身受，想到或迟或早轮到他们惨遭鞭打的那一天。是你在那儿，即使现在不是你。但西泽没有退缩。他没有直视科拉的眼睛，而是看着比她更远的某处，某个大而难以辨识的东西。（52）

会识字会手艺的黑人奴隶西泽意识到了白人奴隶主对于奴隶的精神折磨，他坚决要带着科拉逃到自由的北方。也许正如黑人西泽潜意识里意识到，却永远不会表达的一样，在这个国家，惩罚制度甚至是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学”。尽管有时这种惩罚并不使用粗暴的、血腥的手段，尽管它们使用禁闭或教养的“仁厚”方法，但是，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即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在这里，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

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的重要性在于：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是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和运作，人们应该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活动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

三、小说中的地下铁路符号隐喻

如果说身体隐喻是人类以身体为参照认识和描述世界，非身体隐喻如象征和意象则是人们借助自身的经验或经历来理解周围的世界，两者都通过类比或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来发现不同域之间的异同，以此达到表达情感和思想的目的。非身体隐喻是依赖身体以外的物体作为认知的来源。非身体隐喻的认知手段主要是象征和意象，通常用具体的物体来表示较为抽象的想法和更广泛的领域，如道德、宗教、哲学概念。非身体隐喻的意义是共享的，往往起源于传统或神话，是某一类文化的产物（施叶丽 59）。作者往往会利用人所特有的隐喻性认知，通过多重的象征来表现他对哲学、社会、宗教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地下铁道》中，最重要的描述就是地下铁道这个隐喻意象了。作家似乎践行了法国小说家拉伯雷的话，“你们的学者抱怨古人把一切都写过了，一点新的东西也不留给他们去发现，很明显这是错误的。天空所显现的，地上所展示给你们们的，江河海洋所包含的这一切，和地下所贮藏的比起来，那简直是无法比拟”（转引自巴赫金 421）。有趣的是，根据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典故，伟大的财富和神奇的事情也有很多发生在地下，例如谷物女神德墨忒尔和其女儿地狱女神珀耳塞福涅，他们所赞颂的东西往往都在地下。在《地下铁道》中，一股强大的向下、向地球深处、向人体深处的运动从始至终贯穿着小说的世界。

台阶尽处是一座小型月台。巨大隧道黑洞洞的入口分居两端。这里少说也有六米高，墙面铺了石子，组成深浅相间的图案。一定是不折不扣的产业化劳动，才让这样的工程变为可能。克拉和西泽注意到了铁轨。两条钢铁的轨道由木制的路枕固定在地面没在他们可以看到的隧道内延伸。铁轨想必是南北走向，从某个不可思议的源头出发，通往一个难以置信的终点。（怀特黑德 75）

关于地下铁路的描述是小说构思的最主要部分。《地下铁道》的名字会让读者直接联想到美国历史上的地下铁道废奴网。原本意义上的地下铁道是 19 世纪在美国废奴主义者把黑奴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以至海外的秘密网络，是非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重要历史象征。美国内战前夕，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北方较早废除了奴隶制，大多数都是自由州；

而南方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北方，在经济模式上也依靠大量的黑奴。为此，北方的自由州与南方的蓄奴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相持不下，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奴隶暗中越过南北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去追寻自由。在他们所经之路上，有无数不知名的男女帮助他们藏匿行踪、逃脱追捕，把他们送往安全地带，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铁道”。这个使黑奴脱离奴役的网络被称为“地下铁道”，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的网络，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交通，被称为“铁道”是因为在其运行中使用了一些铁路运输的词语。“地下铁道”由“火车”（集体逃亡的奴隶群）、“乘务员”（组织集体逃亡的领导人）、“车站”（沿途投宿的地点）和很多条“轨道”（逃亡路线）组成。南北相邻的各州，都有许多通往北部和加拿大的路径，这些道路就成了“地下铁道”的“轨道”。建成初期，大多数逃亡者都是男性，他们通常步行。后来，逃亡者队伍越来越大，妇女和儿童也加入进去，就准备了护送车辆，把逃亡者装进带帆布篷顶的大马车和特设密闭隔离间的农场货车。为了躲避捕奴队，逃亡黑奴和乘务员都是昼伏夜行，并尽可能涉水泅渡，以避开警犬的追踪。

怀特黑德运用其超凡的想象力，以历史上的“地下铁道”为原型，把黑奴逃亡的空间由地上转移到地下，把逃亡的道路幻化成火车的轨道，把大马车和农场货车改装成真实的火车，使得地下铁道成为整部小说最别出心裁之处。“问题是某个目的地可能比另一个更合你的心意。车站会暴露，路线会中断。等你到了站，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每个州都不一样，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可能，有自己的风俗和做事的方式。你们往下走，走到最后一站，就会看到这个国家有多么宽广了”（怀特黑德 77）。

应该说，地下铁路在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怪诞风格，而且这种怪诞风格不是静止的，它恰恰追求在这一怪诞形象中囊括一种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形成、生长和永恒的未完成性、非现成性。地下铁路这个意象表现着形成过程的两极：消逝和新兴、垂死和诞生；它在一个身上表现两个身体，即新的生命细胞的繁殖和分裂。每当奴隶科拉走投无路，她便想尽方法来到地下，寻找地下铁道。此时近似于地面上的死亡来到了地下铁道边上就变成了孕育，一切限定特征的、僵化的、现成的东西都被抛向地下，得到重铸和再生。地下铁路这一怪诞形象表现的是在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阶段，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状态的现象特征。“火车颠簸着驶入隧道。向北行进。司机大叫：‘全体登车！’科拉心想，别看这男孩头脑简单，履行起职责来倒毫不含糊。她往回看。她的地下监狱不断暗落，为黑暗重新吞没。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的乘客。也许下一位旅行者无须滞留，可以一路向前，直达自由”（165）。怪诞的地下铁道形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这个地下铁道没有任何完成的、稳定的、安定的东西，它类似于濒于老朽、已经变形的身体与尚未长成的新生命的结合。正如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这里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地下铁道就是未完成性本身。怪诞的铁道不与外在世界分离，不是封闭的、完成的、现成的，它超越自身，超出自身的界限。这是永远非现成的、永远被创造和创造着的事物，它是人类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

地下铁道这个文学隐喻符号代表着“上”和“下”两种绝对和严格的地形学意义。上是天，下是地，地也是吞纳的因素（坟墓、肚子）和生育、再生的因素（母亲的怀抱）。从宇宙方面来说，上和下的地形学意义就是如此。从肉体本身来说，上就是脸（头），下就是生殖器官、腹部和臀部。在怪诞现实主义中，下靠拢作为吸纳因素同时又是生育因素的大地，贬低化既是埋葬，又是播种。置于死地，就是为了更好更多地重新生育。贬低化意味着靠拢诸如交配、受胎、怀孕、分娩、消化、排泄这类行为。贬低化为新的诞生揭开肉体的坟墓。因此，下即大地不仅具有毁灭、否定的意义，也具有肯定的、再生的意义；它是双重性的，既否定又肯定。下是指打入生产的下部，就是那个孕育和诞生生命的下部，万物都由此繁茂生长；怪诞现实主义别无其他下部，下部就是孕育生命的大地和人体的怀抱，下部永远是生命的起点（巴赫金 25）。在小说的中间，当女主人公再次逃离奴隶制，通过地下铁道奔向自由时，作者这样描述到：

科拉有了光，还有了另一种她在南卡罗来纳不曾拥有的东西——声音。铁轨中间黑暗的水塘，由车站顶部稳定滴落的水珠注入。上方的石头拱顶是白色的，带着斑驳的红色，像鞭刑时流出的血渗透了衬衫。不过，这里的声响让她心情振奋。起到同样作用的还有丰富的饮用水和火把，以及她一路远离猎奴者的距离，北卡罗来纳的情况是个改善，至少在地表之下。（怀特黑德 168）

地下铁道就像一座坟墓，主人公必须经历死去才能再生为一个新的、更好的、更具有独立意识的人。

醒来以后，她决定靠两只脚走完剩下的路程——她的双臂已经失去知觉。一瘸一拐，在枕木上磕磕绊绊。科拉一路上用手扶着隧道的岩壁，一条条凸起，一道道凹陷。她的手指在谷地、河流和山峰上舞蹈，仿佛那是一个新国家的轮廓，孕育在旧国家的体内。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她看不到，但是感觉到了，她在穿越美国的心脏。她害怕自己在睡梦中调转了方向。她这是在一路向前，还是在往回走，回到她来的地方？她相信奴隶本能的选择引导着她——任何地方，任何地方，但绝不是你逃出的地方。她已经凭着这种本能走了这么远。她要么抵达终点，要么在铁轨上长眠。（341）

地下铁道带给备受苦难的奴隶科拉以新的希望、新的期待和生活。小说以此结尾，作家也是在暗示读者，地下铁道绵延不断，一个曾经的奴隶制国家经过逃离、自我更新，也许会带来新生，或许会重新拥有希望。

《地下铁道》作为美国新世纪小说的力作，在创作形式上有所革新与转型，一方面秉承了

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沿用杂糅、戏仿和历史拟写等手段；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拓展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从创作形式、叙事格调等方面审慎地表达新一代美国作家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情趣（杨金才 164）。本篇论文把小说中所体现的美国黑人历史社会地位的主题研究和小说的隐喻等审美追踪结合起来，试图更加深刻地挖掘隐藏在小说内容深处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小说无所不在的文学符号处处暗示着美国历史和现实中黑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作家对科拉备受磨难的逃亡之旅及地下铁道的表述，实际上是在拷问美国民主的核心部分，衡量美国人人平等的理想和赤裸的史实、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khtin, M. M. *Bakhtin Anthology*. Vol.6. Translated by Zhaolin Li, et al. Hebei Education, 2009.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4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Beicheng Liu and Yuaning Yang. Shanghai SDX Joint, 2007.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4版），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 Maus, Derek C. *Understanding Colson Whitehead*.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14.
- Modell, Arnold H. "Metaphor: The Bridge between Feelings and Knowledge." *Psychoanalytic Inquiry*, no.1, 2009, pp. 6-11.
- Shi, Yeli. "On the Root of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ry Metaphors." *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Human Science)*, no. 3, 2016, pp. 58-61. [施叶丽：《论文学隐喻产生的根源》，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58-61页。]
- Whitehead, Colson.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Translated by Kai Kang. Shanghai Renmin, 2017. [怀特黑德：《地下铁道》，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Yang, Jincai. "Some Percep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13, pp. 154-62. [杨金才：《关于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载《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第154-62页。]

◇责任编辑：戴连焜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物之“踪迹”与主体性之解构研究

◎ 兰秀娟

内容提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同名主人公将物（特别是房子）看作建构印度移民主体身份的精神寄托和物质载体，但他追寻和拥有过的物只是散落的“踪迹”。“踪迹”的本质动态性造成其意义的不确定性，它不断出现又不断抹除自身，故他追寻的主体身份在“踪迹”的抹除中遭到解构。而作为替补物的“踪迹”又导致意义处于无尽的“延异”中，故他寻求由物质所赋予的固定意义秩序并不存在，追寻过程也证实了其主体身份只是在意指链上滑动。这些“踪迹”是一条线上无穷的点，虽无限接近终极意义却始终无法到达，且起源和终点皆不可寻，这使小说展现出虚无主义色彩。

关键词:《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物 “踪迹” 主体性 解构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59-10

基金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19YCX066）

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Title: A Study of the “Trace” of Things and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A House for Mr. Biswas*

Abstract: In *A House for Mr. Biswas*, Mr. Biswas, the protagonis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he deems things (especially houses) as spiritual sustenance and material carrier to construct the identity of Indian immigrants. For him, subjectivity is the origin that he has been pursuing for during his entire life, and things are considered as tools to reach that origin. However, the things Mr. Biswas has spent all his life searching for and has momentarily owned are merely scattering “traces”. The dynamic of the “trace” of a thing causes the uncertainty of its own meaning, and the “trace” constantly appears and effaces itself, so the eternal and stable subjectivity pursued by Mr. Biswas is deconstructed by the effacement of the “trace”. In addition, the “trace” as a substitute has led to endless “différance” of meaning, so the firm system led by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that Mr. Biswas kept seeking for does not exist. In fact, his pursuit of the “trace” only confirms that his subjectivity is slipping on the chain of significations. The “traces” pursued by Mr. Biswas are infinite points that constitute a line, which is infinitely close to but can never reach the center of the ultimate meaning, and neither can the origin nor the end of the “trace” be located, directing this novel to nihilism eventually.

Keywords: *A House for Mr. Biswas*, things, “trace”, subjectivity, deconstruction

Author: Xiujuan Lan,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于1932年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十八岁时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并定居英国,随后又周游列国,这些独特的经历为他的三十多部著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奈保尔在作品中以敏锐的眼光对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印度、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书写。以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背景,奈保尔于1961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不仅为读者展示了西印度殖民地的印度人民在贫穷中的挣扎和殖民者带来的宗教冲突等问题,也在字里行间展现了自己对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难以割舍的情怀。由于故事背景的复杂性与奈保尔独特的叙事技巧,小说自出版后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品中的叙事艺术、殖民话语、流散身份、空间书写等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

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是奈保尔以自己的父亲为故事原型塑造出来的^[2]。毕司沃斯先生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贫困家庭,但他却拥有印度的婆罗门高级种姓,在颠沛流离中,他一生都在追求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为此搬过八次家,见过、住过形形色色的房子,可以说房子见证着他的出生、成长与死亡。房子不仅是贯穿他一生的重要物品,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意象。同时,奈保尔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各式各样的房子和家具,使得物成为整部小说的聚焦对象。以往的批评家往往将这部小说中的物与阶级地位、身份、种族等重要问题进行关联,比如将毕司沃斯先生对房子的追求看作“作家本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张德明 84)。在《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系谱》(“The Genealogy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一文中,赫迪斯(Sean Hides)指出,“考古学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将手工制品和身份之间的联系,看成是社会存在的内在属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普遍理论的抽象性”(218),“一些手工制品不仅仅被当作工具、财产、等级或从属标记来使用,而且也被广泛适用于建立在年龄、性别和种族之上的身份流通中”(219)。由此可见,人们对物质与文化身份之间确定关系的认识扎根于结构主义传统,即设定一个主体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关系,且将人置于中心位置,而将物看作指涉人的主体性的“他者”。

在后现代语境下,统一的、确定的意义遭到了冲击,这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与多维的视角考察物质与身份的关系。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看来,传统哲学/文学的二元对立结构是没有根据的,而他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物质与身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在小说中,主人公将房子这一物看作“以‘正常人’身份在社会文化秩序中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凭证”,但是这种“凭证”却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是他内心“欲望的换喻表达”(王玉芒 48),因此物的具体存在只是一种表象,它的实质是缺席的,毕司沃斯先生所追求的也并不是物本身,而是缺席的“踪迹”(trace)。海德格尔最早用“踪迹”这一术语来表示隐而不显的不在场的本体,德里达则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 1976)中将“踪迹”等同於“延异”(différance,德里达创造了这个词,它“既指作为指意条件的某种先已存在的‘被动’差异,又指某种产生各种差异的散播行为”[卡勒 57])(92),因此“踪迹”的功能并不是指示本体或根源,而是构成了使在场之物的意义延宕和流动的网络,从而使意义无法确定。

从“踪迹”这一哲学概念出发，本文将探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物的“踪迹”的特点及其造成的主体性消解的结果，这将为我们重新审视物质与身份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踪迹”的动态性与主体身份的滑动

毕司沃斯先生是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底层人，贯穿他一生的关键词是“漂泊”，因此他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由中心的确定存在所带来的稳固关系。正如奈保尔在另一本小说《中央航道》（*The Middle Passage*, 1962）中所说，“生活在一种借来的文化中，西印度人比其他民族更需要作家们告诉他自己是誰，以及他的立足点在哪里”（68）。毕司沃斯先生偏执地认为，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立足点”，能够帮助他建立完整和确定的主体性。然而，他所追寻的那些房子不过是不在场的“踪迹”，而由于“踪迹”的绝对运动性特征，他的主体身份也只是在无限开放的意指链上滑动而已。

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物”在时间的流逝中展现出来的“耐用性”（durability）即为其物性特征之一，这使得“物”能够成为人的身份（identity）的稳定见证，只要人能够“与同一把椅子、同一张桌子建立联系”（137）。出于这种考量，毕司沃斯先生会集中精神审视身边的物品，他发现“每一样物品都因此获得一种稳固，一种恒定。在大理石桌面上的瓷茶杯、茶碟和小勺子：这是这类物品唯一可能的组合”（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296），这使他更加坚定了从物中获取稳定的意义关系的决心。可以说，毕司沃斯先生将人的主体身份与物质看作稳固且确定的互相指涉关系，因而他认为作为主体的身份可以在与作为客体的物的固定秩序中获得一种恒久的确认，这也导致了他几十年间不断地造房与买家具的行为。

不可否认，身份与物质之间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相同的物在不同的语境下会产生新的意义，因此物的意义是建立在差异与动态上的。这好比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 of Elea）的“飞矢不动”悖论，箭在飞行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因此当我们任意选取一个瞬间的时候，箭是暂时静止的，并且占据着一定的空间。然而，时间一直在向前流动，因此作为整体的箭在本质上是动态的，且它的运动轨迹即由那些在瞬间静止的无穷的点组成。在描写毕司沃斯先生在捕猎村的房子中的生活时，奈保尔所呈现的时间逻辑并不清晰，令读者无法考证时间的“踪迹”，但他却强化了物体在物理空间中的各种“踪迹”：

椽子上吊床的绳子已经磨出锯齿一样的凹痕。绳子本身的颜色也已经变得暗淡，绳子上他和莎玛手握的地方和泥墙下半部分的隆起一样闪闪发光。茅草屋顶更加乌黑，芒刺丛生，后屋里弥漫着他的香烟和颜料的味，窗台和走廊上的柱子由于经常被倚靠而蹭得十分干净。铺子更加阴暗，更加肮脏，也更加难闻。（185）

不管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暗淡”的绳子，还是久而久之变得更加“干净”的柱子，它们

构成了叙事中的时间线索，暗示了毕司沃斯先生在捕猎村这黑暗肮脏的房子中居住的时间之久。毕司沃斯先生在这座房子中居住的每一个瞬间，包括房子在内的物都是静止的，这也使得他的身份获得了一种暂时和相对的稳定性，然而房子和家具上的种种“踪迹”却暴露了时间的印记和人物生命的跨度。“踪迹”是运动的，因而作为整体的物在本质上也呈现出一种动态效果。

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漂泊生涯中，他总是带着这些家具和物品，将它们从一个空间带向另一个空间，因此作为整体的物在地理空间上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彰显着不同的意义。当毕司沃斯先生最后一次搬家时，他将以往所有的家具和物品都从西班牙港的出租房里搬到了锡金街的二手房：

[……] 四柱大床（床被拆掉了，一点也不起眼），莎玛的梳妆台（靠着驾驶室，镜子被拆掉，抽屉也被抽出来，露出里面没有上漆和上光的木头，虽然经过数年，木头看起来仍然是簇新的），[……] 玻璃橱柜（从图尔斯太太的客厅里搬出来的），穷木匠打造的餐桌（面朝下躺着，桌子腿上缠着绳子，上面放着抽屉和箱子），打字机（仍然是鲜艳的黄色，毕司沃斯先生曾经打算用打字机为英美的报纸撰写文章，曾经用这台打字机给理想学校写文章，给医生写信）。（571）

这是毕司沃斯先生积聚了一生的家什，奈保尔用括号给每一样物品添加了注释，勾勒出物变化的“踪迹”。比如玻璃橱柜，它最初是被毕司沃斯先生的妻子莎玛买下来的。莎玛有一套日本咖啡套具，这为她清贫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体面和欣慰。她买的玻璃橱柜不仅能够摆放这个套具，而且能够起到调和她们姐妹间矛盾的作用（因为琴塔认为她们姐妹间的调和有一种定式，即塔特尔一家购买新家具和新衣服之后矛盾即被化解），为此，莎玛不惜借了几个月的债来购买。随后，它又经历了几次搬移，最终到了锡金街的二手房里。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文本疆界内，玻璃橱柜的结局是抵达锡金街的二手房，显然，从莎玛引以为傲的财产到毕司沃斯先生积聚一生的家什，玻璃橱柜的意义不再是稳定和恒久的，而成了在不同的语境中滑动的“踪迹”。从米勒（J. Hillis Miller）所定义的解构主义宏观视角（超出文本疆界）来看，看似终结的故事“又总能被叙述者或后续事件重新解开，被重新解释”（51），这意味着在文本疆界外未被书写成文字的故事中，玻璃橱柜会面临新的变动，因此它成了一种悬而未决且处于无穷变化中的“踪迹”。其他诸如梳妆台、斯林百金床、打字机等物件是与之相似的例证，它们既承载着过去的印记，又总是指向未来，一直处于运动之中。

可以说，毕司沃斯先生所信赖的“稳固”只是物的相对稳定性带给他的错觉，同时，这种“稳固”所带给他的身份的确定性也只是基于在一个瞬间静止的“踪迹”。“踪迹”的绝对运动性的本质使得物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因而阿伦特所指出的物与身份之间的稳定秩序遭到了解构，而毕司沃斯先生所追寻的稳定身份也成了意指链上滑动的无穷点。因此，毕司沃斯先生

心中的那种“稳固”感瞬息即逝，在继续感受物的存在与他的关系时，他马上又反应到：“他知道这种秩序并不稳定；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期待和不安。”（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296）这正是物的动态性所带给他的不确定的（或模糊的）身份认知。

二、“踪迹”的抹除与主体性的消解

尽管毕司沃斯先生能意识到物的不确定性，但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追求房子来获得一种身份认同，并由此在几十年的生命中对房子形成一种偏执的“恋物情结”，然而他所追寻的每一座房子都只是存在于特定时间段内的物，它们就像构成“飞矢”运动轨迹中的无数的点。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个点的出现总是指示着前一个点的消失或抹除（effacement），正如德里达在《哲学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 1982）中所说，“踪迹不是一个在场，而是一个自身失位、自身移位、回诸自身的在场的幻影 [simulacrum]”（24），因此，“踪迹”必须通过不断抹除自身才能实现这种不断的“失位”。可以说，物不仅是运动着的“踪迹”，而且是不断抹除自身的“踪迹”。

根据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提出的“蜡板假说”（the hypothesis of wax tablet），蜡板是“缪斯女神之母记忆女神的馈赠”，而人们通过在蜡板上留下印记来获得对某物的印象，“如果印记被抹去，或者没能成功地留下印记，我们会忘记，就不知道它”（722）。在德里达看来，意义的“撒播”（sowing）就像蜡板上的印记，是意义“踪迹”的嬉戏。“踪迹”不断地出现又消失，就像毕司沃斯先生所追寻的那些房子一样。比如他父亲那座破旧的茅草屋，它是毕司沃斯先生出生的印记，象征着他本人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印度人的根。在他的记忆中，茅草屋只存在于从他出生到父亲意外离世这一个时间段内：“毕司沃斯先生离开以后就再也找不到父亲的房子了，连他被埋掉的第六根手指‘都已经化作尘土’。”（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37）因为他们从前居住过的房子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花园城市，有“白色的木头平房，红色的屋顶”（38）。当茅草屋这一“踪迹”遭到了抹除之后，奈保尔评价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毕司沃斯先生出生和早年成长的痕迹。”（38）因此毕司沃斯先生失去了在他看来最为“稳固”的身份凭证，预示了像他一样的被殖民者们漂泊与无根的凄凉。

奈保尔在小说中挥洒笔墨最多的是图尔斯家族的哈奴曼大宅，入赘到图尔斯家族的毕司沃斯先生也得以入住其中。“哈奴曼”（Hanuman）这个名字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的神猴，图尔斯家族也在哈奴曼大宅雕刻了一个“慈眉善目的猴神哈奴曼的水泥雕像”（77），因此西印度被殖民者眼中，哈奴曼大宅是印度传统文化的稳固象征。英国殖民者入侵之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作为印度社区典型代表的图尔斯家族内部同样发生着剧变。比如神猴雕像“被洗刷得发白的相貌几乎难以分辨”，而且“雕像凸出的部分已经落满灰尘”（77），暗示着印度传统文化的“踪迹”在殖民文化的长期侵略中被逐渐覆盖，直至被彻底抹除。受战争和殖民的影响，有近两百人口的图尔斯家族被迫向西班牙港北部矮

山迁徙,于是“哈奴曼大宅后面的房子已经空了一段时日了,除了一个寡妇没有人住在那里”(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524),随之而来的是图尔斯太太将奥华德送往英国学习,家族成员们也逐渐离散了。在漂泊与不安中,他们期盼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奈保尔巧妙地将这种盼望映射于哈奴曼大宅上:“有时候哈奴曼大宅似乎在等待生机勃勃[……]傍晚点亮油灯时,可以听见人们的交谈声、欢笑声、呼唤狗的声音、孩子被鞭打的声音。但是哈奴曼大宅始终寂静无声。商店关门之后没有人待在那里。”(524-25)暗示着传统文化的“踪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就像“图尔斯商店的名字被一家西班牙港公司的苏格兰名字替代”(524)一样,哈奴曼大宅的“踪迹”随着印度文化被英国文化的替代而逐渐衰落,直至遭到彻底抹除。尽管毕司沃斯先生与之有很多恩怨纠葛,但在他心中,“哈奴曼大宅是一个拥有生命、力量和权力去提供安慰的有机体”(302),它那“两英寸半厚的北美脂松做成的屋顶”和“厚厚的斜面墙”都能够给他温暖和安全感(296)。不同于标志着他出生印记的茅草屋,哈奴曼大宅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是印度传统文化曾带给这个民族的一种稳固的归属感和庇护,随着这一“踪迹”的抹除,毕司沃斯先生的民族身份也遭到了消解。

离开哈奴曼大宅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曾住过图尔斯商铺的房子,但由于经营不善,图尔斯家族的人最终通过将它烧毁来获取保险金。毕司沃斯先生也曾尝试在绿谷建造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但由于经济拮据,购买的材料都十分廉价,导致未完工的房子在暴雨中摇摇欲坠,最终又被绿谷的工人放火烧毁。当毕司沃斯先生辗转至矮山时,他再一次开始购买材料建房,但建好的房子最终又毁于大火。显然,从茅草屋到矮山的房子,尽管短暂存在,它们却成了一个永久消失的“踪迹”,指示着过去的流逝。除此之外,奈保尔也巧妙地用毕司沃斯先生购买玩具房子的故事来隐喻“踪迹”的抹除。毕司沃斯先生奢侈地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他的女儿赛薇买一个玩具房子,最让他满意的地方就是它让赛薇在哈奴曼大宅获得了额外的关注,这正是毫无存在感的毕司沃斯先生渴望通过房子获取的东西——“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214),从而使自己和其他人能够感知到他的主体性。然而,因为这个玩具房子在大宅中引发了一些骚动,所以它仅存在了一天就被莎玛砸烂了。

毕司沃斯先生那些看似“拥有”过的房子最终的结局都是被摧毁和抹除,可以说,它们是蜡板上短暂存在过但又被擦除的印记,无法成为毕司沃斯先生构建自己身份的凭证。同时,这些房子也是意指链上不断出现又消失的“踪迹”,而“踪迹”的抹除也证实了德里达“踪迹本身并不存在”(Of Grammatology 167)的观点。因此,实际上,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处于一种无法真正拥有房子的状态,而他的主体性也在房子“踪迹”的抹除中遭到了消解。

三、作为替补物的“踪迹”与主体身份的悬置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追寻其主体身份的过程,但这部作品只是对这一过程的再现,而不是对追寻结果和中心意义的揭示。在这个过程中,

一座接一座出现的房子显示的就是毕司沃斯先生的追寻轨迹，当我们从共时的角度将这些房子看作意义散落的“踪迹”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踪迹”既是运动的，又是不断被抹除的，而且实际上它们就是差异和延迟的重复和替补。作为失去家园的被殖民者，毕司沃斯先生的主体性是缺失的，房子就成了他内心关于家、民族归属和主体身份的替补物，这正如德里达所说，“由中心或源头缺失或不在场构成的游戏运动就是那种替补性 [supplémentarité] 运动”，而取代中心、替补中心的、在中心缺席时占据其位的便是作为“一种替补物出现的符号”（《书写与差异》519）。毕司沃斯先生所追寻的那些不同的房子就是源于其主体性缺失的替补物，它们构成了差异的“踪迹”。

茅草屋是毕司沃斯先生出生的地方，尽管他在这里的生活十分艰难，他的身体也因为营养不良而“感染湿疹和脓疮”（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8），但他仍然将其称为唯一的家。随着其父亲的离世，一家人搬出茅草屋，随后茅草屋又被拆除，并被改建成了花园城市，标志着毕司沃斯先生漂泊与孤独的开始——“在以后的三十五年里，他像一个流浪者一样，辗转在没有一处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36）。在此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又换了很多房子，在他的人生轨迹中画下了很多个点，可以说每一座房子都是他内心对主体身份的渴望的替补物，而且这种替补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这使得意义的在场无限地延异，即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 2017）中所定义的：“替补性就是延异，就是同时使在场分裂、延迟又同时使之分裂和原初期限下的移异过程。”（98）这些替补物构成了一条德里达所谓的“替补之链”（“the chain of supplements”, *Of Grammatology* 156），而毕司沃斯先生的主体身份也由于一直在“替补之链”上滑动而遭到了悬置。

比如说，当**茅草屋**被拆除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搬进了后巷的**小泥屋**，在**小泥屋**生活的六年使得他通过自学掌握了画广告牌的本领，这又为他入赘图尔斯家族并住进**哈奴曼大宅**提供了契机。由于在大宅中备受歧视与冷落，毕司沃斯先生坚定了搬出大宅的决心，并开始做他的“造房梦”，这同时也成为他入住捕猎村的开始。当图尔斯家族由于商铺经营不善而通过烧掉**捕猎村商店**来获得保险赔偿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又不得不搬进**绿谷的营房**，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在绿谷中，毕司沃斯先生尝试着建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座房子，然而，房子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这迫使他进入西班牙港寻找机会。随后，他住进了图尔斯太太在**西班牙港的出租房**，接着又在矮山建造了一座**自己的房子**，却又惨遭纵火，而这也为他生前的最后一所房子——**锡金街的二手房**——做了铺垫。笔者将这些作为替补物的房子的文字符号设置了粗体，使得它们能够在文字中凸显出来，当我们将这些粗体词抽象为一个个共时存在的符号时，就能够捕捉到“踪迹”所形成的“延异”的网络。同时，在这一网络中，每个符号之间都有明显的“间隔”（spacing），根据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为《论文字学》所作的译者序言中的解释，这种“间隔”是“指示着无法消解的他异性 [alterity] 的一种运动，一种位移”（lxxi），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符号看作差异的重复和替补。“踪迹”的替补和间隔使得毕司沃斯先生所追寻的主体性一直处于一种绝对的延搁中，而这种延搁凸显的正是以他为代表的殖民地人民

无法避免的漂泊。正如奈保尔在另一部作品《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1987)中说的：“我们住着半损毁或衰败的房子，频繁地搬家，总之生活在不确定中。”(47)因而他在多部作品中都自称“异乡人”，且通过房子的“踪迹”将这种漂泊与“不确定”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尽管**锡金街的二手房**是文本疆界内出现的最后一个意指符号，但奈保尔的开放式结尾恰好显示意义的本质是无穷的和不确定的。在故事的结尾，毕司沃斯先生借了一大笔钱买下了锡金街的一座“豪宅”(也是一个二手房)，看似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身份凭证，但奈保尔用“雨”的隐喻暗示这仅仅是假象。他在最初看房的时候，“装着隔音板的天花板”“崭新的有磨砂玻璃的门窗”“打磨上光的地板”“精巧的莫里斯家具”，以及豪华的“带着抽水马桶的浴室”这些物品使得这套房在他眼里是完美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558)，但这种完美却是由于那天的“雨”造成了他视线的模糊。他后来后悔道：

如果不是下雨，他可能会绕着小院子查看一圈，因而发现它愚蠢可笑的形状。他会看见屋檐上的隔音镶嵌板已经松脱了，附近的蝙蝠很容易就钻进去。他会看见房子后部露天的楼梯只有一个扶栏，仅仅被没有油漆的瓦楞铁皮覆盖着。他也不会被一楼后门厅悬垂的厚重窗帘营造的温馨所蒙骗。他会发现房子根本没有后门。(560)

毕司沃斯先生将一切归咎于“下雨”，而“雨”在这里象征着遮住实质的面纱，使人们只能看见“统一”“确定”的表象。实际上，毕司沃斯先生不可能真正地“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也不可能找到自己真实的主体性。即使他暂时地“拥有”了**锡金街的二手房**，他也无法在有限的生命中还完他为买房所借的债，所以在还完债之前他并不是这个房子的所有者。就像毕司沃斯先生在绿谷的那个未完工的房子一样，**锡金街的二手房**也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而且这个房子处处都是缺陷，摇摇欲坠，预示着这一“踪迹”也终将像其他房子一样被抹除和替代。尽管封闭的文本已经结束，故事依然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这也意味着**锡金街的二手房**并不会是“替补之链”的终点。同样地，**茅草屋**看似文本疆界内出现的第一个意指符号，但它在故事层面却并不是起源，比如在奈保尔更早一部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背景的小说《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 1959)中，他刻画了诸如“墙面刷成亮绿色”和“屋顶刷成大红色”的波普的工棚(15)、乔治那“涂成粉红色”的“破旧的木房子”(18)等房子，使得读者可以不断追溯这一无法追寻到的起源，因此**茅草屋**并不会是“替补之链”的起点。

正如毕司沃斯先生的英文名字Mr. Biswas所暗示的那样，“bis”表示“重复”，“was”指示着“过去”，因此奈保尔对主人公的命名暗含着“重复过去的存在”(周敏 115)的意味。实际上，这种重复是“踪迹”的替补物，不仅有差异性，而且不断被延迟。如果将这些替补物抽象为点并画成图形，那它们就构成了不经过原点的抛物线上的点，且抛物线上的起点和终点也可以无限往外延伸。毕司沃斯先生毕生所追寻的就是向那个原点靠近，即找到自己确定的主体(或本源，或立足点)，但就像这条抛物线所指示的，每一个点(“踪迹”)只能让它无

限接近中心，他始终无法抵达。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这部小说的英文名是 *A House for Mr. Biswas*，奈保尔巧妙地选择了介词 *for*，而不是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 *of*，斩断了“物”与人的从属关系，因而也彰显了奈保尔的立场，即毕司沃斯先生不可能拥有那座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奈保尔呈现的只是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追寻物的“踪迹”的过程，而不是中心意义的获取。当读者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开那一个个“踪迹”的面纱时才发现意义是无迹可寻的，彰显了文本的虚无主义色彩。意义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重复性是解构主义的重要观点，这不仅为我们解读文本提供了更加开放和多维的视角，也为我们重新解读物质与文化身份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当主体性的中心意义被解构之后，物质得以从二元对立的边缘位置被解放出来，这将为我们重新思考物的本体实在性提供思路。

注释 [Notes]

- [1]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全称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以 20 世纪初至中叶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背景。根据史料记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于 1802 年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军队后被英国占领，正式成为英国“西印度联邦”中的一员。《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于 1961 年出版，仅一年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正式宣布独立，脱离了与英国的殖民关系，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概况的介绍，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826/1206x0_680828/。
- [2] 根据中国学者周敏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考察并收集的资料，奈保尔的父亲西帕萨德（Seepersad Naipaul）于 1938 年在《特立尼达卫报》得到了一份工作，并搬进了西班牙港路易街房子里。在 1946 年，奈保尔的父亲花了五千三百多特多元在“圣詹姆斯区尼保尔街二十六号”（26 Nepaul Street）买下了一栋房子。显然，小说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的故事均来源于奈保尔父亲的亲身经历，因而奈保尔将小说主人公命名为“先生”也是其向父亲致敬的一种方式。详见周敏：《奈保尔在特立尼达的房子》，载《读书》2018 年第 11 期，第 85-90 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U of Chicago P, 1958.
-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Translated by Yang Lu.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98. [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Johns Hopkins UP, 1976.
- .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U of Chicago P, 1982.
- .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Ning Zhang. SDX Joint Publishing, 2001.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 . *Speech and Phenomena*. Translated by Xiaozhen Du.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Hides, Sean. “The Genealogy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A Reader*, edited by Yue Meng and Gang Luo, Peking UP, 2008, pp. 219-37. [赫迪斯：《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系谱》，载孟悦、罗钢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 219-37 页。]
- Miller, J. Hillis. *Reading Narrative*. Translated by Dan Shen. Peking UP, 2002. [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北京

- 大学出版社, 2002。]
- Naipaul, V. S. *The Middle Passage*. Andre Deutsch, 1962.
- . *Miguel Street*. Translated by Zhiyong Wang.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2009. [奈保尔:《米格尔街》,王志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 . *A House for Mr. Biswas*. Translated by Junmin Yu. Nan Hai, 2015. [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余珺珺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5。]
- . *The Enigma of Arrival*. Translated by Anjie Cai. Nan Hai, 2016. [奈保尔:《抵达之谜》,蔡安洁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6。]
- Plato. "Theaetetus." *The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translated by Xiaochao Wang, People's Publishing, 2018, pp. 651-753.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载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第651-753页。]
- Wang, Yumang. "An Illusory Pursuit: An Interpretation of *A House for Mr. Bisw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an'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College*, no. 7, 2009, pp. 47-50. [王玉芒:《虚幻的追求——从拉克的精神分析学解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第47-50页。]
- Zhang, Deming. "A Ghost Suspended on Limbo: An Interpretation of *A House for Mr. Biswa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1, 2003, pp. 81-86, 174-75. [张德明:《悬置于“林勃”中的幽灵——解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81-86, 174-75页。]
- Zhou, Min. "A House and One's Life: An Interpretation of *A House for Mr. Biswas*." *Jiangnan Tribune*, no. 2, 2007, pp. 115-17. [周敏:《一座房子和一个人的一生——〈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文本阐释》,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第115-17页。]

◇责任编辑:戴连焜

困境与超越

——跨国民族主义视域下《穷乡僻壤》之种族政治探析

◎ 陈天然

内容提要: 种族政治是美国波多黎各裔作家托马斯在自传体小说《穷乡僻壤》中阐述的关于国家-民族认同的核心问题。作为第二代波多黎各移民,主人公皮瑞试图将自己融入美国社会而不失族裔性,但他与非裔美国人共有的体表特征使他陷入了种族认同的困境。在美国-波多黎各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位种族身份的过程中,作家描绘了一种跨国民族身份,体现了国家-民族归属感的另类视野,它能够超越单一民族结构之僵化和种族/族裔特殊性之限制,为新型联盟和新型抵抗策略开辟道路,从而拓展了国家-民族认同话语的含义。

关键词: 种族政治 困境 超越 跨国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69-10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美国加勒比裔小说中的跨国叙事研究”(FJ2019B061)阶段性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与国家认同研究”(16BWW076)阶段性成果; 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跨国视域下当代美国加勒比裔小说中的家园书写研究”(18SKBS2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Title: Dilemma and Transcendence: An Analysis of the Racial Politics in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ism

Abstract: Race is the core issue of nation-state identification that Piri Thomas elaborates in his memoir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As a second-generation Puerto Rican immigrant, Piri tries to integrate himself into American society without losing his ethnicity, but his physical features shared with African Americans make him into a predicament of racial identification. While in repositioning Piri's racial identity in a U.S.-Puerto Rican discourse, the writer depicts a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fication, which is capable of transcending both the rigid structures of nationalism and the constraints of racial particularity. It opens the way for new alliances and new resistant strategies, thus expanding the meaning of national-state identification discourse.

Keywords: Racial Politics, predicament, transcendence, transnationalism

Author: Tianran Chen, Lecture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美国文学中的种族问题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尤其是非裔作家和评论家的作品中很普遍，西语裔文学及相关评论中也有大量关于黑人、奴隶制和种族问题的叙述和讨论。然而，评论界对介于美国西语裔和非裔两个社区之间的黑皮肤波多黎各裔的了解甚少，尤其是对该文学领域的种族政治的挖掘不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波多黎各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波多黎各裔作家。其中，皮瑞·托马斯(Piri Thomas)以其自传体小说《穷乡僻壤》(*Down These Mean Streets*, 1967)一举成名，成为波多黎各裔作家群中最重要、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小说意蕴深邃，布局独特，文笔犀利，语言诙谐，位居美国族裔文学经典之列。该书基于作者的成长经历，真实刻画了20世纪30到50年代西语区哈莱姆的历史变迁，市井生活之贫困、喧嚣、骚动，以及犯罪和种族仇视等。这段时间也见证了包括皮瑞的父母在内的波多黎各人大规模的移民美国浪潮，因而成为研究西语区哈莱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文献。国内学界尚无针对该书的专门性研究；国外学界对小说种族主题的探讨主要基于美国文化语境，较有代表性的有：堕落、犯罪、自我救赎与种族歧视，性别和种族的交叉研究，种族话语的社会建构性，“僭越”与种族问题。尽管小说的叙事主要发生在美国，然而，对种族问题的探析不应局限在美国语境，应放在波多黎各和拉丁美洲种族关系及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鉴于此，本文拟在跨国民族主义框架下，结合人种学和民族主义理论，分析文本中反映的种族政治主题。本文认为，作家在刻画主人公皮瑞的种族困境及对其身份重新定位的过程中，跨越了二元对立的认知范畴，描绘了一种跨国民族认同，体现了国家归属感的另类视野，从而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僵化结构和种族/族裔特殊性之限制，将矛头直指霸权性质的国家认同话语。

一、迥异认知：波多黎各与美国的种族概念

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对于理解种族和国家认同问题至关重要。萨义德认为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把自己定义为本质化的东方他者的对立面。西方代表着文明、理性、人道、自由与和平，而东方意味着野蛮、狂热、残酷、压迫和暴力。萨义德的分析强调，国家认同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他者的建构。东方主义也适用于国家内部殖民的情况，被边缘化的群体在国家认同话语建构中被表述成意义不同的形式，通常比统治集团低劣，这样通过公开的种族主义的话语和实践，内部他者的边缘化得以完成。然而，霍根(Jackie Hogan)认识到，“内部的他者并不是无助地接受自己的边缘化。由于国家认同话语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从属群体可以潜在地通过构建反‘国家’叙事来书写他们的国家想象”(9)。在《穷乡僻壤》中，这种反国家叙事是通过跨国主义视角来实现的。正如别恩肯(Brian D. Behnken)所说，“尽管对民族主义的讨论离不开对族裔性的讨论，但跨国文化交流——跨越边界的文化的物质交流——对民族主义有强烈的影响，在时间上调整了国家对自己意识的认知”(65)。在跨国文化环境下，民族主义情绪中的族裔认同已然发生了变化，跨国维度改

变了我们对种族认同的固定认知。在小说中，通过揭示跨国语境下波多黎各和美国迥异的种族概念，作家揭示了美国主流社会所持的本质化的种族想象。

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相似的种族特点和社会及经济指标，美国白人眼中的黑肤色波多黎各移民相当于非裔黑人。理查森（Jill Toliver Richardson）指出，在美利坚民族的想象中，在纽约定居的波多黎各人迁移到更大的拉丁裔社区之前，他们在历史上与非裔美国人具有最密切的认同关系（142）。弗洛雷斯（Juan Flores）也注意到两个族群的近缘关系：“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 [……] 除了史无前例的文化融合之外，大多数社会指标一致地指出波多黎各人与黑人的相似程度高于其他拉丁裔群体和拉美裔总族群。”（163）小说中，纽约市的波多黎各人口相对较小，波多黎各青年没有可供选择的拉丁裔社区，他们生活在一个民族混杂，尤以黑人为主的哈莱姆社区。在这里，不同种族的人形成了“国际联盟”（Thomas 229），皮瑞常和黑人朋友来往。此外，他们在社会经济和受到种族压迫方面也极为相似。大多数黑皮肤加勒比裔人在其民族聚居地遭遇了“类似非裔美国人停滞不前的社会经济前景和种族限制及对其所做的抗争”（Sepulveda 18）。基于两个族群高度的相似性，美国主流社会将来自加勒比的波多黎各人归于黑人社群，与白人社会相对。

然而，黑/白种族二分法不足以解释波多黎各裔美国人种族问题的复杂性。“黑皮肤”在美国大陆和波多黎各有不同的内涵，“波多黎各的种族差异在肤色方面更加灵活；有不同程度的白色和黑色”（Sanchez 19），这些在小说中用 *trigueno*、*moreno*、*negrito*、*clarito*、*mulato* 和 *blanc* 表示。此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波多黎各人习惯于通过西班牙白人传统的棱镜来看待自己，这一传统否定了该岛的非洲遗产”（13）。在波多黎各人的种族想象中，他们与非裔美国人是不同的。如小说中，皮瑞的兄弟何塞一再强调波多黎各人与非裔美国人不同（Thomas 144-45）。何塞将家人的黑皮肤追溯到“印第安人”血统，从而抵消了他们的黑皮肤。何塞的观点表明了一个更精细的波多黎各及拉美的种族分类系统。根据桑切斯（Marta E. Sanchez）的解释，在波多黎各岛，一个黑皮肤的“白人”意味着拥有印第安文化遗产，因此，“印第安”体现的不是种族差异，而指向的是肤色差异。因此，“印第安人”作为一个可行的类别范畴可以容纳像皮瑞和其父这样的黑皮肤“白人”（47）。不仅如此，对于多数波多黎各人来说，西班牙和非洲文化遗产的混合物“描绘的种族/族裔政治激励了在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在认同上和非裔美国人保持距离，在社会边缘化程度较高的阶层中为自己建立一种稍高的地位”（Caminero-Santangelo 209）。波多黎各裔美国人内化了一种观念：即使处于同样的社会边缘地位，他们享有比非裔美国人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在欧美的想象中，纽约西班牙裔社区的波多黎各人变成了一种种族标志，特指出生于别国或拥有非欧洲祖先或母语为非英语的黑人或混血儿（Grosfoguel and Georas 98）。尽管在加勒比的背景下，“波多黎各人”意味着白人，但在美国的情况下，却意指黑人。

鉴于跨国和跨文化动力业已影响到全球范围中的种族形式的身份认同，马丁内斯-桑（Yolanda Martínez-San Miguel）认为，“非洲裔的安第列斯种族想象已经且应该在一个更广阔

的加勒比、宗主国和民族身份话语的网络中构思出来”(359)。因此,托马斯对主人公皮瑞的种族身份的探索必须与波多黎各和美国大陆关于黑人属性的话语紧密相连。正是在这样的跨国文化中,皮瑞在作为黑皮肤的波多黎各人和被视为非裔黑人两种状态之间挣扎。

二、跨国惯习:皮瑞对波多黎各属性的固守

皮瑞在美国出生并长大,因此被视为第二代移民。由于第一代移民在他们的家乡出生和成长,他们很容易发展跨国身份并具有双重遗产。那么,皮瑞作为一个与祖国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二代移民,是否仍然与祖国保持着牢固的关系?

关于第二代及其之后的移民是否持有跨国主义的问题在评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跨国实践是第一代移民的典型特征,因此跨国主义在第二代移民中是个转瞬即逝的现象。根据索艾欧(Thomas Soehl)和瓦尔丁格(Roger Waldinger)同化主义者持有的文化一元论的说法,跨国纽带随着二代移民一起萎缩:“一般而言[……]从一代移民到二代移民的航程指向的是一种减弱的、甚至是消失中的故国纽带关系。”(779)相反,另一些人认为,跨国社会实践仍然由第二代移民维持并成为持久的结构性特征。如列维特(Peggy Levitt)和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认为,“显然,跨国活动不会成为大多数二代移民生活的核心,即使那些进行跨国实践的人也不会持有和父辈相同的频率和强度。但是,据此认为跨国实践是无关紧要的观点可能缺乏远见”(1020)。此外,一些学者将二代移民的跨国主义视为象征或情感跨国主义。基于社会实证研究,史密斯(Michael Peter Smith)和瓜尼佐(Luis Eduardo Guarnizo)在《草根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一书中指出,波兰人、犹太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所保留的祖籍国政治文化表明,跨国主义可以继续发展而与国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些移民的后裔诉诸想象的家园,构成了跨国主义的情感和象征形式(17)。同样地,对于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波多黎各裔移民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维持较强的跨国实践形式,但仍然保留着对加勒比地区的情感想象和象征性联系,这种跨国主义的痕迹体现的是“情感跨国主义”(Wolf 255-94)。与汇款或参与祖国政治等一代移民的跨国实践相比,象征或情感跨国主义对二代移民尤为重要,这种跨国主义更具文化上的特色。

文化主线把一代移民的流散景象与后代的民族姿态联系起来。维阿托维克(Steven Vertovec)认为,“跨国惯习”由第二代塑造并由其采取行动。这种惯习表明在跨国社会领域中父辈对第二代产生的强烈影响,因为它“强调了移民源出国的个人、资源和思想持续浮现在第二代移民的生活中并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选择性的,定期的跨国实践也可以累加起来”(76)。在跨国空间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移民熟悉父母的语言,也会来回在母国旅行并接受母国的价值观,因此他们与祖国的联系会持续下去。同时,他们的跨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第一代人对祖国态度的影响。此外,东道国对移民的态度也是影响移民跨国认同的因素

之一。《穷乡僻壤》揭示了二代波多黎各移民的跨国惯习及其情感跨国主义。主人公皮瑞与波多黎各的物理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与波多黎各属性的分离。一方面，他父母与家乡的多种关联加强了他与母国文化的联系，纽约的波多黎各街区是他可以保持文化遗产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出生在美国，但未被主流社会完全接受，在美国遭受的种族偏见反过来加强了他的族裔身份和与母国的联系。在一个有着强大的波多黎各文化价值观和实践的移民家庭中长大，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皮瑞通过他与母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和情感展示了他的跨国意识。虽然皮瑞坚持加勒比种族认同，主流社会却将他等同于非裔美国人，皮瑞的跨国文化背景使他处于选择黑人社区还是在黑白二分法之外寻找他途的境况中。当皮瑞的生活在三个方向（家庭，学校和社区）移动时，他的种族意识不断发生变化，但“跨国惯习”牢牢抓住他不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波多黎各生活和美国大陆生活的对照描述中，波多黎各岛是一个不断出现在波多黎各裔文学中的寓指，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空间想象，远远超出了一个个岛屿天堂的神话想象，如考菲儿（J. Cofer）的《太阳线》（*The Line of the Sun*）和维加（E. Vega）的短篇小说集《埃德·维加》（*Ed Vega*）等。而在《穷乡僻壤》中，这种对波多黎各岛的怀旧情愫达到了极致，它把波多黎各移民生活的困境、危机、梦想置于民族历史的大框架中，揭示移民记忆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家庭中，像其他在美国出生的波多黎各青年一样，皮瑞通过父母对波多黎各的回忆和故事讲述与家乡保持着跨国联系。皮瑞的母亲幻想有朝一日重返岛国，她故事中的波多黎各童年生活堆砌起皮瑞对原初家园形象的想象：一个浪漫和理想化的波多黎各，一个庇护地。年轻的皮瑞认同母亲的故国想象，母亲的怀旧强化了儿子与家乡的关系。虽然皮瑞一家担心永远无法返回岛国，但皮瑞的身份牢固地植根于波多黎各民族属性中，并抵制被标记为非裔美国人。他的父亲最初来自于一个加勒比黑白混血儿社会，在那里“尽管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种族基因身份，他其中的一个种族身份可以压倒另外一个”（Sanchez 49）。虽然父亲长着黑皮肤，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非裔美国人，父亲有意夸大他的西班牙口音，以此期望获得一种母国的文化价值身份。同时，像其他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一样，他告诉儿子，他的黑皮肤是来自“印第安”血统从而否认了他的非洲遗产。因此，小说人物的移民生活与波多黎各各种族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和父亲一样，皮瑞也采用相同的生存策略，强调他的波多黎各民族认同，以保护自己免受种族主义的伤害并能驶过种族二元对立的壁垒。一开始，受父亲种族观念的影响，皮瑞并不认为自己是黑人，并在许多情况下驳斥基于生物特征的种族本质主义的观点。例如，在意大利街区，当两名意大利男孩询问他的国籍时，皮瑞在两种选择之间挣扎：他是否应该表达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而不被视为外国人，还是声称自己是波多黎各人来抵制意大利人的种族自豪感？在做出选择之前，他已被白人孩子判断为一个潜在的黑人。在这种情况下，种族与寻找民族渊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卡米内罗-桑坦戈罗（Marta Caminero-Santangelo）所言：“这种交流隐含着种族与国籍的紧密联系。”（210）在辩护中，皮瑞抛出他所有可能用到的“民族主义”：“我是波多黎各人”，“我出生在这里”（Thomas 34）等。潜在的假设是，他

对自己双重国家身份的认同将使他摆脱被定义为黑人的尴尬。同样，在长岛的校园舞会上被白人女孩问及身份时，皮瑞强调他与非裔美国人的不同之处，“我是来自哈莱姆的波多黎各人”（Thomas 88）。当皮瑞申请推销员工作时，为了向雇主证明自己拥有波多黎各文化身份，他通过讲述 1897 年发生在波多黎各的美西战争来暗示自己的种族和族裔属性与“优越”的美帝国主义征服者相联。在叙述中，皮瑞强调其美国出生的母系祖父或波多黎各祖母的白人血脉从而抹去了他父亲一边的父系/母系中的黑人祖先。东道国的种族主义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刺激了移民寻求与本土国家的联系和帮助，这加强了移民的族裔认同。像许多黑皮肤的波多黎各人一样，他通过强调波多黎各文化遗产来证明自己与非裔黑人的社会差异，正如卡米内罗-桑坦戈罗总结的，“这种防御性的场景在文本的前半部分不断地重复着，从而累积起一定的重量，显示一种巨大的压力，促进建立皮瑞的种族/民族认同”（211）。然而，皮瑞逐渐意识到波多黎各人的标签无助于提升他在这个种族等级中的地位。在新学校，他意识到他是一个局外人、黑人。尽管他可以参加篮球比赛，但不能与舞会上的白人混在一起；在一列火车上，两名白人看到他带着白人女友便认为他是一名“入侵者”并以种族仇恨诅咒他；求职时，考官拒绝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黑人的申请。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于白人社会圈之外：“这个长岛是一个异国之所 [……] 你总觉得自己处于归属的边缘。”（Thomas 92）他开始理解他的局外人地位：国籍不能让他免受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

移民之后，波多黎各种族认同的内涵在其扩散到波多黎各的地理边界之外时已发生了变化。尽管皮瑞在美国都市长大，未曾去过母国，缺少实际接触，通过父辈的故国记忆，作为波多黎各裔二代移民的他仍然认同波多黎各民族属性，和母国家园保持着象征意义上的文化联系。他试图将自己融入美国社会，然而他的黑皮肤在白人眼中无亚于美国黑人，这使他无法被主流社会完全接受。不幸的是，他在文化、社会和心理层面并未认同非裔美国人，这使他陷入了如何界定自己种族身份的困境中。

三、困境：非裔美国人还是波多黎各美国人？

皮瑞身份的复杂性使他深受种族及族裔认同的困扰，不知归属的困境主导着主人公的生活，他决定南下寻求澄清种族身份。然而，自我发现之旅对皮瑞绝非易事。作为一个在哈莱姆长大的黑皮肤波多黎各人，他经历了波多黎各移民所遭受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上，波多黎各的边缘地位起源于美国对其殖民的悠久历史。1898 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失去了加勒比地区的最后一个包括波多黎各在内的殖民地。尽管波多黎各人被美国政府授予美国公民身份，但他们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此外，种族问题与他们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交织在一起。作家以工人阶级的语言和视角讲述了皮瑞家庭的生存挣扎：父亲透支性的体力劳动，缺乏救济金，和破旧的生活等。

皮瑞遭遇的种族歧视和边缘的社会地位逐渐塑造了他的新的种族认知，拒绝种族优越感是皮瑞转向更有生产力的种族意识的开始。他决意在不失去民族性的同时澄清他的种族身份，正如他对家人所说：“成为波多黎各人使我自豪，但是成为波多黎各人并不能改变肤色。”（Thomas 147）他被视作黑人，是种族主义词典中所称的“黑鬼”“黑色混蛋”和“猿”（96, 127, 92），这种经历使他更接近黑人朋友。他不再使用两极分化的词汇“波多黎各人和黑人”，而是将自己称为“波多黎各黑人”（171）和“美国黑人”（173）。

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他意识到自己家庭的“黑人血脉”时。不同于其他四位继亲母亲白皮肤的孩子，皮瑞是唯一继承父亲黑皮肤的孩子。在去南方之前，皮瑞告诉弟弟何塞：不仅自己是一个“黑人”，除母亲外，其他家庭成员都是黑人。这个发现开启了家庭成员之间激烈的争论。白皮肤的何塞坚持声称自己是白人，因为他拥有与白人相似的一切。然而皮瑞认为，由于他自己是黑人，不管何塞在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像“白”人，他与皮瑞的血缘关系使他也变“黑”。何塞将皮瑞的黑归于父亲的“印第安血统”，拥有这种血统的人被视作“白人”。但是皮瑞挑战了这种掩盖黑人血脉的策略：“什么样的印第安人？加勒比？或柏林克？何塞，你不知道非洲人是在波多黎各登场的吗？当西班牙人用完了印第安苦力，他们就从你知道的地方（非洲）带来了大量黑人，爸爸有混种血。我有，你们都有，这是一个关于我-我们-白人的演说谎言。”（145）他将何塞的“印第安”转移到西班牙裔加勒比地区的多民族（西班牙殖民者、印第安人及非洲奴隶）背景。

通过提及西班牙征服期间的加勒比人和柏林克人（印第安人），皮瑞质疑家人白皮肤的纯度，强调家庭的混血身份和祖先的殖民历史，从而坚信两种“白”之不同。桑切斯认为，“皮瑞要强调的是，美国的种族二元性隐秘地将波多黎各各种族内部的复杂性以及欧洲和非洲人（黑白混血儿）的混合归于统一的北美建构的‘黑人’”（47）。尽管名称“加勒比”和“柏林克”回顾了波多黎各本土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但是波多黎各人微妙的种族差异无法抗衡美国主流社会对种族身份的定义。正如皮瑞所说，“他们不在乎你是否看起来白皙。没有混合，没有混合”（Thomas 149）。作为一个黑皮肤的波多黎各人，皮瑞开始认识到，一滴法则（一滴黑色血液）使一个人变黑，这抵消了波多黎各混血种族中“白人”的特征。

四、超越：皮瑞的跨国民族认同意识

霍尔（Stuart Hall）认为所有的身份都是建立在差异之上，他主张在谈判和维护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身份，这就是他所说的“联合中的差异”（45）。安扎尔杜瓦（Gloria Anzaldúa）提出的“新梅扎西意识”的概念是理解和容忍差异并获得自我表征能力的一个合适的解释框架。在《边疆：新梅扎西》（*Borderlands /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一书中，她认为，边界给居于其上的人带来了一种新的意识，“种族、意识形态、文化和生物混杂”的新意识——“新

梅扎西意识”（77），它对歧义和差异的兼容打破了我们/他们二分法的界限，这种新的认识体系会促进思维和存在的另类思考方式：“梅扎西需要不断从习惯形态中转移出来；从趋同性思维这种倾向于用理性走向单一目标（西方模式）的分析推理到发散性思维，其特征是远离既定模式和目标并转向更为完整的视角，这种视角包容多于排斥。”（79）通过对矛盾的容忍，新梅扎西概念呈现了包含和排除的整体视角。作为人类互动的新轴心，作为种族和文化的混合体，它意味着打破边界和障碍，因此它用多元化和流动性代替了二元论。作为不同于民族和种族本质主义认同的一种新模式，新梅扎西为人类阐释了一种开放性的对抗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拆解二元并促进对立面的调和及边缘与中心融合的可能性。

安扎尔杜瓦的“新梅扎西意识”提供了在《穷乡僻壤》中超越黑/白种族对立的可能性，它揭示了国家-民族认同的复杂及多层次性，如霍根所言，“民族认同是在一个复杂的话语交换过程中不断地、集体地构建的[……]事实上，为简洁起见我使用单数的‘民族认同’，这是不太理想，多种具有争竞状态的民族认同话语必然并存”（3）。对皮瑞而言，自我发现之旅意味着认识到他所处的多种相互竞争的民族认同话语，而非仅局限于单数的民族认同，从而构建一种内在动态且对情境有灵活反应的跨国民族认同身份。

在南部的一个关键场景中，皮瑞和布鲁在诺福克的一家酒吧偶遇杰拉尔德，这一相遇使得作者更深入地探讨了美国种族关系的起源。作为一个浅肤色的宾夕法尼亚非裔美国黑人，杰拉尔德正努力变成波多黎各人，而他“下一步的目标是成为白人”（Thomas 191）。他表示自己“在种族上具有如此的混杂性以至于很难用该混合中的任何单一种族身份来定义自己”（174）。这种种族和民族认同的说法吻合安扎尔杜瓦对“新梅扎西”的具体解释：“新梅扎西人[……]学习成为墨西哥文化中的印第安人，从盎格鲁人的角度来看成为墨西哥人。”（79）就像新梅扎西意识所揭示的，杰拉尔德的自我描述和他的跨国背景相联，在这个背景中，固定的身份概念已被动摇。杰拉尔德无法辨别自己是黑人还是白人，因为他不仅拥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脉，而且拥有西班牙裔和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他的混杂身份打破了种族/族裔身份的稳定和单一性。杰拉尔德在小说中的出现有助于皮瑞理解他的跨国民族身份，如他所说：“我不能真正认同白人 or 黑人。基于我的情绪和身体特征，我有权认同任何种族或民族。”（Thomas 174）他的声明使皮瑞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一种过渡性存在：“我在想杰拉尔德有类似我的问题。除了他是位黑人试图证明自己是波多黎各人，我是波多黎各人试图成为黑人。”（174）与杰拉尔德的相遇可以使他理解种族/民族建构是流动的而不是单一的，因为在下一章，皮瑞肯定地说：“我不禁感到自己既是白人又是黑人。”（177）他对黑白两种身份的认同体现了对二元对立矛盾的解构。皮瑞的身份，就像杰拉尔德从黑白两个角度写作一本书一样，揭示了作家构建混血主体的想法（在西班牙裔和黑人之间），他的西班牙裔遗产与黑肤色可以安顿在“新梅扎西”诗学中：波多黎各混血儿身份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

为了抗议白人社会的黑/白二分法原则，皮瑞混进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妓院并与一名白人妓女发生了性行为，之后他告诉她，刚刚和她睡觉的是位黑人，这个事实震惊了白人女子。在

这起事件中,他通过和一位身份较低的白人女性发生性行为从而象征性地将白人与黑人交织在一起。尽管诉诸于性压迫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皮瑞挑战黑/白种族模式的勇气,但事实上,正是南方的这些场景表明作家“在杂合性、异质性和差异性概念获得学术和社会认可之前多年就已经开始拒绝黑与白的范式”(Sanchez 44)。自我发现之旅创造了皮瑞的“新梅扎西”跨国民族认同意识,揭示出他的身份建构经历了一个从停滞到移动性和灵活性转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皮瑞在跨国空间中追求种族认同为新型联盟和新型抵抗策略开辟了道路。

《穷乡僻壤》描述了作者在波多黎各民族遗产与美国文化之间产生的种族认同困惑,这种困惑集中体现在加勒比和美国背景中对黑人属性的界定问题引起的张力。在寻找拥有黑色皮肤的波多黎各美国人的种族认同的途径中,作家在其回忆录中战略性地与美国大陆、波多黎各和加勒比地区的话语进行合作。像桑切斯这样的批评家认识到,在书中,种族/民族身份的跨国动态是一个流动连续统一体,不是“或”而是“皆”的关系:“波多黎各人的身份同时在加勒比岛屿和美国大陆的边界内外: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不断处于过渡中。”(45)这种种族概念打破了固定刻板的单一种族认同。小说提出的西班牙裔身份和黑人身份的混合跨越了白与黑之间的僵化边界,从而创造了一种可能的跨国种族空间——新梅扎西(混血族)作为美国种族想象的另一种范式。由此,在跨越多重边界以解决种族困境的过程中,作家不仅拓展了种族定义,而且拓展了国家-民族认同的含义。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nzaldúa, Gloria. *Borderlands /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Aunt Lute Books, 1987.
- Behnken, Brian D. "Mexico's American / America's Mexican: Cross-border Flows of Nationalism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Crossing Boundaries: Ethnicity, Race,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edited by Brian D. Behnken and Simon Wendt, Lexington Books, 2013, pp. 63-81.
- Caminero-Santangelo, Marta. "Puerto Rican Negro: Defining Race in Piri Thomas's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MELUS*, vol. 29, no. 2, 2004, pp. 205-26.
- Flores, Juan. *From Bomba to Hip-Hop: Puerto Rican Culture and Latino Identity*. Columbia UP, 2000.
- Grosfoguel, Ramón, and Chloe S. Georas. "Latino Caribbean Diasporas in New York." *Mambo Montage: The Latinization of New York*, edited by Agustín Lao-Montes and Arlene Davila, Columbia UP, 2001, pp. 97-118.
- Hall, Stuart. "Minimal Selves." *Identity: the Real Me*, edited by Lisa Appignanesi, ICA Documents 6,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1987, pp. 44-46.
- Hogan, Jackie. *Gender, R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s of Flesh and Blood*. Routledge, 2009.
- Levitt, Peggy, and Nina Glick Schiller. "Conceptualizing Simultaneity: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3, 2004, pp. 1002-39.
- Martínez-San Miguel, Yolanda. "Ethnic Specularities: Exploring the Caribbean and Latino Dimensions of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Latino Studies*, vol. 13, no. 3, 2015, pp. 358-75.
- Richardson, Jill Toliver. *Narratives of Displace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Caribbean-American Transnational Narrative*. Diss.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8.

- Said, Edwards W. *Orientalism*. Random House, 1978.
- Sanchez, Marta E. "Shakin' Up" *Race and Gender: Intercultural Connections in Puerto Rican, African American, and Chicano Narratives and Culture (1965-1995)*. U of Texas P, 2005.
- Sepulveda, Fremio. "Coding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Race, Gender and the Figure of the Dictator in Junot Díaz's 'Oscar Wao.'" *Journal of Caribbean Literatures*, vol. 7, no. 2, 2013, pp. 15-33.
- Smith, Michael Peter, and Luis Eduardo Guarnizo, editors.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Transaction, 1998.
- Soehl, Thomas, and Roger Waldinger. "Inheriting the Homel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ross-Border Ties in Migrant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8, no. 3, 2012, pp. 778-813.
- Thomas, Piri.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Alfred A. Knopf, 1967.
- Vertovec, Steven. *Transnationalism*. Routledge, 2009.
- Wolf, Diane L.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Emotional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Struggles of Second-Generation Filipino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edited by Peggy Levitt and Mary C. Waters, 2002, pp. 255-94.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翻 译 研 究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的需求分析与人才培养

◎ 郭聪 杨承淑

内容提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国际医疗的发展,使得医疗领域语言服务人才需求增加。其培养应靠拢市场需求,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本研究透过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对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进行分类描述和属性分析,为人才培养的落实提供具体依据。

关键词: 访谈资料库 参与观察法 语言服务能力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79-13

基金项目: 2019年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项目“MTI医疗笔译课程合作教学模式探索”(MTIJZW201906); 2019年第6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语料库辅助下国际医疗语言服务能力模型的扎根理论研究”(2019M663343);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国际医疗语言服务能力模型建构”(20wkpy15)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82

Title: International Medical Language Service Needs Analysis and Talent Training

Abstract: Global population mobilit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care, and the demand for language service talents in medical fields has increased.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 training should be close to market demand, based on the local situation and facing the futur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interview,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field research, this study classifies,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language services,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Keywords: interview database,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language service competence

Author: Cong Guo, Associate Research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China; Chengshu Yang,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China.

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带来医疗与健康服务的需求，而无障碍的语言环境是国际医疗发展和医患沟通的“基础设施”，也是全球化在医疗领域深入发展所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根据穆雷等对全球语言服务供应商 100 强的调研分析，医疗产业口笔译需求名列榜首，工作内容涉及医疗口译的服务占 58.5%，医学笔译相关服务占 30.2%（10）。

随着中国各领域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步入“重质”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成为促进医疗三地合作的先手棋。而医疗领域的国际交流、科研合作、经贸活动、医院国际化发展、跨境医疗与医疗旅游等，均需高度专业化的语言服务人才与之配套。

目前各国的医疗口译需求是跨国移动与移居的积累结果，但涉及国际医疗场域的语言服务需求，无论在类型、方式还是服务范围上均与前人文献沿用的社区口译不同（杨承淑、齐龙驹 1-28）。因此，本研究拟对医疗语言服务的各类需求展开调查，进行描述与分类、特点分析，从而为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在各领域的工作模式、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机制等提供借鉴。

一、前人文献

在医疗语言环境分析研究上，侯闾在 2011 年便提出，中国的经济繁荣、外来人口的涌入对医疗语言服务提出了要求（24-28，48）。此外，由国际性活动或学术国际化触发，现有研究已体现出对静态语言环境的需求，如医院公示语调查研究（金其斌 72-76）、医院文件、医疗器械（陈亮、兰杰 12-14）的翻译实践报告与研究等。

在医疗实务方面，诊间口译是医疗语言服务中的显性需求，国内外均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外研究开展较早，立足移民国家背景，关注口译质量对病人安全和权利的影响（Nápoles et al. 940-47），涉及多语种，并从社会学视角关注译者角色的研究（Angelelli 31-41；Hsieh, “Interpreters as Co-Diagnosticians” 924-37；Souza 570-97）。也有涉及立法的完善，如《平价医疗法案》，以及《民权法案》中的相关条款研究。当前国内研究在诊间口译的需求、角色、原则和策略等方面也已取得一定的进展（詹成、严敏宾 47-50；彭雪姣 21-36；詹成、彭科明 57-62）。

在医学笔译方面，研究者对医学翻译的词汇（吕颖、张冰茹 50-55）、句法（林巍、赵友斌 181-84），乃至翻译技术在医学翻译中的应用（吴丽华 33-36，52）等进行了文体与工具的研究。而代表中国特色的中医药翻译实践和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朱文晓等 55-61，95）。

而在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方面，周恩根据 LinkedIn 网站上对医疗译者（medical translator）招聘条件的检索结果，从职业类型、所需语种、任职资格、工作职责、任职要求五个方面分析了专业医学翻译人才的需求，据此提出人才培养应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围绕专业能力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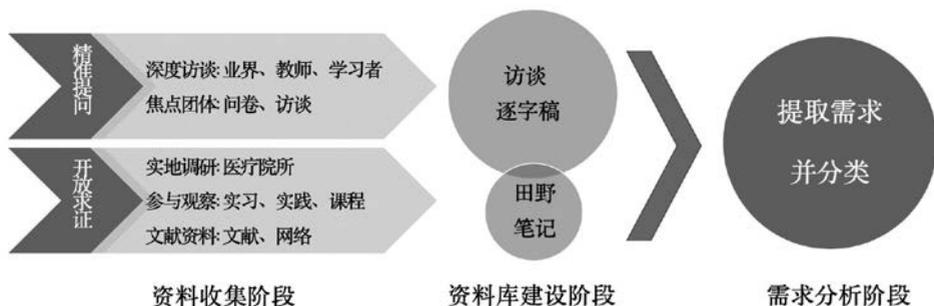
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基地等建议(90-96)。郭子凯、陈晨提出以译者为核心的医学翻译团队人才培养模式(181-83)。医学院校学者对医学生翻译课程设计的研究(孙景、陈杰 170-71)更显示了“新医科”建设和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明确需求。

上述研究反映了社会对医疗领域的翻译需求,但研究与实践之间却颇有落差。例如,医疗口译研究侧重诊间口译,缺乏对诊间之外及相关产业语言服务需求的关注。笔译方面注重研究型的医学论文翻译,对偏向应用的医疗文件翻译研究未能跟上产业实际需求。人才培养必须回应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也为培养方案、目标制定、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材料编选等人才培养的宏观至微观层面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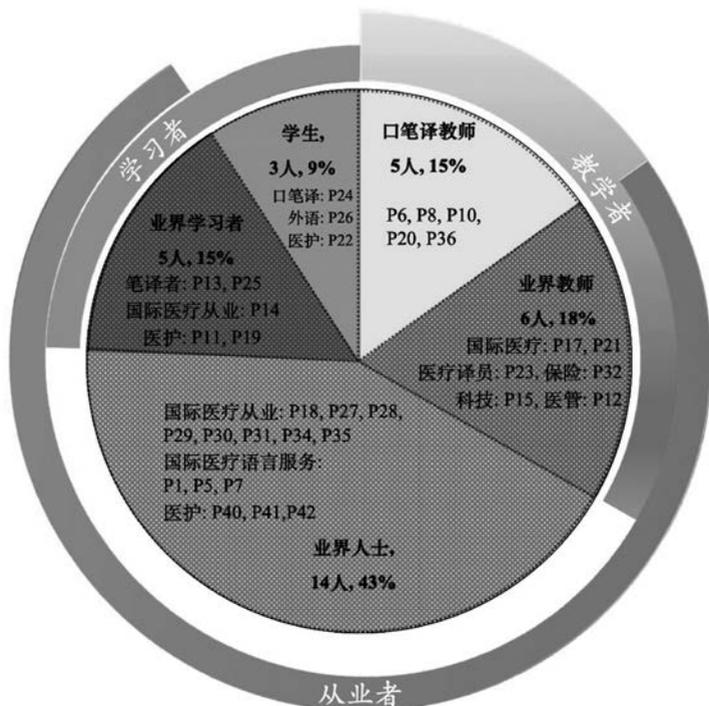
需求分析在外语教学领域最初用于ESP课程设计(Dudley-Evans and John 121-39)。近年也应用于专业领域口笔译人才需求分析和培养模式探索(Chang 93-136;姚亚芝、司显柱 80-86),为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分析常使用公开招聘资讯(史兴松、程霞 67-74;张生祥、张春丽 53-62),其优点在于能够呈现社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和需求,且数据具有一定规模,有利于更新社会认知,改善人才培养模式。但此类数据反映的是总体层面,且必须为显性需求才能以数据的形式收集,故无法包括熟人介绍或直接联系翻译人员等情况。与此同时,由于招聘企业并不一定完全了解翻译职业,因此也存在所列任职条件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需求的情形(周恩 90-96)。从外语人才第二语言能力培养视角来看,朗(Michel Long)认为需求的信息来源应为实际利益相关者,包括一线人员、教学者、管理者、顾客、学习者、研究者等(33),该观点也适用于语言服务领域。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包括口笔译和外语服务,因此还存在用人单位并未意识到的隐性需求,及未来发展和规划带来的新需求,这些都需要与研究者共同建构。本研究运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田野调查法、焦点团体的方法搜集资料,并进入国际医疗相关场域进行访谈、调查和参与观察。相比大量数据收集和调查问卷的“中断式”方法,上述方法更有其自然性,能够得出更加贴近事实的结论,获取更加丰富的细节,并将需求置于脉络之中。本研究亦有针对性地使用网络数据,以补充访谈与调查因条件限制而不可及之处。分析资料包括访谈录音逐字稿、田野调查笔记、研究者实践、实习、课堂笔记、网络资料等,研究流程如图1。



▲图1 研究流程

访谈和调查资料收集和分析从2017年3月至2020年3月，历时近3年。前期和中期以收集为主，后期则以补充为主，直至资料饱和，采用边收集边分析的方式。本研究基于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培养访谈资料库，共计25万字，选取与本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访谈稿。深度访谈21人，其中7人次接受过两次及以上访谈或补充；焦点团体6人，补充回答5人，医疗院所8人（包括三家医院，其中广东两家，台湾一家），除去参与过两项或两项以上活动者，共计33人（46人次），受访者编号以“P#”表示。归纳为三类：教学者、学习者和从业者，详情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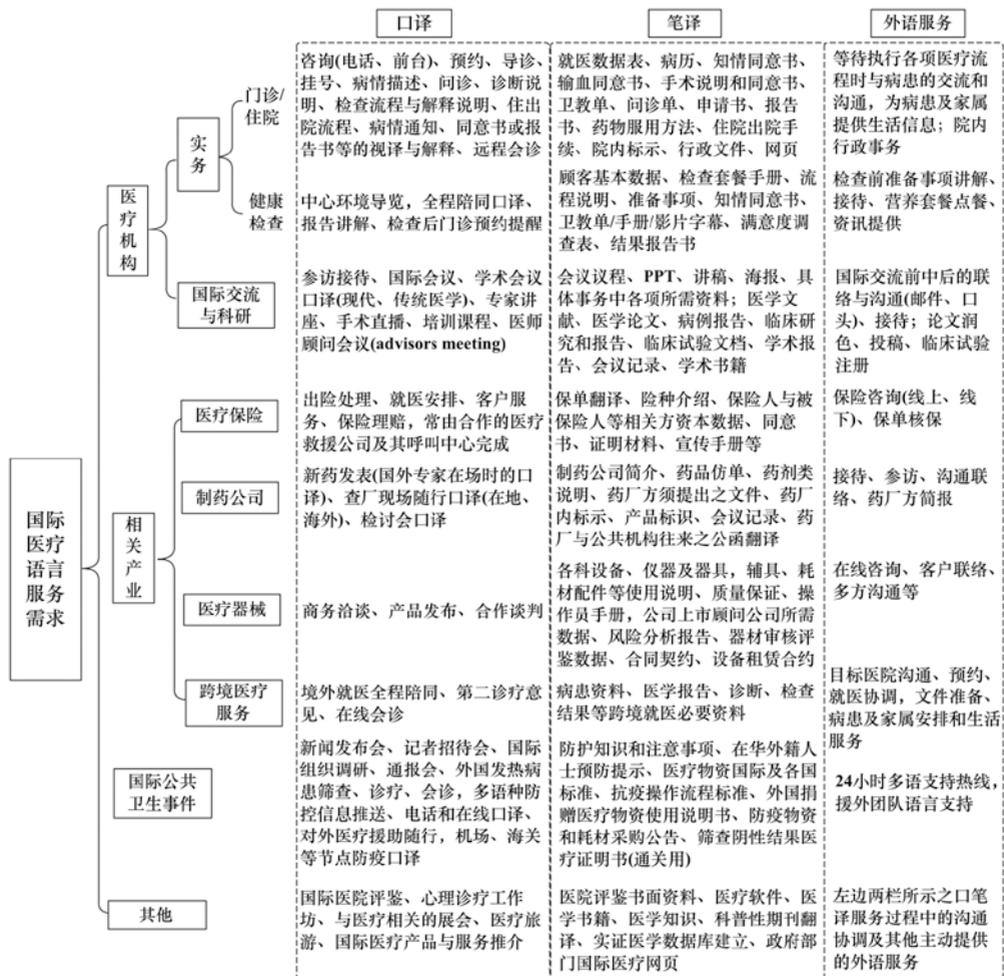
▲图2 受访对象分类

受访者所在机构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调查分别选取一家台湾某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健康管理中心,一家大陆某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医疗中心,一家大陆某指标型三甲医院。焦点团体访谈,则以台湾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修习国际医疗翻译专业实习课程的同学为对象,就其在实习和见习中所遇到的语言服务需求进行调查。

三、研究结果

(一)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分类

根据调查,以医疗院所为中心,国际医疗语言服务涵盖相关产业链,如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跨境医疗服务等,包含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及与医疗机构国际化紧密相关的国际医院评鉴等,详细分类和所包含之代表性服务需求如下(图3)。



▲图3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分类与描述

通过上述调查发现,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甚为可观。各分类之间由于领域和产业间的交流合作而相互关联,并与其他学科交叉,如法律、商业、金融、机械等。而口笔译与外语服务相辅相成,在一些情境下相互贯穿其中,如在病患个案管理过程中涉及与该客户相关的全程语言服务。

(二)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类型

上述调查发现,业者对于人才的需求类型呈现多样化。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按照与需求方对接的方式可分为:(1)内部专职,如医疗机构专职语言服务提供者,岗位为管理师、专员或翻译人员,语种多为英语,其次为日语,根据业务需求亦有韩语等;(2)自由职业,如国际医院评鉴的口笔译人员、国际会议口译等,分为专做医疗领域和多领域发展的两种职业路径;(3)跨业兼职,如高校教授医学口笔译的教师,及运用自身专业优势和外语特长,翻译新药引进和医疗器械研究的医学生。按照语言服务提供者背景,可分为:(1)外语及翻译背景。成长路线为本科是外语专业,硕士为翻译专业,或本科和硕士均为翻译专业,在硕士期间向医疗翻译领域发展;(2)医护背景。调查显示外语程度高的护理师尤为缺少。在国际化程度高的指标型医院,经口笔译训练的医护人员往往承担了院内的部分口笔译任务。(3)跨专业的复合型背景,如生物+翻译、工商管理+翻译、机械+翻译。

(三)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特点

通过分析上述调查结果发现,国际医疗语言服务具有跨学科性、高度情境化、角色多元化、能力要求复杂化、语种需求差异性和知识管理必要性等特点。

1. 跨学科性

医疗语言服务并非医疗知识与口笔译知识的简单叠加。从特定的应用情境中涌现的知识,往往具有特定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实践模式,但又不能在现有的学科版图中进行定位,其最大的特性就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本土化为推动力和组成部分,回应的是高度专业化和本土情境化的应用性问题(Gibbons 27-34, 149)。在医疗情境中的语言服务提供者,需要掌握的是医疗话语体系、医疗知识与程序、国际医疗相关产业领域的知识,以及面对国际病患和各项业务的问题解决方案。医疗语言服务各个面向都需要具备相应知识架构,且相互交错形成新的跨学科知识与程序。重要的是,应促进各领域规范的跨学科融合与建构,结合已有条件,不断创造符合在地需求的问题解决方案,并固化为标准操作流程与思维模式。如翻译规范与医疗伦理的融合,逐步发展成为医疗语言服务的实践规范与评价标准。

2. 高度情境化

国际医疗翻译业务需求多样,具有情境细分及相互关联的特点。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并非用“医学翻译”即可一言以蔽之。调查表明,除传统认知的医疗机构需求,还包括相关产业和国际事务的语言服务需求,如医疗保险、制药、医疗器械、国际救援、跨境医疗,以

及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医疗援助、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需的语言支持。上述每个类别,均可视为一个中心,连结其他分类及其子情境,各类别本身既是主场景又互为背景。通过情境化的手段,才能接近现实,通过共享符号、建立联系,才能描绘现实,理解现实的意义(Gibbons 95)。

国际医疗情境具有能够不断细分的特性,且相互关联交错。就医院而言,可分为前台咨询、诊间、检查室、手术室、治疗室、病房、康复中心,甚至救护车、急诊室,以及多学科会诊。检查室情境还可分为影像检查、质子治疗、采血,以及各科室检查,要求语言服务提供者熟悉基本原理和设备操作流程。无论是跨国就医陪同、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多语资讯发布,还是医疗器械说明书翻译,均依托该情境所处的脉络。情境越细分,语言服务提供者需要具备的知识与能力就越深入和精细,越需要深层知识结构与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的综合运用,以提供高质量、专业化、贴合使用场景与在地需求的语言服务。

3. 角色多元化

医疗语言服务需求的跨学科和情境化特征,使得语言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倾向多元化发展,对于内部专职译者更是如此。研究表明,医疗机构口译员并非仅扮演中立的传声筒(conduit)的角色,还是引导者(advocate)、管理者(manager)、专业人士(professional)(Hsieh, “I am not a Robot!” 1367-83)。并且,在跨文化语境中还强化了他们信息流管理者(flow manager)、关系建立者(relationship builder)、文化当局者(cultural insider)的角色(Schwei, et al. 1-6)。发挥着帮助病患理解,传达病患心声,帮病患讲出安全忧虑,辨识就医过程的挑战等作用(Wu and Rawal 5-8)。上述研究立足于移民国家背景,以保障语言弱势群体权益和病人安全为准则,以诊间的单一情境为其考察范畴。

在此基础上,医疗机构译者P1、P5、P14、P30均表示,内部专职语言服务需求兼顾口译、笔译与外语服务。全职的医疗语言服务者,扮演着组织内的语言专家,弥合国际医疗由于语言及文化障碍而产生的断链。相应功能也扩展至提供专业语言支持,如参访接待、网页翻译和更新、资料本地化、跨境业务统整、国际资讯收集整合等。还可能与外部译者或语言服务公司联络,处理本单位的大量翻译任务,其专业性体现在翻译质量管控。他们通常兼任其他职务,如语言服务相关部门主管及培训师/委托者、国际医疗管理师,以及项目经理、部门协调人、助理、秘书等。需要与组织内各成员协同工作,方能发挥并贯通其各角色的作用。

4. 能力要求复杂化

以往对于译者的能力研究往往着眼于口笔译通用能力,以至于落实到专业领域的讨论,多以“主题领域知识”概括,从而产生学用不符,适应时间偏长的问题。杨志红、王克非认为翻译能力可分为三类:(1)基础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2)核心能力:翻译知识与策略能力;(3)外围能力:工具能力。并强调口笔译能力不同,各专业领域要求有别(94)。任文则将“翻译能力+人际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主动服务能力”视为新时代语境下的译者能力,认为加号后属于“重要的(狭义)语言服务能力”(95)。国

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对于服务提供者能力的要求则更加复杂而多层次，具有和基础能力深化、核心能力跨学科发展，外围能力圈扩大化等多重组合的特征。

就基础能力深化表现在语言能力背后的深层知识结构而言，国际医疗语言服务提供者应掌握双语能力、口笔译能力、相关知识与程序、法律法规等，以建构医疗及所处领域的深层知识结构，将双语能力与专家知识高度融合，深入落实于专业领域和实务情境，如医疗保险、公共卫生等。

而在核心能力上升为跨学科的问题解决能力方面，拉莫斯（Prieto Ramos）强调，专业领域翻译能力除进行组成要素的描述之外，还应重视翻译能力的整合性发展，也就是解决实际翻译问题的专业领域跨学科方法和技术诀窍（7）。需注重翻译规范与特定领域规范的融合，以发展跨学科的操作流程标准与问题解决方案。

至于外围能力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原有外围能力随着时代进步成为基本能力和素养，如工具使用。另一方面表现在语言服务能力外延范围不断膨胀，如与医护人员协同工作，行政能力，了解医疗文化，培养医疗思维，具有同理心和良好的服务礼仪等。调查显示，还需具有主动提供外语服务的能力。

此外，受访资深医师与教师一致指出，前述能力的应用应与情境相适应。如，面对病患时，以往处于调节地位、保障口译通顺流畅的策略能力，必须让位于准确，必要时可以停下与医患双方确认。还须在落实医疗伦理的基础上，强化医学人文能力，发挥语言服务的跨文化协调作用。医疗领域常面对突发事件，应能够迅速捕捉信息，进行重点摘译，为团队进行关键决策提供有效资讯。另一应用能力的面向，则是应与角色相匹配。根据所处行业与职位，发展职业领域能力，扩大能力边界，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做到终身学习。这两项应用能力都是医护人员的必要能力，医疗语言服务者也不例外。

5. 语种需求差异性

不同领域对语种的需求自有差异，如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医院评鉴需要中英互译，机构内英文和日文相对其他语种更为普及，某些业务需求或有韩文。国际医疗院所中，欧美国家患者无论其母语为何，经常不得不说英语，使得患者仍处于语言与医疗体制双重弱势的局面。透过对国际医疗院所部门主管的访谈获知，保险公司亦向医疗机构代派多语种译者，但往往缺乏专业训练，致使医疗质量难以确保。

6. 知识管理必要性

新知识的创造具有自发性和弥散式的特征，需要不断积累和反思，方能上升到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范畴，成为组织和个人的语言资产和技术诀窍。医疗发展日新月异，需要从业者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并将从情境中得到的知识固化下来。此外，口笔译工作，均应理解技术能力的不可或缺性。翻译任务载体多样，笔译文件内容重复程度高，必须掌握翻译技术和知识管理方法，方能保证术语统一、内容准确、产出效能佳。

（四）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合作机制

根据上述调查发现，各类型语言服务提供者是协同合作的关系，如医护人员与口笔译服务提供者的合作，外聘译者与机构内人士的合作，以及多语种语言服务提供者与各机构、组织的合作与支持。并且，各领域之间均需要沟通与联系，语言服务提供者在涉外情境下，起到了弥合与连结的作用。上述结果与南谷香织（南谷かおり）医师在第22届口笔译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描述的大阪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的情况一致^[1]。

在医疗机构，翻译背景和护理背景的语言服务提供者协同工作。国际医疗部专职医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文诊疗，在这种情况下，医师也承担了一定的语言服务角色。但病患的语言服务需求实际上始于医疗行为实施前的咨询（前台、电话或在线），甚至是从浏览医疗机构网页以获取所需信息开始的。因此，医疗语言服务需求的起始点，相比以往对诊间口译的认知，早已大为提前。并且，在其他就医环节，需求和情境也逐渐拓展和延伸。

受调查的医疗机构内语言服务提供者以英文为主，根据收治病患主要构成和机构使命，也有以日文、韩文等为特色的医疗机构。为了因应不同国家病患需求，采用多语种支持的方式。这些多语种的语言服务提供者可与多家医疗及其他机构合作，受访者中的P26即为如此。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服务提供者，承担了更多外语沟通等需要主动服务的工作，对其他语种则更倾向于口笔译的需求。

世界知名国际医院，如曼谷国际医院，其语言服务人力资源配置，在语种数量、配套培训、人员规模、薪酬待遇等方面，体现了对语言服务提供者的需求和认可，并将该群体纳入国际医疗团队与事业发展的一部分（杨承淑、齐龙驹 1-28）。虽然不同医疗机构对于国际医疗在本院的属性与任务定位不同，但专业化医疗场域语言服务人才不足，是接诊外国病患的医疗机构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除各组织机构内的全职语言服务提供者外，现行的医疗译者进入医院提供服务，可采用与翻译公司合作、保险公司代派译者、在线语言服务、与临近大学等人才培养机构合作等途径方式。根据受访者P42（陆）、P14（台）、P5（日）等业界人士的叙述，医疗机构规划网页翻译等在超过内部译者“产能”的笔译时，通常会采取外包的形式。在医疗语言服务上，口笔译者均可进入支援。自由译者则可支持各分领域的口笔译工作，甚至有受访者成为机构的固定合作方，偶尔承担一定的外语沟通和协调工作。此种方式可提升医疗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能力。

在线服务则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如对于急症或应避免感染的情况以提升医疗语言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而在线的笔译，能够为医护人员构建双语医疗文本平台，设立词汇和常用文件共享机制，合作解决应急情境下的语言问题。但对于危重症及患者语言表达不顺畅的情况，则仍需要现场服务。

然而，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其他相关医疗产业，不论语种、服务提供方式和载体，均

须要求语言服务提供者的能力结合实际需求情境,提供专业化、符合行业规定和伦理规范的服务。

四、从需求看人才培养

社会发展和全球化深入为国际医疗布局带来变化,使得医疗语言服务场景细分。因此,应重新认识医疗语言服务需求,思考人才培养方案。以下从四个方面提出本研究对教学可资参考的考察结果。

(一) 面向市场需求,立足在地资源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应充分考虑市场的现有需求与未来需求,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并能服务在地的人才。同时,应充分考虑产业集群分布与地缘优势,结合地区特色与本校优势。在拥有制药、医疗器械、国际康养、健康检查、跨境医疗、跨国企业、永久性世界级论坛等的地区,高校应结合产业需求,配合和输送人才。拥有大学附属医院的高校,则应深入合作,一方面服务医院科研、教学与实务的国际化需求,一方面吸收院内优秀人才,拓展专业化师资队伍。地处沿海、边境地区的高校,则应把握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结合自身教育资源,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合作,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国际医疗服务,提升区域医疗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立足在地,面向全球。

(二) 优化课程体系,培养专业领域能力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具有跨学科性、需求多样化、能力要求复杂化等特点。应培养具备情境化问题解决能力,能与医疗团队协同工作,并发挥其语言服务的专才。此外,应依据实际需求与地域特点,培养多语种人才。同时,英中语对的学生也应重视第二外语的学习,扩大能力地图。还应凸显语言与翻译背景在语言能力、跨文化调节和人文素养上的优势。从产业整体需求出发,进行人才布局。

前人研究已指出,在实习过程中,设立监督机制,确保学生学习成效的必要性(穆雷、李希希 109-19)。因此,设立实习导师,明确培养单位、实习基地、学生个人三方的实习目标、任务、流程与效果反馈机制,可促成实习中的深化、实践、补足、拓展课堂所学,增强学生正式步入职业的准备度(readiness)。实务上,可采取校企合作的方式,在实习的过程中培养人才、互相选择。透过专业实习课程,规范建设实习基地。

(三) 多学科师资建设,专家团队授课

专业领域知识与能力习得,需要集合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师资力量。部分课程可采取合作

教学,以共同商讨教学内容,制定系统连贯的教学方案。课程之间协同兼顾能力构成的不同方面。在课程内容选择上,根据上述调查所列的情境及文本,结合各专家在专业领域内的经验,进行内容设计和选材。

课程专家可包括口笔译专业教师、精通医疗口笔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医生、护理师、业界人士等专家团队。各成员本身应具有跨学科性,包括从事国际医疗的医护人员、具备一线经验的相关领域人士。透过“多学科汇通,跨学科能力建构”的方法,藉由不同背景和专长的教师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教学,通过多学科协商和实践,发展跨学科的问题解决程序、方法等议题。专家团队之间亦需不断探讨、相互学习,也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与创造力。

(四) 打通学科壁垒,形成终身学习

医疗发展日新月异,新知识不断涌现,而整个社会也正在向学习型社会迈进。欧盟对于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已经变为注重终身学习对个人能力提升与全人发展的重要意义(EMT, 2017)。终身学习可分为两种方式:个人在知识与能力上的不断积累与反思;个人在指导下有系统的学习。只有将两种方式相结合,在专家指导下,进行有设计的学习,才能适应社会需求。人才培养单位应接纳跨领域、跨专业、有经验的人士继续攻读学位,活化课堂,形成教学相长、同侪互动的氛围。同时,终身学习也催生了教育训练的需求,短时的密集训练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升专项能力,增强产业发展动能,为行业储备人力资源。

本研究的调查,旨在透过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分析,为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设计提供参考。未来只有立足于中国国情,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师资队伍,培养具备深层知识体系与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才能弥合产业断链,创造新机。

注释 [Notes]

- [1] 南谷香织系大坂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未来医疗开发部特任准教授、国际医疗中心副召集人。本次会议于2018年6月2日到3日在台湾辅仁大学召开,主题为翻译与知识管理。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ngelelli, C. *Revisit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A Study of Conference, Court, and Medical Interpreters in Canad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hn Benjamins, 2004.
- Chen, Liang, and Jie Lan.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lation of English for Medical Instruments." *Chinese Science & 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 2016, pp. 12-14. [陈亮、兰杰:《医疗器械英语特点及其翻译探究》,载《中国科技翻译》2016年第2期,第12-14页。]
- Chang, K. C. C. "Needs Analysis for the Training of Court Interpreters."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Review*, no. 2, 2016, pp. 93-136.

- Dudley-Evans, T., and M. John. *Developments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Cambridge UP, 1998.
- Gibbons, Michael, editor.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Sage, 1994.
- Guo, Zikai, and Chen Chen. "Application of Medical Translation Team Model in Training and Selecting Medical Translation Talents." *China Medical Herald*, no. 27, 2019, pp. 181-83. [郭子凯、陈晨:《医学翻译团队模式在医学翻译人才培养和选择中的应用》,载《中国医药导报》2019年第27期,第181-83页。]
- Hou, Tia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terpreting in America and Its Experience for China." *Chinese Science & 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1, pp. 24-28, 48. [侯阆:《美国医疗口译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借鉴》,载《中国科技翻译》2011年第1期,第24-28,48页。]
- Hsieh, E. "Interpreters as Co-Diagnosticians: Overlapping Roles and Services between Providers and Interpreter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no. 4, 2007, pp. 924-37.
- . "I am not a Robot! Interpreters' Views of Their Roles in Health Care Setting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no. 10, 2008, pp. 1367-83.
- Jin, Qibi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Taking 8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Shenzhen as Exampl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08, pp. 72-76. [金其斌:《医疗卫生行业公示语英译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深圳市8所医疗机构为例》,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3期,第72-76页]
- Lin, Wei, and Youbin Zhao. "Medical Translation: Analysis of Words and Sentenc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9, pp. 181-84. [林巍、赵友斌:《医学翻译:词语与句式的辨析》,载《中国翻译》2019年第3期,第181-84页。]
- Long, Michael, editor. *Second Language Needs Analysis*. Cambridge UP, 2005.
- Lv, Ying, and Bingru Zhang. "A Study on Recurrent Nouns in Medical Articles Written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6, 2019, pp. 50-55. [吕颖、张冰茹:《中外医学论文高频名词对比及翻译启示》,载《上海翻译》2019年第6期,第50-55页。]
- Mu, Lei, et al. "Practitioner Capabilities and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A Survey-based Analysis of Globalizing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1, 2017, pp. 8-16. [穆雷等:《面向国际语言服务业的翻译人才能力特征研究——基于全球语言服务供应商100强的调研分析》,载《上海翻译》2017年第1期,第8-16页。]
- Mu, Lei, and Xixi Li.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MTI Interpreting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o. 2, 2017, pp. 109-19. [穆雷、李希希:《MTI口译教育:问题与对策》,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年第2期,第109-19页。]
- Nápoles, A. M., et al. "Inaccurat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Medical Encounters of Spanish-Speaking Latinos." *Medical Care*, no. 11, 2015, pp. 940-47.
- Peng, Xuejiao. *An Interpreter's Multidimensional Role in Medical Interpreting*. Thesi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9. [彭雪姣:《医疗口译中译员多重角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9。]
- Prieto Ramos, F. "Developing Legal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 Integrative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 *Comparative Legis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egal Communication*, no. 5, 2011, pp. 7-21.
- Ren, Wen. "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the New Era: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no. 6, 2018, pp. 92-98. [任文:《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问题与出路》,载《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6期,第92-98页。]
- Schwei, R. J., et al. "Physician Perceptions of the Types of Roles Interpreters Play in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Pediatric Encounters and How The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Interpretation." *Primary Health Care Research & Development*, no. 25, 2019, pp. 1-6.
- Shi, Xingsong, and Xia Cheng. "A Social Needs Analysis of Business English Talent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2, 2019, pp. 67-74. [史兴松、程霞:《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分析》,载《外语界》2019年第2期,第67-74页。]
- Souza, I. E. T. V. *Intercultural Mediation in Healthcare: From the Professional Medical Interpreter's Perspective*. Xlibris, 2016.
- Sun, Jing, and Jie Chen. "Exploration of Training Mode of Medical Interpreters." *Theory Research*, no. 11, 2013, pp. 170-71. [孙景、陈杰:《医疗口译人才培养探讨》,载《学理论》2013年第11期,第170-71页。]
- Wu, Lihua. "A Study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Medical Translation Powered by Trados." *Chinese Science & Technology*

-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8, pp. 33-36, 52. [吴丽华:《医学文本机辅翻译质量与效率实证研究》,载《中国科技翻译》2018年第1期,第33-36,52页。]
- Wu, M. S., and S. Rawal. “‘I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The Views of Professional Medical Interpreters on Their Role in the Delivery of Safe Care to Patients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PLOS ONE*, no. 10, 2017, pp. 1-11.
- Yang, Chengshu, and Longju Qi. “Translation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edicine: The Service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Services in Medical Care.”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88, 2018, pp. 1-28. [杨承淑、齐龙驹:《翻译教学与国际医疗:论医疗的外语服务与实务运作》,载《翻译季刊》2018年第88期,第1-28页。]
- Yang, Zhihong, and Kefei Wang.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6, 2010, pp. 91-95. [杨志红、王克非:《翻译能力及其研究》,载《外语教学》2010年第6期,第91-95页。]
- Yao, Yazhi, and Xianzhu Si. “Analysis of Demand for Talents in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Based on Big Data.”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8, pp. 80-86. [姚亚芝、司显柱:《基于大数据的语言服务行业人才需求分析》,载《中国翻译》2018年第3期,第80-86页。]
- Zhan, Cheng, and Minbin Yan.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terpreting in China: A Study of Medical Interpreting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Area.”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no. 3, 2013, pp. 47-50. [詹成、严敏宾:《国内医疗口译的现状、问题及发展——一项针对广州地区医疗口译活动的实证研究》,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47-50页。]
- Zhan, Cheng, and Keming Peng. “Features and Coping Tactics of Interpretation for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Existential Psychology Consultation Workshop.’”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no. 1, 2017, pp. 57-62. [詹成、彭科明:《心理诊疗口译的特点及工作策略——基于“存在主义心理咨询工作坊”口译语料的实证研究》,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57-62页。]
- Zhang, Shengxiang, and Chunli Zhang. “Translation Education Must Gear up to the Real Demand of Social Need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6, 2017, pp. 53-62. [张生祥、张春丽:《翻译人才素养的社会需求分析与培养模式探索》,载《上海翻译》2017年第6期,第53-62页。]
- Zhou, En. “Explorat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ors in Specific Fields: With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of Medical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5, 2016, pp. 90-96. [周恩:《基于医学翻译职业需求的专业类翻译人才培养探索》,载《外语电化教学》2016年第5期,第90-96页。]
- Zhu, Wenxiao, et al. “TCM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1978-2018).”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1, 2020, pp. 55-61, 95. [朱文晓等:《中国中医药翻译研究40年(1978—2018)》,载《上海翻译》2020年第1期,第55-61,95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设计与实施

◎ 王珍珍 陶友兰

内容提要: 做好翻译研究，熟谙研究方法必事半功倍。本文根据国内外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开设状况，提出在中国大陆开设“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必要性，并具体设计与实施了这门课程。通过课堂观察、问卷、访谈、课程反思等途径，探究了课程设计的多元化路径和课程实施中的实践性原则，验证了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实践证明这类课程不仅加强了学生的方法论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而且激发了他们的研究热情，他们撰写的课程论文就是很好的例证。建议更多学校通过设置方法论课程，有意识地传授翻译研究方法，引导学生走上正确的翻译研究之路。

关键词: 翻译研究 方法论 以问题为导向 “做中学” 实践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092-13

基金项目: 上海电机学院 2019 年重点课程“英汉口译”项目 (A1-0288-19-027-062)

作者单位: 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306;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上海 200433

Titl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Abstract: As methodologies are very crucia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S), we think it necessary to open a course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S*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research after researching similar courses at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such a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and doctoral students. It finds that strategies such as question-orient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doing are essential in the practice and that the diversified modes of teaching also help construct an effective course. By ways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reflections, it proves that students are now more aware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academic regulations when conducting researches in TS and they are inspired to show more interest in research. Their final term papers are highly evaluated by the teacher, which in return verifies the validity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such a course should be opened in other universities so that more and more students will be properly educated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S.

Key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question-oriented, learning by doing, practicability

Author: Zhenzhen Wang,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Dian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Youlan Tao,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方法论在翻译学科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翻译人才的培养更是离不开方法论的训练。“方法论是学者进入一个研究领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也是一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蓝红军,《译学方法论研究》xv)。穆雷认为在翻译教学,尤其是研究生的翻译教学中,“大量的理论学习和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她特别指出,“翻译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四个意识,即敏锐的学科意识、方法论意识、自觉的理论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挑战和创新意识”(《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43-46)。廖七一也明确提出方法论课程在翻译理论教学中的重要性,认为翻译理论教学应该包括四大板块,即翻译技巧与方法,与翻译相关的理论,翻译教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研究),其中的翻译理论(研究)除了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之外,还应包括翻译研究方法论的教学(《MTI中的翻译理论教学》25)。事实上,目前“有关方法论的讨论逐渐趋多,这表明翻译学在获得独立学科的身份后对学科内涵建设的关注”(蓝红军,《翻译学方法论基本概念》72)。由此可见,开设方法论课程是培养翻译研究储备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翻译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一、国内外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开设概况

在国外,开设研究生翻译方法论课程的高校较为普遍。穆雷就曾提及,“在美国研究生读书期间写论文,与其说是作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作方法论的研究”(《翻译研究方法概论》vi)。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高校如英国华威大学翻译专业开设有“方法论与研究技巧”(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423-29),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开设有“翻译学研究方法”(柯平、鲍川运62),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开设有“研究方法”,等等。陈艳红调查了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24所高校的翻译研究生课程设置,发现其中的18所设置了研究方法论课程,其中44%的高校研究方法论课程为必修课(29)。

就国内情况来看,杨晓荣考察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各翻译系(所)的理论课程设置情况,发现理论课程的设置颇为系统和完整(33)。诸如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翻译研究导论”(柯平、鲍川运59),台湾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开设了“研究方法 with 论文写作”和“研究方法 with 语法理论”(何瑞清39),澳门大学开设了“翻译研究方法论”等。相比之下,中国大陆许多高校的翻译研究生课程设置却不如人意,开设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学校寥寥无几。有的甚至只是在“翻译学导论”课程中略有提及,但“大部分内容是蜻蜓点水”(文军76)。

当前翻译教学的紧迫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翻译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合理地设置翻译专业(方向)课程(陶友兰、强晓55)。这一点在穆雷对中国翻译教学体系的构建中作了更为具体的表

述：在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方面，翻译学硕士应“具备翻译学研究基本能力”；翻译学博士应“掌握规范的研究方法”，“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而翻译硕士专业除了“加强实践环节”外，也应“安排必要的理论课程”（《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44）。方法论课程在翻译人才，尤其是翻译人才储备力量的培养方面意义重大。就笔者所知，目前大陆高校开设翻译方法论课程的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复旦大学。下面就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一门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入手，关注多元化课程设计和基于实践的课程实施，并在期末通过调查问卷、师生访谈、课程论文的形式对课程设计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以期对有意开设方法论课程的教师和初涉翻译研究领域的学习者提供些许借鉴。

二、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设计

本研究涉及的课程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开设的“翻译研究方法论”，授课对象为外文学院翻译系研究生，包括翻译学博士和部分翻译硕士。教师设计课程之初秉持社会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在课程实施中推行全方位“卷入”（involved），让学习者置身真实的“问题”情境，观察、模仿、探索翻译研究方法在具体案例中的实施。同时构建合作学习的模式，学习者在生生、师生互动，与其他研究者的互动中，不断建构和内化自己的知识，提升研究方法的应用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扮演了推动者（facilitator）的角色，在“最近发展区”指导下搭建支架，帮助学生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Tao 296）。

（一）课程内容多样化

课程设置为每周2学时，共计15周。教学参考著作包括*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等九本^[1]，在方法论的学理介绍上以第一本为主。具体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 第一周 课程介绍和实证研究概述
- 第二周 问卷调查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第三周 问卷设计及点评
- 第四周 观察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第五周 文献计量分析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第六周 访谈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第七周 行动研究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第八周 案例分析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第九周 期中学习交流座谈会

- 第十周 语料库研究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第十一周 语料库翻译学：缘起、内涵与意义（课堂讲座）
- 第十二周 个人研究经历和成果分享暨小组展示文献阅读心得
- 第十三周 学术论文写作规范
- 第十四周 国内外译学期刊分析及论文发表
- 第十五周 课程总结和反思

本学期的教学主要围绕实证类研究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方法，指的是“从事翻译研究所采取的手段、途径和可操作规则或模式”（穆雷，《翻译研究方法概论》1）。翻译研究方法论，是“对翻译研究方法的研究，即对如何研究的研究”（蓝红军，《译学方法论研究》xv）。该课程在内容上融汇了方法和方法论两个范畴概念：前八周教学注重翻译研究方法，通过论文案例分析、“做中学”等教学环节引导学生探究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实施原则和步骤；后七周从学者的方法论演绎、学术论文规范化写作指导，以及个人学期成果汇报三个维度展示方法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方法提供了方法论的体系基础；方法论则为研究者规范化选择、使用方法提供依据和指导，从而使研究趋于严谨和科学（李惠红 28-30）。

（二）课程设计多元化

方法和方法论的融汇对课程设计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课程在传统课堂的基础上营造了创新的课堂，涵盖课堂讲座、学术论坛、培训活动、座谈交流等形式。在课堂讲座中，胡开宝教授从语料库翻译学的缘起、内涵与意义娓娓道来，梳理了语料库方法在翻译学中的应用及未来展望。在翻译研究系列讲座中，诸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成果出发，展示了典籍英译、中医翻译、法律翻译、外宣翻译、联合国口译等诸多翻译研究前沿领域的研究，生动呈现了方法论运用得当所带来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学期中，教师组织部分学生参加了第三届全国翻译批评高层论坛、外语实证类研究培训，以及质性研究培训会议，部分学生在论坛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这些创新课堂上的交流为学生实施具体方法的应用（如开展访谈活动等）、近距离了解其他学者的方法论演绎，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此外，教师利用参加新中国翻译事业70年论坛暨2019中国翻译协会年会的机会，以座谈交流的形式为学生带来翻译研究领域的最新资讯，翻译信息化、技术化、职业化发展给翻译教学、翻译研究所带来的改观，鼓励学生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拓宽研究视野和学术视野。

形式多样的创新课堂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束缚，崭新的方法论课堂推动了学生课后对课内知识的吸收和内化，反过来助推了课堂活动的开展，促进了良性的课程实施。

三、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实施

良性循环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其性质决定了必不能照搬传统的讲授模式，而必须在课程实施中遵循社会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注重方法论在真实情境中的可操作性，聚焦学生在知识建构和内化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具体教学实施中，课程注重课前、课中、课后环节的紧密衔接，遵循实践性指导原则，在教学策略上关注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践行“做中学”的学习策略，共同建构了积极有效的方法论课堂。

下面笔者以2019年秋季学期课程为例，通过自然课堂观察、师生访谈、课程反思等途径，探究课程的具体实施过程。

（一）基于实践的教学策略：以问题为导向

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学生将方法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去。许钧在接受访谈时曾多次强调翻译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祝一舒、许钧 3-7；黄新炎 61-65；冯全功、许钧 104-11）。蓝红军更是从翻译理论发展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的视角对翻译理论研究所经历的、面向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翻译研究所面向的问题首先就是实践中的问题，既包括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包括社会实践中的翻译问题（《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3-4）。

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作为一门“授人以渔”的工具性课程，首先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才能认识、分析、解决问题。这个从认知到实践的过程蕴含思辨能力的发展，包括概述的能力、考证的能力、判断的能力、布局谋篇的能力和反思的能力（参考教师访谈录音）。学生是课堂活动的主体，教师是活动的推动者。故而在开课伊始，教师就向所有学生明确：本课程不设旁听，所有学习者一旦加入必须全情投入、全力以赴，完成所有相关文献阅读、方法实践、课堂陈述、小组讨论，以及期末考核任务。第二周课上发生了些许人员的变动，一位波兰籍主修汉语文学的留学生和一位口译方向的翻译硕士选择退出，由此看出课程的难度与压力。但这恰好说明只有认同教师的教学理念且持之以恒的学生才能将这门课程的研究坚持下去。

1. 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输入

在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师从文献导读开始就贯穿以问题为导向的理念。在阅读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之前，引导学生首先查阅 Notes on Contributors，了解作者和合作者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和相关领域展望。学生可以从感兴趣的作者或者主题入手，阅读最经典的著作。在文献阅读时，提醒学生做好笔记，记录问题与反思，文中的观点是否赞同、论证的条理是否清晰、结论部分有否脱节等都是深度阅读中可以挖掘的东西。这种良好的思辨能力也是对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何刚强 39）。

做一个会提问的读者并非易事。譬如，在探讨案例分析法在翻译研究中应用的课堂上，

整个教学分为课前输入、课堂内化和课后输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对如何提出问题做出了要求。在课前输入环节，除了阅读两部理论著作中关于案例分析法的相关章节，掌握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常见应用之外，教师与学生还通过微信线上讨论确定了课堂讨论的11篇国内外期刊论文。选取的论文从宏观到微观，从翻译教学、法律翻译到文学翻译，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各不相同。

此环节要求学生按照第一节课的文献阅读要求做笔记、写想法，提出至少2~3个问题。研究生课程的课前环节，已经能够基本完成传统课堂讲授的大部分理论内容的输入。教师要求学生对他人的逻辑层次作进一步探究、对阅读的文献进行深入查证、思考、判断甚至质疑。课前输入的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设计思路，为课内教学提供认知基础。

2. 以问题为导向的课堂内化

在课堂内化环节，以案例法教学为例，教师将班级分为两人一组，就如何将案例法引入口译课堂展开讨论。姚斌和任文的论文从口译的忠实（诚）观着手，通过五个情景案例的讨论分析，引导学生从不同层面关注口译忠实（观）（20-25）。教师引导学生思考：除了作者的切入点，是否还可从其他视角开展课程研究？小组课堂讨论结果列举部分如下：

小组A认为可以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课后问卷调查及师生半结构式访谈，对课程教学效果进行验证。开展口译课堂的行动研究，聚焦实施案例教学的实验班级与未实施案例教学的对照班级教学效果的对比。

小组B对本次的案例教学提出质疑：该课堂只有案例讨论，缺乏情景的真实/模拟体验。建议通过归纳分类的场景模拟让学生亲身体验口译情境，增加多模态口译案例，实境考查学生的口译策略。

小组C在小组B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提出“案例法有助于口译课堂的忠实（诚）度教学”的假设，通过实验班级和对照班级的调查数据比对，发现实际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选取的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只适用特殊情境等，最后对该实验进行完善。

可以发现：小组A将量化和质性方法应用到课堂实证研究，小组B注重情境体验的建构和归纳总结，小组C将演绎法运用到证实/证伪的研究。这无疑是对“以问题为导向”教学策略的最好检验。

讨论结束后，以小组为单位陈述讨论结果，教师有针对性地点评并作出补充：关于教学的研究应包括课程目标、课程设计，无论是开展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最后都要对教学效果进行验证，检验其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发现了哪些问题，提出了什么建议，这样才构成完整的研究过程。经历了这样一轮从自我反思到小组讨论再到教师引导的过程，学生对案例法是什么、怎么用，有了科学的认知。教师还对案例法的使用原则进行了介绍，包括案例的多证据来源，研究资源的多样性，资料技术的多样性，研究案例的选择性和案例呈现的完整

性等,引导学生将眼光从翻译课堂拓展到其他翻译研究领域。从一门课、一种译本、一项练习、一个词语到一位译者,都可以成为案例分析的对象;课堂教学、文本分析、法律翻译、师资研究、翻译的职业化发展,都可以进入案例研究的设计。

本次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课后巩固的任务就是选定一个案例,运用学过的研究方法进行设计,将研究设计形成文本,以一对一交流的方式向教师汇报。

有学生在期末访谈时,对这次课的印象依然十分深刻,她这样评价:

感觉自己的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问卷调查、观察研究的学习让我关注到了翻译课堂、翻译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文献计量法让我把目光聚焦在文献的搜索和利用技术工具进行统计分析,这次的案例分析从课堂走向了更多元的主题,原来一个课堂都可以有这么多的切入点啊。现在觉得翻译根本不是没什么好研究的,而是可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二) 基于实践的学习策略:“做中学”

如果说教学策略解决了“发现问题”的难题,那么学习策略则是针对“解决问题”打下坚实基础。翻译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体现在不仅能发现问题,还能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从“发现”到“解决”并非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做中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做中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吴青39)。

在翻译研究方法论的课程中,“做中学”贯穿了课程实施的三步骤:阅读文献、知晓方法;研习方法、熟谙应用;选对方法、实施写作。

1. 任务设计

学生通过阅读推荐著作(以*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为核心),了解一种研究方法的定义、来源、应用范围及优缺点,从理性上认知方法,针对研究方法的特性进行任务设计。

譬如在“访谈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课堂上,为了检验学生“阅读文献、知晓方法”的成果,教师特别安排了任务设计——两人一组的模拟访谈,限时十分钟。学生可以针对感兴趣的主题展开访谈,要求:提问有逻辑连贯性,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事实上,笔者观察发现多数小组未在既定时间内完成访谈任务。

吴青认为,在翻译理论课程中实施“做中学”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任务完成后教师对学生书面或口头汇报的反馈”(39)。这就意味着教师在扮演课堂推动者时,如何引导学生思考任务设计的成败十分关键。模拟访谈结束后教师从访谈者和受访者两个层面引导学生一步步发现如何进一步提高访谈的质量。譬如作为访谈者,首先要规划好访谈时间,在既

定时间内尽可能信息挖掘最大化。教师以自己访谈功能语言学派代表人物诺德(Christiane Nord)的亲身经历,说明时间的把握是访谈的重要技巧之一。访谈者要善于“追问”,同时注意提问的方式方法。在个人分享中,依据“最近发展区”的支架指导原则教师一步步引导学生思考自己访谈未完成的制约因素,如访谈出现了较长的沉默,在访谈出现偏离原主题时访谈者未能及时回归等,受访者的心理期待、“暗示”、即兴发挥等突发事件等都对访谈节奏的把握提出了挑战。

对上述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后,学生做出如下访谈法的应用总结:适当访前“热身”、必要沟通、系统准备访谈提纲、明确访谈目标、注意聆听、适时打断、把握节奏等是访谈任务达成的关键。

2. 熟谙应用

这一步骤具体来说,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阅读应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中外学术论文,分析其中的方法应用,通过概述论文、列举提纲、分析思路等途径,从感性上熟悉该方法的具体应用。

在访谈教学课堂上,为了拓展学生研究的思路教师从中外期刊上的访谈论文出发,旁征博引,指导学生学会观察他人访谈中问题设计的逻辑思路。譬如,学生在对魏泓访谈美国著名汉学家杜润德教授的论文内容(94-101)进行概述后,用Xmind思维导图的形式对作者如何从《史记》的翻译到《左传》的翻译,到中国典籍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以及中西方在中国典籍研究上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在内容概述和思路梳理之后,可以看出访谈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逻辑清晰、主题明确,在“一环扣一环”的巧妙衔接中深入挖掘信息,达成了成功的访谈。

教师进一步梳理了当前翻译研究中卓有成就的研究学者,分析他们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以及在前沿领域研究做出的贡献。同一位受访者,主题设计不同,访谈可以从多视角、多层面展开;同一个主题,访谈人物不同,落脚点和感悟点自有差异。随着翻译信息化、职业化的推进,除了传统的访谈对象和访谈主题,对翻译工具、翻译技术、翻译行业、译员培训等领域领军人物的访谈也随着教师的引导不断跳入学生的视野。

3.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做中学”的最后一步是掷地有声的实施:学生结合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内容或课题,尝试应用这种研究方法,提出未来可行的写作计划书。“做中学”的宗旨是在方法实操中激活头脑中已有的理论知识,对理论输入中的已有问题 and 实践操作中出现的的新问题重新认知、深入分析、加以思考、归纳总结,从而获取新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目标。在翻译研究方法论的教学实施中,课堂的结束仅仅是“做”的开始。学生需要在本学期的研究方法中选择一种或几种,应用到自己的课程论文写作之中,与教师进行一对一沟通协作计划,在课程结束后提交完整的课程论文。

本课程在实施中践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原则。课堂上，“愤”与“悱”源自学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思考，而“启”与“发”正体现了教师适时的介入与引导。“做中学”，极大地考验了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和研究视野。教师作为课堂的推动者，需要敏锐地发现学生在任务设计中的问题，点透其中的门道，举一反三式拓展，让学生真正做到学中有“做”，“做”中有学。“做中学”，也对学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通过“做”，学生很快就意识到方法实施中的问题，在接受教师的正面点评后，更容易激发成就感和对知识的渴求，从而增强学习的自我效能。

五、翻译方法论课程效果

从课程设置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看，该课程旨在通过中英文论文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国内外行之有效的翻译研究方法，让学生接受深入系统的研究方法学术训练，从而提高学生的学科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培养批判性思辨的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笔者以课程目标为核心，设置了自我评估问卷调查表，针对课程目标的五个评价指标进行了1~5分的自我评估，其中1分为最低，5分为最高，问卷于学期论文提交前完成。从学生的自我评估来看，该课程较好地达成了学期初设置的目标。学生对批判性思辨能力、问题意识、学科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的评分均高于平均值3分，说明经过一个学期深入系统的研究方法学术训练，学生普遍培养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了设计并开展科学研究的方法，对规范的学术话语有了深入的了解，这将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理论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的评分更是达到4分以上，可以看出方法论教学的显著成果。当然，批判性思辨能力的培养、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的不断增强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考虑到该课程的样本数量有限，问卷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笔者对学生和教师分别开展了半结构性访谈。

从对学生的半结构性访谈来看，考虑到该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翻译学博士和部分翻译硕士，为小班教学模式（9人），笔者在期末以课程目标为核心设计了半结构性访谈提纲，对参加课程的全部九名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提纲主要涉及选课初衷、当前对方法论的掌握情况、未来研究目标、课程满意度等。笔者发现，尽管学生的选课初衷不尽相同，但在期末无一例外地表示收获很大。学生坦言：通过案例研讨、小组讨论、课堂陈述等活动培养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论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探究国内外论文中方法论的演绎、写作规范的分析逐渐掌握了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对翻译学研究的领域和未来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下是学生在访谈中的评价：

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是两条腿，两条腿都不能缺。之前上过翻译概论知道一点翻译理论、翻译流派，但是方法论这块是缺着的，一锅粥。现在一学期下来，整个就清楚了，知道什么方法、用在哪儿、怎么用，有些可能以前也见过别人论文写了，但是太零散，轮到自己操作就还是无从下手。现在就是你知道有这些方法是怎么回事，自己写的时候就知道说从这里选择合适的方法去用，就更规范更系统了。

受访学生均表示会将方法论应用到自己的课程论文中，部分下学期要去国外交流的学生（5人）坦言会在交流院校中继续选修相关方法论课程，从不同层面来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

从对教师的深度访谈来看，教师在接受访谈时曾表示：本学期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完成了七种方法的理论教学和实际操作，通过三本理论著作的导读提高学生对翻译学科和翻译理论的系统认知，通过国内外期刊的分析与思考引导学生以问题为导向，在对比观察、质疑反思、归纳综合与模仿创新中，树立科学、规范地做研究的意识，并将学到的方法真正落实到自己的科研之中。课程论文虽小，却是学生初涉科研领域的第一步，夯实这一步的基础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生除了在方法和认识上的收获以外，最大的成效莫过于他们的期末课程论文。从教师提供的学生课程论文完成情况可以看出：九篇课程论文的研究主题多样，涉及文学翻译、媒介翻译、翻译教学，以及译者能力研究等领域；论证方法各有特色，涉及计量法、语料库研究、问卷调查、观察法、焦点小组及访谈、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不少论文注重将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以下是授课教师给出的综合评语：

很欣慰，大家的课程论文从选题、研究方法的应用到论证过程中的条分缕析和引经据典，以及学术规范都超过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每一篇论文略加修改后都可以去投稿发表。有两篇论文比我平时审稿的C刊论文都好。

六、结语

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元化的课程设计，以实践为原则的课程实施，通力贯彻以问题导向和“做中学”的教学策略，向我们展示了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授人以渔”的魅力。但是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深度访谈，笔者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方法论课程的教学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仍可以探索更多有效的思维训练方法。正如教师深度访谈中所提及的，翻译研究必须要有方法论的支撑才能走得远，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研究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研究、怎样科学地开展研究，这就说明思辨能力是欠缺的，

课程的开设存在很大的迫切性、必要性和艰巨性。本学期的方法论训练信息量庞大，很多学生坦言，这一门课程的阅读量比过去一年都多。虽然训练量不少，但是阅读思维训练中“笔记不少”“落笔不够”的问题不在少数。课上定期要求学生写一些总结性陈述，可以是一篇期刊论文或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全文总结，也可以是对他人研究方法的简要归纳，这样既训练了学生的判断能力、反思能力和总结能力，也可以督促学生通过“勤动笔”培养布局谋篇的能力。

其次，课程在实施中遵循了建构主义理念，贯彻了从实践出发的原则，将“做”中学贯穿始终，但是迫于学时限制，一些方法的实践还不够细致，往往尚未“尽兴”就不得不开始下一个方法的教学。“不过瘾”，是笔者听到的最多的评价。因此是否可以在第三次课结束前每人选定研究主题，根据主题“匹配”后续研究方法，每周跟进汇报，一则通过具体的方法论操作可以将自己的想法真正落实下去，让自己真正“卷进去”，才能“过把瘾”；二则每周的汇报是压力也是动力，到了期末成果也就水到渠成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乃研究之器，因此“年轻学者在从事翻译研究工作之前接受系统的研究方法的训练与指导，掌握翻译学研究工作的一般程序、操作技术与研究设计的方法，无疑会有助于他们的成长，造出研究成果”（曹佩升 88）。笔者也在此呼吁，建议所有的翻译研究生培养计划中都应开设翻译研究方法论的课程，帮助广大学子夯实方法基础，引导他们走上翻译研究的道路。

注释 [Note]

- [1] 教学参考著作作为以下九本: Claudia V. Angelelli and Brian James Baer,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Routledge, 2015; Jemina Napier and Raquel de Pedro Ricoy, editors,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Special issue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Research*. vol. 9, no. 1. Derived from a panel from the 2016 EST Congress in Aarhus, 2017; Jan Engberg Łucja Biel, et al., editors, *Research Methods in Leg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rossing Methodological Boundaries*. Routledge. Derived from a panel from the 2016 EST Congress in Aarhus, 2019; Lucile Davier, et al., editors, *Methods in News Translation*. Special issue of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19, no. 2, Derived from a panel from the 2016 EST Congress in Aarhus, 2018; Mellinger Christopher and Thomas A. Hans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Routledge, 2016; 穆雷:《翻译研究方法概论》。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Routledge, 1998; Gabriela Saldanha and Sharon O'Brie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t. Jerome, 2013; 仲伟合等:《口译研究方法论》。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引用文献 [Work Cited]

- Cao, Peisheng. "Comments o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5, 2016, pp. 84-88. [曹佩升:《翻译学研究需要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指导——〈翻译学研究方法论〉述评》, 载《上海翻译》2016年第5期, 第84-88页。]
- Chen, Yanho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Methods in Master Thesis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in Chinese Mainland*. Thesis. Fudan University, 2010. [陈艳红:《我国翻译方向硕士毕业论文研究方法调查及其教学启

- 示》。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
- Feng, Quangong, and Jun Xu. "How Young Scholars Should Conduct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Xu Ju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7, 2018, pp. 104-11. [冯全功、许钧:《青年学者如何做翻译研究——许钧教授访谈录》,载《中国外语》2018年第7期,第104-11页。]
- He, Gangqia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2, 2006, pp. 39-42. [何刚强:《译学无疆,译才不器——翻译(院)系培养人才应有长远的眼光》,载《上海翻译》2006年第2期,第39-42页。]
- He, Ruiqing. "A Reflection on Curriculum Design of MTI (Translator Section): Compared with Curriculum Design of MA in Translation in Foreign and Taiwan's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12, 2011, pp. 37-41. [何瑞清:《对翻译硕士(MTI)笔译方向课程设置的思考——以国外和台湾笔译硕士课程为参照》,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第37-41页。]
- Huang, Xinyan. "Characte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Idea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of Nanjing University." *Academic Degrees & Graduate Education*, no. 2, 2015, pp. 61-65. [黄新炎:《文字·文学·文化·思想——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访谈录》,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年第2期,第61-65页。]
- Ke, Ping, and Chuanyun Bao. "Programs Currently Offered and Research Projects Currently Conducted in Major Tertiary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02, pp. 59-65. [柯平、鲍川运:《世界各地高校的口笔译专业与翻译研究机构(上)》,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59-65页。]
- Lan, Hongjun. "Basic Concepts of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and Patter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5, 2015, pp. 72-77. [蓝红军:《翻译学方法论基本概念:范式与模式》,载《外语研究》2015年第5期,第72-77页。]
- . "Identifying Problems: Reflections on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3, 2018, pp. 1-6. [蓝红军:《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载《上海翻译》2018年第3期,第1-6页。]
- . *On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9. [蓝红军:《译学方法论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 Li, Huihong.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2010. [李惠红:《翻译学方法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
- Liao, Qiyi.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UK*. Hubei Education, 2001. [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Pedagogy in MTI."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1, pp. 25-28. [廖七一:《MTI中的翻译理论教学》,载《中国翻译》2011年第3期,第25-28页。]
- Mu, Lei.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3, 2004, pp. 43-46. [穆雷:《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3期,第43-46页。]
- . "Conceptualizing a System of Translation Pedagog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08, pp. 41-44. [穆雷:《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1期,第41-44页。]
- .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1. [穆雷:《翻译研究方法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 Tao, Youlan. "Towards a Constructive Model in Training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 Case Study of MTI Education Program in China." *Babel*, vol. 58, 2012, pp. 289-308.
- Tao, Youlan, and Xiao Qiang. "On a Comprehensive Mode in Reading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5, pp. 55-58. [陶友兰、强晓:《本科翻译专业阅读教学综合模式探讨》,载《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第55-58页。]
- Wei, Hong. "On the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 Interview with the American Sinologist Stephen W. Durrant."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42, no. 3, 2019, pp. 94-101. [魏泓:《〈左传〉〈史记〉等中国典籍在西方的翻译与研究——美国著名汉学家杜润德教授访谈录》,载《外国语》2019年第42卷第3期,

第 94-101 页。]

Wen, Jun. "A Survey into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3, 2012, pp. 74-80. [文军:《翻译学导论课程:调查分析与设置》,载《外语界》2012年第3期,第74-80页。]

Wu, Qing. "An Action Research on an Undergraduate-level Theoretical Course in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 2012, pp. 37-43. [吴青:《本科翻译专业课堂中的理论训练——一门外语专业课的行动研究个案报告》,载《中国翻译》2012年第5期,第37-43页。]

Yang, Xiaorong.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3, 1998, pp. 31-33. [杨晓荣:《港台的翻译教学》,载《上海科技翻译》1998年第3期,第31-33页]

Yao, Bin, and Wen Ren. "Applying the Case Method to the Teaching of Interpreting: The Example of Faithfulness / Loyalty in Interpreting Practic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Quarterly)*, vol. 11, no. 2, 2018, pp. 20-25. [姚斌、任文:《将案例法引入口译课堂——以“口译忠实(诚)观”教学为例》,载《中国外语教育(季刊)》2018年第2期,第20-25页。]

Zhu, Yishu, and Jun Xu. "Scientific Research, Problematic Consciousness and Research Method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no. 3, 2014, pp. 3-7. [祝一舒、许钧:《科学研究、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许钧教授访谈录》,载《山东外语教学》2014年第3期,第3-7页。]

◇责任编辑:马纳克

沙博理小说翻译中女性话语的创造性写作

◎ 任东升 段杨杨

内容提要: 沙博理的标本翻译中含有不少女性主人公的作品。通过文本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在他对小说女性话语的翻译中存在不同程度与种类的创造性写作,具体表现在译者不仅能如原作者创作般用毫无译痕的母语写作,还善用措辞及艺术手法对原作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性发挥与再造,且兼顾原语风格与读者接受,值得其他致力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借鉴。

关键词: 小说翻译 女性话语 沙博理 创造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105-09

基金项目: 中国翻译研究院委托课题“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2017TSB1)

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Title: Sidney Shapiro's Creative Writ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Female Discourse in Fictions

Abstract: Sidney Shapiro's translation behavior can be summarized as "Specimen Translation," in which there are some fictions with women being heroines. By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hapiro's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exist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degrees of creative writing in Shapiro's translation of female discourse in novels,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act that his translation not only rewrites the original in fluent and natural language as original authors do, but also adds value to the original by creative use of words and artistic techniques, as well as reproduces the original style and meets readers' accep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so it is worth learning for other translators who are committed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out.

Keywords: fictional translation, female discourse, Sidney Shapiro, creative writing

Author: Dongsheng Ren,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China; Yangyang D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China.

小说里的女性话语指文本中涉及女性的所有用语，也就是围绕女性主人公形象展现、性格发展、命运推进等使用的所有话语。宽泛而言，“话”是作者基于创作意图借助环境描写、人物形象、内心刻画等语篇手段，对女性人物的间接言说；狭义而言，“语”是具体故事情节中女性人物自己的直接言说。两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小说中的“女性话语”。沙博理（Sidney Shapiro）作为国家翻译实践、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践行者，五十余载辛勤翻译，产出千万字的小说、诗词、散文、剧本英译，被誉为“翻译英雄”（Ren, “Hero of Translation” 18）。他的翻译行为可归纳为“标本式翻译”，即翻译选材皆是符合国家外宣目的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他所翻译的小说共计 111 部，其中长篇 14 部、中篇 10 部、短篇 77 部。这些作品中不乏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小说，其中有写受封建社会男性、礼教等黑暗现实压迫的底层女性，如《小巫》、《月牙儿》、《贞女》、《小城三月》、《夏夜梦》；有展现“五四”后自我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如《春桃》、《二月》；有写解放时期农村女性革命与恋爱故事的《星》，女性劳动叙事的《孟祥英翻身》、《传家宝》；还有歌颂新中国妇女优秀精神品质的，如《卖酒女》等。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个性鲜明，代表了中国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女性，且作品皆具有较高的艺术与思想价值。如杨振声的《贞女》通过描写一位少女嫁给象征新郎的木头牌位的故事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性，起到“‘改革社会的器械’的战斗作用”，为当时的新文学运动“开拓道路”（张华 247-54）。老舍的《月牙儿》通过描写旧中国母女两代人为生活所迫、相继沦为暗娼的故事，强烈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柔石的《二月》中的女主人公陶岚蔑视旧思想，是“五四以后某些具有叛逆性格的青年女性的一种典型”（陈骏涛等 65）。本文以这三部现代小说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中书写女性情态、性格、命运演变的独特话语，通过文本对比研究，试图发现译者翻译的独特之处。

一、沙译本中的创造性写作

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首先从语言层面讲，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系统的转换，其词类、句法构造、文法与表达习惯、修辞格律等皆有所差异，很多情况下没有共享的、现成的对应结构和表达方式，而译者又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能不拘泥于形式而着眼于目的或效果进行灵活变通。再从文学角度讲，文本意义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译者首先作为读者，在理解和阐释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弃自我，其自身的文化烙印、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都会影响译者的创造性理解并无意识地表征于译文中，相当于译者的“译内隐性显形”（任东升、王芳，《译者显形与译本呈现》137）；最后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讲，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翻译背后的赞助人、意识形态、目的语的政治，翻译所面对的读者期待、读者认知、目的语诗学等都会盘旋在译者周围，译者需要适应整个生态系统并与多个主体对话、协商，为保持系统平衡而采取创造性的翻译策略。

本文中的创造性写作不仅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因语言、文化、交际、政治、意识形态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制约而做出的必要的妥协与灵活变通，还有译者主观体验原作人物角色、深入分析原作精神主旨后主动进行的创造性写作。它带有“写”的性质，“写”一方面指译文流畅优美、毫无译痕，犹如原作者创作般；另一方面指译者“写”（创造）出有别于原文内容的译文，这种创造不同于无中生有，而是在忠于原作整体精神的基础上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及部分内容、偏离原文程度较小的创造性再写或再创，是对作品人物及主旨思想的再现及表现。它体现出译者较高的文学与艺术修养，不仅译笔优美，还善于运用艺术手法对原作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性发挥与再造，比原作更好地传达原作描写对象及精神内涵，对原作有增值功能。

同时也可见，它与“译创”（transcreative）在创造度上有所不同，后者是translation（翻译）和creation（创造）的结合，常用于市场营销和广告行业，需要高度的创造性甚至是对原作的改编（Vieira 7），偏离原文较大，有时甚至无原文可依。

而沙博理本人也认同文学翻译是一种可取的创造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的观点（310），这一点在他所翻译的作品中皆有体现。沙博理为妥协于语言、文化、政治、赞助人等客观原因所作的创造性写作笔者已有所研究，这在他所翻译的作品中皆有体现。如对于政治讽刺诗的翻译，用“拟译的翻译方式‘创作’一首新的英语诗歌”（任东升、王芳，《沙博理政治讽刺诗》5）；为避免弱化红色小说的“崇高”叙事目标，对原作过度的血腥暴力描写“去腥化”处理，达到“雅化”原文的效果（任东升、连玉乐 55）；为“净化”英雄人物形象而缩减、改编革命战士的粗俗语言（任东升，《“萃译”之辩》18），等等。而对译者主动进行的创造性写作研究还不足，本文将把此部分纳入研究，以他所翻译的小说中的女性话语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沙译本中的创造性写作。

本文选取的三部小说皆具有较高的艺术与思想价值。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内心情感丰富而微妙，如“五四”新女性陶岚的热情奔放、《月牙儿》中少女的美好悸动，在作品的女性言语描写及极具诗意的景物描写中皆可寻；其肖像描写细致生动，活现女性神态；其隐晦深刻的思想主旨“触及了时代本质”（范亦毫 46）。这些均在沙译本的创造性写作中得到重现与再创造。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

（一）精选措辞，角色表现

文学创作讲究炼字，古人作诗常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翻译同样如此，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只有经过一番推敲与斟酌才有可能产生佳译。三位文学大师笔下的女性人物内心情感丰富，其抒情方式也不一而足，或“言”为心声，或借“景”抒情。我们不妨从他们对女性人物的言语描写入手，窥视沙译文对词语的创造性选择：

例1原文:(可惜我当时不知道就是萧先生,假如知道,我一定会冒昧地叫他起来……萧先生……)我们失去了一个聚集的机会,以后我们可以尽量谈天了。(柔石 18)

译文: We missed a chance to meet before. In the future we must chat together often. (Jou 10)

例2原文:你应告诉我你底思想[……]你也应该告诉我你底将来,你底家乡和家庭等。(柔石 67)

译文: You must tell me your ideas. . . . You must also tell me of your future plans, and about your native village and your family. (Jou 31)

原文是《二月》中陶岚对心上人萧的言语描写。例1中陶虽三年前曾在外地偶遇萧,但二人不曾相识,如今萧来陶镇里教书并来她家(即校长家)拜访,陶对他一见钟情。原文情态动词“可以”表示一种“建议或提示”(朱冠明 132),因为如今萧在此地定居,客观条件允许,可以常来聚。而译文并未以表建议或提示的can译之,而是选用must,这样一来,情态量值升高(Halliday 362),说话人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看似违背原文,实则更符合人物心理情感:此时的陶内心相识恨晚并期待以后能频繁来往,高情态值更能表达她内心渴望之热切、情感之炙热。例2来自陶给萧的一封表白信,渴望进一步了解他。同样,原文中的“应该”,译文并未直译为should,而是再次选用must,凸显陶渴望了解心上人的强烈愿望。这一系列连续使用的must似乎是陶内心无法压抑的爱浪汹涌袭向萧,又似乎是“用爱丝来绕住他,使他几乎不能动弹”,将一位“感情奔放”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柔石 67)。

可以看到,译者并非是由于语言、文化、社会等因素的限制被迫选择改写,而是出于主观目的——更好地表现人物情感及形象下的主动选择,虽逆于原文形式及内容,但忠于作者整体表现意图,是有价值的创造性写作。深入思考此例,不难发现,若非译者深入人物角色进行表演、体验其内心感受,很难创造出如此佳译。文学创作是作家进入其所塑造的人物角色中进行表演的过程,译者也是创作者,同样也需要表演,只不过“是有着特定剧本”的,即他需要先考虑作者的创作目的,再深入其所创作的人物角色,想象他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最后将其用目的语转述出来(穆雷 131)。转述并非是将原作丝毫不差的照搬过来进行字面上的再现,而是要用恰当的译语对作品人物进行“表现”,真正为其代言。

(二) 译语写作, 原作再生

文学翻译最核心的问题是文学性或审美效果的传达。原作是一部文学作品,译作也应是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心理的不同,汉语表达较曲折委婉,句式呈“流散型”,重语感而疏语法,句读简短,组合自由,形散神聚,是综合型的直感语言;而英语表

达则直白坦率，句式呈“聚集型”，形态特征明显，主次分明，结构齐整，是分析型的理性语言。如此相异的语言表达习惯使中外读者产生不同的阅读审美心理与接受期待。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关照到目的语读者的审美和阅读期待，不拘泥于与原作相同的字面意思、表达方式和语篇结构，而是追求“神似”与文学意境的传达，采取灵活变通与取舍的策略，使译入语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美的体验。且看下例：

原文：(这时他却睁大两眼，一瞬不瞬地看住她。)(1)可是他却看不出她底别的，(2)只从她底脸上看出更美来了：(3)柔白的脸孔，(4)这时两颊起了红色，(5)润腻的，(6)光洁的。(7)她低头，(8)只动着两眼，(9)她底眼毛很长，(10)同时在她深黑的眼珠底四周衬的非常之美，(萧仔细的觉察出——他底心胸也起伏起来)。(柔石 42)

译文：(His eyes widened and he stared at her.) ①He could see only that the blush on the cheeks of her beautiful fair face heightened the tender glistening texture of her fine skin. ②Only her black eyes moved; ③the long lashes framing them were lovely. (Hsiao found that his breathing had become more rapid.) (Jou 20)^[1]

此段是对陶岚肖像的细致描写，生动刻画出她被萧问住时羞涩的神态。原文句(1)属于汉语小说典型的迂回表达，译文并未对此做出转换，可能是考虑到英语世界读者偏好开门见山的描述。如此一来，译文不仅满足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也由“看”这个动作直接过渡到具体看到的内容，与前文承接更加紧密；原文(2)—(6)句对陶脸颊的描写随萧的观察自然铺开，原文娓娓道来，句式松散，共5句零句(赵红军 134)。而译文仅用1句英语主从复合句(句①)来转换：句(2)为主干，句(4)化为从句的名词性主语，句(3)(5)(6)分别以4个简洁传神的形容词(见注释)巧妙恰当地配置于从句，避免了逐字直译可能造成的译文臃肿及原作韵味的丢失，实现了原文“语义信息与美感因素的整体吸收与再造”(姜秋霞、权晓辉 27)。原文句(7)属于无大必要的外部动作描写，译文并未译出此句，如此使陶岚的肖像描写从脸颊自然过渡到眼睛、睫毛，内容上前后更加连贯，也满足读者阅读期待；原文(9)(10)句为两句，而译文呈现为一句(句③)，如此一来，句③与句②并列，形式上显得对称、整齐。纵观整个译文，在要义未失的前提下，通过句式调整、零句删减与合并，不仅忠实传达原文韵味；内容上还承接紧密、前后连贯；形式上也紧凑流畅、均整对称。

我们不妨看看沙译文的回译：他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只见她美丽白皙的脸颊上那抹红晕将她细腻的皮肤衬得更加柔嫩、光润。只有她的黑眸在闪动；上下睫毛又长又美。萧感到自己呼吸加速。如此读来，沙译文似乎比原文还要优美，这也说明“好的文学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

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许钧 272）。

（三）修辞妙用，增值原作

创造性写作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对原作的增值功能，即创造出优胜且益于原作的译文，强调“优胜且益于”是因为它并非指译者可以无所顾忌地率性发挥而造成对原作的歪曲或毁坏，如有些汉译者为“美化”原作而一味使用四字词语，破坏了原作风格。对于批判性文学作品，其语言贵在含蓄，常常言在此而意在彼，隐晦而深刻。译者如能根据作品特点迂回曲折地再创原作深意，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如小说《月牙儿》、《贞女》沙译本中通过妙用修辞手法，如象征、双关及明喻创造艺术意象深刻揭露封建社会男权或吃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我们先看象征、双关的创造性使用：

原文：[新娘]抬头看见面前的几丛芍药，花已谢了一半，那些未落的花瓣儿在花萼上翩翩起舞，也大有不禁风吹之势。（杨振声 67）

译文：She gazed at the peonies. They had shed half their petals. Those that remained clung precariously to their calyxes, a prey to any passing breeze. (Yang 81)

《贞女》的女主人公新娘午睡后无聊到花园散步，此句是对她观赏芍药花的行为描写。原文刻画出花瓣儿“翩翩起舞”的美好姿态，译文却未完全求真地译为“fluttering and flicking in the wind”，而是以“clung precariously to their calyxes”译之，突显的是花瓣危险地附着在花萼上摇摇欲坠的姿态。笔者认为译文此处颇具创造性：下文中女主人公选择自杀以了结这条被封建礼教压抑束缚的孤单年轻的生命，而译文此处花瓣摇摇欲坠的姿态正好象征着女主人公此时如花般命悬一线、危险的生命状态。再看后半句中“不禁风吹”的翻译，译文用“prey”一词，该词可喻指一个人成为某事物的牺牲品（陆谷孙 1551），前后文联系不难体会译文一语双关，花瓣不禁风吹（被风所侵害）实则成为艺术化的意象，暗指新娘这个十七八岁花样少女的生命就这样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猎物），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性”，隐晦深刻，耐人寻味。

除象征、双关外，沙译文对原文的增值性还体现在明喻的创造，以《月牙儿》对女主人公的行为描写为例：

原文：我打扮得简直不像个人，这才招的动那些不文明的人。（老舍 238）

译文：Only by painting my face like a clown could I attract the uneducated customers. (Lao 86)

《月牙儿》的女主人公被逼为娼以求生存。“我”的打扮“不像个人”，译文并未直译，而是用明喻手法将“我”比作“clown”（小丑），小丑并非只是相貌丑得不像个人，更有“取悦于”观众的目的。因此相比原作，译文“小丑”这一物象更能引起读者深思：作为暗娼的“我”不得不像小丑般取悦于男客人，一针见血地点明在“失去了男人就意味着失去了社会”的封建男权社会下女性身份地位之卑微（孙绍先 64）。

可见，沙译文的创造性写作并非率性而为，而是在深入分析原作人物命运及主旨思想的基础上，巧用艺术手法实现原作精神内涵的再创，体现了对原作的增值性。

（四）适当增补，一石二鸟

上文中提到，文学语言，尤其是批判性作品，贵在含蓄，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婉曲含蓄是文学作品美的基本形态之一。文学翻译应忠实再现原作此种风格，但译作又是面对读者的，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如果译文语言过于含蓄隐晦而导致读者无法解读作者留下的“空白”来完成意义建构，就没有达到审美的目的。因而，对于此类语言的翻译，译文既不能丢失原作含蓄之美，又要“务实”于读者，即拿捏好“译出来”的“度”，这是风格审美再现中很微妙的一部分，我们看沙博理是如何做到的，且举例来说明：

原文：她有饭吃，我有自由；她没自由，我没饭吃，我俩都是女人。（老舍 228）

译文：She had food, I had freedom. She had no freedom, I had nothing to eat. We both were women. Both were frustrated. (Lao 86)

原文是《月牙儿》中女主人公的独白，但由于此文是作者以女性第一人称自叙，所以此话语也是作者的话语。文中身为情妇的“我”将自己和正妻“她”对比：她虽为人妻有人养，但丈夫朝三暮四，她却仍得恪守封建社会“从一而终”男权思想的羁绊、失去自由；而“我”穷，在当时的社会，精明的男人是不会娶我的，更无女子独立谋生之路，要吃饭“我”只能卖身。作者借我俩的生存状态要表现的是封建男权社会下整个妇女阶层艰难的命运。原文“我俩都是女人”点到为止，其言外之意“女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艰难”由读者自行揣摩。而西方读者不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女子的生存状态，他们很难理解作者的弦外之音。沙译文是如何呈现的呢，我们发现译文增补了“Both were frustrated”——“我俩都是艰难的”，由此形成“我俩都是女人”（A）——“我俩都是艰难的”（B）——“妇女的命运就是如此艰难”（C）线性三段论，目的语读者根据A、B前提自然可推理出C结论，从而领会作者的交际意图。同时我们发现，译文的增补并非完全明示，而是适度显化，仍能像原作般给予目的语读者“曲折地”品味原作深意的机会，增补得恰到好处，一并照顾到了原作隐之美与译语读者的审美体验，可谓一石二鸟。

译者的创造性写作是对原作风格与目的语读者审美感受综合权衡后的选择,正如沙博理本人所言,“翻译像走钢丝,倒向这边不行,倒向那边也不行。能够表达风格,而且外国人可以接受,那就可以了”(洪捷63)。

通过分析沙译本中对小说女性话语的创造性写作,我们发现译者不仅能如原作者创作般用母语写作,还善于运用艺术手法对原作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性发挥与再造,并精选措辞,艺术性地表现作品人物形象及主旨思想,且兼顾原语风格与读者接受,体现出译者高超的翻译艺术,值得其他致力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借鉴。

注释 [Note]

[1] 译文中“fair”指肤色之白;“tender”指肤质之柔;“glistening”指肤之润、光洁;“fine”指肤之细腻。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Juntao, et al. "Revaluation on *Er Yue*." *Literary Review*, no. 6, 1978, pp. 58-68. [陈骏涛等:《关于〈二月〉的再评价》,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第58-68页。]
- Fan, Yihao. "On *Yue Ya Er* and Its Position in Lao Sheh's Writing History." *Literary Review*, no. 4, 1984, pp. 45-53. [范亦毫:《论〈月牙儿〉及其在老舍创作史中的地位》,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第45-53页。]
-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Edward Arnold, 1994.
- Hong, Jie. "Fifty Years of Painstaking Efforts to Translate China: An Interview on Translation Master Sidney Shapiro."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12, pp. 62-64. [洪捷:《五十年心血译中国:翻译大家沙博理先生访谈录》,载《中国翻译》2012年第4期,第62-64页。]
- Jiang, Qiuxia, and Xiaohui Qua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mage-schemata."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00, pp. 26-30. [姜秋霞、权晓辉:《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载《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第26-30页。]
- Jou, Shih. "Threshold of Spring." Translated by Sidney Shapiro. *Chinese Literature*, no. 6, 1963, pp. 3-42.
- Lao, Sheh. *Ying Hai Ji*. Bei Xin Bookstore, 1935. [老舍:《樱海集》。北京:北新书局,1935。]
- . "Crescent Moon." Translated by Sidney Shapiro. *Chinese Literature*, no. 4, 1957, pp. 66-88.
- Lu, Gusun, editor.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rd Edition).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7. [陆谷孙编:《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Mu, Lei. *Gender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uhan UP, 2008. [穆雷:《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Ren, Dongsheng. "Hero of Translation." *China Pictorial*, no. 11, 2014, pp. 18-19.
- . "On Extracted Translation."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no. 4, 2018, pp. 16-20. [任东升:《“萃译”之辩》,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6-20页。]
- Ren, Dongsheng, and Fang Wang. "A Probe into Shapiro's Maneuvers of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atiric Verse." *Foreig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no. 1, 2017, pp. 1-7. [任东升、王芳:《沙博理政治讽刺诗英译艺术探究》,载《外语与翻译》2017年第1期,第1-7页。]
- . "Translator's Visibility and Translation Presentation: A Case Study of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Prelude to Water Melody.'"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o. 2, 2017, pp. 137-47. [任东升、王芳:《译者显形与译本呈现——苏轼

- “明月词”三译本比较》，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年第2期，第137-47页。]
- Ren, Dongsheng, and Yule Lian.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xtracted Translation of *Red Crag* and *Bitter Herb*.” *Foreig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no. 1, 2019, pp. 53-57. [任东升、连玉乐：《〈红岩〉、〈苦菜花〉萃译比较研究》，载《外语与翻译》2019年第1期，第53-57页。]
- Rou, Shi. *Er Yue*. Shanghai Bookstore, 1929. [柔石：《二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29。]
- Shapiro, Sidney. *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New World, 1997.
- Sun, Shaoxian. *Feminist Literature*. Liaoning UP, 1987. [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 Vieira, Lucas N. “Automation Anxiety and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tudies*, 2018, pp.1-21.
- Xu, Jun. *Translation Theory*. Yilin, 2014. [许钧：《翻译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Yang, Zhensheng. “One Sided Wedding.” Translated by Sidney Shapiro. *Chinese Literature*, no. 2, 1964, pp. 80-82.
- . *Collected Works of Yang Zhensheng*. Thread-Binding Books, 2009. [杨振声：《杨振声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9。]
- Zhang, Hua.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Yang Zhensheng’s Novel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no. 1, 1982, pp. 247-56. [张华：《杨振声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历史地位》，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第247-56页。]
- Zhao, Hongjun.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Northeastern UP, 2014. [赵红军：《英语翻译基础》。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
- Zhu, Guanming. “Discourse Function of the Modal Verb Keyi.”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vol. 1, edited by Mei Fa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Beijing Branch, 2016, pp. 132-51. [朱冠明：《情态动词“可以”的话语功能》，载方梅编《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1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第132-51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

文本杂合与零翻译

◎ 王雪明 李澜新

内容提要: 零翻译概念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在争议中不断发展, 在讨论中逐渐形成相关理论表述。梳理性研究指出, 零翻译的概念内涵呈缩小趋势, 体现为“源语符号原封不动地移译”。这种总体趋向虽有合理成分, 但亦存在着对翻译复杂性的简化认识。本文从文本类型、原文杂合性和翻译方向等层面对零翻译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认为零翻译虽为原形移译, 但不能否定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仍须遵守译语的语言规范和习惯。

关键词: 零翻译 文本类型 语言规范 译者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114-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百年科幻文学翻译研究”(17YJC740091)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9

Title: Textual Hybridity and Zero-translation

Abstract: Zero-translation, since its creation, has been in constant contenti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reveals a reductionist trend i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with the narrowest theorization defining it as the transference of a semiotic sign from the source text into the target text in an intact form. This understanding, despite its rationa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gives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in terms of text type, hybridity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ranslation direction, and argues that zero-translation, being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source form,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norms and habi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nor deny the roles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Keywords: zero-translation, text type, language norm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uthor: Xueming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Lanxin L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零翻译是随着全球化语境下日益广泛的跨文化交际和语言接触而不断凸显的一种翻译现象,自邱懋如于2001年提出这一概念来,零翻译就一直在争议中不断发展。2002年贾影发表《“零翻译”还是“不可译”——试与邱懋如教授商榷》,从“不可译”的内涵剖析中反对引入“零翻译”概念(77)。2017年彭利元发表《零翻译非翻译——兼与译界同仁商榷》,与学界同仁进行商榷,意欲从学理上否定零翻译的合理性(86-91)。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零翻译’的概念指代不明,逻辑不清,在译界使用较为混乱。[……]建议慎用这一术语”(覃军 104)。然而,更多学者从语言发展的事实和翻译实践的角度肯定零翻译的合理性,并从不同理论角度对其加以认识(孙德平、赵国强 107-14;冷姿颖、贺爱军 9-12;吴建国、秦闻佳 76-81, 94;石春让、杨蕾 82-85)。随着对零翻译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和丰富的认识,李丹(以下简称“李文”)又与彭利元展开商榷,在系统梳理近20年的零翻译认识的基础上,从学理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零翻译的内涵与外延、本质属性、研究价值、翻译方法体系中的定位,深化了零翻译的研究(120-27)。常言道:真理愈辩愈明。严肃的学术争论是好事。真理和智慧的火花,都是在争论的摩擦碰撞中迸射闪光。本着学术争论的精神,笔者认为,李文将零翻译窄化为“原形移译,指将源语符号原封不动地移入译语(符)的全译方法”(126)仍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未能充分考虑翻译作为跨语际转换这一复杂活动的各种因素,因此有必要对零翻译进行进一步探讨,推动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翻译现象与方法。

一、零翻译是全球化语境下语符翻译的一种形态

诚如李文所言,零翻译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就已经出现过,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下,随着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规模扩大和日益频繁,这一现象更加得到了凸显。正如王宁所言:“不管我们欢迎与否,全球化都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上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向。”(89)在科学技术与经济等专业领域中,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趋同性已然成为主流,大量数据、图表、表达式、代码、行业术语等信息无须翻译就可以被各领域内的专业技术人员所理解。即使是在大众文化领域中,“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语言的萎缩和图像的扩张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91)。今天人们的交际联络中,语言文字不再是唯一的交际手段和工具,图像及其他符号已经大行其道,零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 and 文化的图像及符号交流方式之一也必然会在当代翻译实践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就语言符号而言,全球化助推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越来越多的英语词汇与表达不经翻译直接进入到其他语言之中,全球化时代下的翻译也相应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可以想见,语言和非语言符号零翻译的实践会越来越普遍,零翻译的规模也会因此不断扩大。这里我们认同李文“零翻译所译对象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观点,是对全球化时代翻译呈现出的新特征的准确把握。的确,经过十余年的理论探讨,零翻译的概念越来越

越窄，也越来越清晰，所指越来越明确，不再同音译、省译、直译等概念相混淆，并开始有了体系性的建构（李家春 93-96），零翻译的理论形态初步形成。然而，过于窄化的概念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无法涵盖和解释与其不相容的现象，在理论上会形成不完备的认识，在实践上会导致不当或错误的行为。我们认同零翻译是“原形移译”，这是零翻译不同其他近似概念最本质的区别，但对其“原封不动地移入译语（符）”却不能苟同，认为这一定义存在着对翻译活动的一种简化认识。我们认为，零翻译既包括原文语言符号“原封不动移入”，也包括一定程度的变动移入，而这变动的原因为丰富零翻译的理论资源有积极意义。

二、零翻译与文本杂合性

零翻译产生于应用文体的翻译实践，在符号趋同性的语境下“原封不动”这一唯一形态获得了狭窄的自洽性。在实践层面对零翻译应用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学界的研究大都着眼于零翻译在应用型文本中的运用（王甜甜、程昕 6-8；黄德先、黎志卓 110-14；张立丽 33-35，15；刘明、石春让 108-10；袁宜平 13-17）。应用翻译领域的普遍共识在固化对零翻译偏狭认识的同时，排除了其他表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零翻译可应用的文本类型。我们认为，文学翻译中零翻译的运用也是零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文学翻译中，与零翻译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文本语言的杂合性。文本的语言杂合性是指“文本除了主要的叙述语言之外，还混合使用了其他语言的成分，因而具有杂合的特征”（韩子满 23）。西方文学中语言杂合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简·爱》（*Jane Eyre*）中的人物对话就使用了一些法语词汇或短语，而《尤利西斯》（*Ulysses*）中的外语成分比例更高。中国文学夹杂其他语言成分也并非个例。韩子满指出：“从晚清开始，外语成分，主要是英语成分就开始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 [……] 后来有些文学作品，如《围城》中的外语成分更多，外语成分所属的语种也更为多样化，到了当代，夹杂外语成分的文学作品更加常见。严肃的、先锋派的文学作品中，经常用到一些英语等西方语言的词句，而且这种现象在通俗作品中也很常见。”（52）如前所述，全球化已经渗入到大众文化领域，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在我国，由于英语普及化教育，英汉语言混杂不仅出现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也开始进入到文学创作中。新世纪生活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如 80 后张悦然、笛安、苏德），相对于前辈作家（如 50 后、60 后），受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影响，在题材上热衷于城市生活的书写。他们的写作语言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互为体，中外语言的混杂是一种常态而非奇观，成为这一群体独特而鲜明的标识。尤其是近年来成功“出海”的科幻文学，本身就包含了许多通行于科学文艺领域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这些作品的外译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是否及如何保留语言杂合特征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零翻译的运用。因此，零翻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应用文体的局限，成为各个文体翻译的一个“客观”事实。相应地，对于零翻译的具体应用，也应该结合更广阔的文体范畴和文本杂合的具体形式来加

以考察。我们认为，涉及零翻译的原文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单语文本（monolingual text）。此类文本翻译中出现的零翻译是译者出于语义、语用、文体等特殊需要，将原文中某些语言文字符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让读者进入源语语言文化环境认知并理解这些语言文字的特殊内涵，导致的结果是译文具有了源语和译入语的双语杂合特征。

二是英语为主要叙述语言混用其他语言。在此类文本的翻译中，由于大多译文读者并不熟悉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单纯使用零翻译虽然可以达到再现多语原文的面貌，但却会造成读者无法理解，或者需要查阅其他参考资料才能理解的效果，最终影响阅读的流畅性，在语言混杂程度较高的时候尤其如此。在此情况下，零翻译和其他补偿方法如注释相结合是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当前英语多语文学文本的翻译中占主导地位（韩子满 41），结果是译文也具有杂合特征。

三是汉语为主要叙述语言混用其他语言。这种语言混杂性又以汉语中混杂英语或拼音文字最为多见。这种文本的翻译又以英译为主。在这种文本的英译中，零翻译实际上是原形回译，即原文中只用了一种外语，而且这种外语恰好是译入语。其结果是译文不具有杂合特征，变成了单语文本。在这种零翻译过程中，英语成分由原文叙述语言中的特殊状态回归到译文叙述语言的常态，失去了在原文中的杂合语境效果，其具体形式就须符合英语使用的基本规范。针对原文中一些具有特殊语用效果的英语混杂成分，作为翻译活动中行为主体的译者，也可以在译文中对这些成分加以变通调整，译成译入语中具有特殊功能的语体成分，从而传达与原文相同的语用效果。因此，这种情形下的零翻译就不仅仅是“原封不动”的转移。目前，零翻译在此类文本中的应用与研究还不多见，但一方面随着中文创作中汉英语言混杂程度的不断增高，另一方面随着汉译英规模的不断扩大，零翻译的应用也会相应增加，因此有必要先从理论观念上确立对零翻译的恰当认知。

三、零翻译并非只是原封不动地移译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针对上节所描述的第三种情形，即汉英混合文本在英译时使用的零翻译来深化对这一概念的微观认识，选取科幻短篇小说《开光》的英译为例来具体说明，以弥补零翻译理论传统上受限于应用文体翻译和单一翻译方向所带来的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开光》由科幻作家陈楸帆创作，曾获得 2015 年第六届科幻星云奖短篇小说金奖，同年由美国著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全球知名电子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 Magazine*）上。虽属于科幻文学，但其内容把中国当下极具现实感的 IT 行业、市场营销、网络生活等流行产业和文化生活拼贴在一起，十分贴近时代。这篇小说的语言诙谐幽默，使用了不少时下耳熟能详的科技和文化流行语。小说一个明显的语言特点就是外来语，即英语不经汉化直接出现在行文中，语符混杂程度很高，因而在英译汉时必然涉及回译式零翻译。

首先,译文中的确存在一些“原封不动移译”的例子^[1]:

(1)原文:……可他像个自动答录机又回到开始“……1月4号象限仪流星雨……”

Mission failed.

我们只好失望地悻悻离开。

译文: But like a stuck answering machine, he started again from the beginning:

“The Quadrantid meteor shower will come on January 4. . .”

Mission failed.

Disappointed, we left him.

(2)原文:大家思考了片刻,一个女孩怯怯地说:“开……开过光的……”

“Bingo!”

译文: Then, one of the girls timidly speaks up, “Something that’s been consecrated . . . um, you know, when the light has been—”

“Bingo!”

在这两个例子中,译者翻译时将原文中的“Mission failed.”和“Bingo!”直接移到了英语中,属于语篇层面的零翻译。《开光》英译文中类似于这样“原封不动”的零翻译还有很多,有力地证明了零翻译已超出应用专业领域,进入到非应用型文本中的翻译当中。

然而,哲学上说,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列宁也谈到:“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向同方向迈出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211)同理,一旦某个知识超出其所产生并且普遍适用的某个领域,进入到其他领域,就会出现适应性问题。就本文所考察的文学文本翻译,除了上述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封不动转移”外,还有一些“动”的处理,其背后有着学理上的依据。

(一) 零翻译应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

零翻译概念的中心词是“翻译”,在翻译这个前提下,翻译过程是否完成要看译文能否有效地传达至目的语读者。李文将零翻译置于移译的下级范畴(126)。而黄忠廉等在移译的定义中明确说明该方法要“照顾译语结构和表达习惯而转移原文语言单位”(72)。其中,“照顾译语结构和表达习惯”指的就是要遵循译入语的语言使用规范。也就是说,在运用零翻译时,当源语符号本身符合译语结构和表达习惯时,就是“原形移译”;反之,当源语符号与译语结构和表达习惯相抵牾时,则要按照译入语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改动。众所周知,英语是形合语言,具有形态变化,其语法规则是强制的,而汉语是意合语言,语法规则相对自由,词句之间的顺序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因此在英到汉的翻译中就会出现“句法消失”的现象。这种句法消失现象主要包括英语单复数,时态和语态,冠词等的隐化表达(林超伦 5)。而在从汉到英

的翻译中，为了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译者必须将隐含的句法词法补充出来。零翻译既然属于翻译，那必然也应遵循这一语言使用的基本规范。例如：

- (3) 原文：据说德塔大师曾经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由于开悟得证，放弃了斯坦福、耶鲁、加州伯克利等常春藤名校的Offer，受戒皈依，遁入空门。

译文：Supposedly, Master Deta had once been a promising student at the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owever, as a result of his enlightenment, he gave up offers for graduate study at Stanford, Yale, UC Berkley and other ivy-clad campuses, took up vows, and became ordained as a monk.

这个例子对“Offer”一词的处理充分体现出英汉两种语言对复数概念的表达不同。汉语不能通过改变词形本身来传达复数概念（费成志 122），复数含义可以通过词汇手段（在名词前面添加数词或量词）、语法手段（在名词前填加“些”“群”“们”等词）（张斌、胡裕树 134）或者其他语境信息来传达。在这个例子中，原文中的“Offer”前有“斯坦福、耶鲁、加州伯克利”这些名词，并且出现了“等”这一表示复数的语法标记，因而可以明确是一个复数概念。由于汉语形式模糊的特征，“Offer”虽是英文词汇，在汉语书写中其具体形态不影响汉语的语言规范。但在回译成英文时，这个词却必须要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也就是名词变复数的语法，否则就是错误。译文在语言单位原封不动移过来的基础上，不仅首字母大写改为小写，还在词尾添加上复数词缀“-s”，使译文首先在语法上是正确的，照顾到了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 (4) 原文：万总做出来的 App 叫“有真相”。

译文：Mr. Wan's mobile app is called “Truthgram.”

在英文的书面语写作中，有对于英文单词何时大写的具体规则，这也成为了英语语言使用习惯的一部分。在该例中，“App”虽是专业术语，但由于移动科技在日常生活的普及，这种缩略语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通词汇。由于该词出现在句中，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这些词在互联网科技中的普遍性，并没有像汉语那样采用大写给予突出强调，而是按照英语行文的习惯全部改为小写呈现，提高了译文的易读性。

因此，以上两例充分说明了零翻译并非全然都是“原封不动”地转移语言单位。为了符合译入语的语法，原封不动基础上的改动是必须的。

（二）零翻译不能否定译者能动性的发挥

在以往关于零翻译的讨论中，彭利元认为零翻译不属于翻译，只是一种语码混用。因为看上去译者只是将原语符号直接挪用到译语中而已，没有发挥翻译的作用，也就否定了译者的能动性（90）。多数学者虽然承认零翻译属于翻译，但将其限定为“不操作”（熊兵 85）、“不加处理”（李家春 95）、“原封不动”（李丹 126），也同样否定了译者的能动性，忽略了译者因素。在应用文体的翻译中，虽然“准确性”和“忠实性”的要求大于能动的“再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译者的作用，对于原文中不清晰或不准确的地方，译者应该有责任给予明示或修正。众所周知，文学翻译并不是原文在另一语境中的简单复制，而是译者介于“隐身”和“显身”之间的再创造。基于原文甚至高于原文的主体能动性通常被视为是最高境界的忠实。我们认为，零翻译虽然是一种源语符号的转移，但在翻译中也可以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做出一些“再创造”的处理。例如：

（5）原文：托了老徐的福，我们这小破公司接下万总的单，花着这个天使那个
PE 的 ABCD 轮美钞欧元澳币，……

译文：Due to Lao Xu's persistence and luck, our little agency managed to land Mr. Wan as a client. We are supposed to spend the euros, dollars, yen, and yuan flowing in from angel investors, from private equity funds, from rounds A-B-C-D...

在这个例子中，译者在译文中根据语境对英文缩写“PE”进行了还原，避免了该缩略词对译文读者可能造成的意义不明或理解混乱。笔者以为，这种缩写与其全称具有完全相同的所指意义，因而也应被视为一种零翻译，具体而言，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换。另外，在“ABCD 轮”中，译者在零翻译原封不动转移的基础上给源语言单位添加了连字符。英语中的连字符很灵活，具有很强的构词功能。连字符可以自由地连接不同的词素或者不同词性的单词，旨在避免文本呈现的混乱和误读，使其更清晰更易读（李凤东 120）。在这个例子中，译者为了避免英文字母与前后单词呈现的混乱，以及突出作者原文中的自造字母词，发挥主观能动性，添加了连字符，使译本呈现得更为清晰。这两处中，译者都不是对零翻译采取一种机械挪移的态度与做法，而是在原形转移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修改调整，更好地服务于译文读者的理解与接受。

（6）原文：NPC。媳妇儿吐出一个词。

啥玩意儿？

Non-Player-Controlled Character。非玩家控制角色。

译文：There are always NPC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Non-Player Characters.

在这个例子中，“非玩家控制角色”是计算机游戏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其正确的英文对应表达是“Non-Player Characters”，而原文中的“Non-Player-Controlled Character”，是小说中的人物对这个术语的错误解释。由于小说在这里并未刻意表现人物对游戏的非专业知识，为了文本表达的正确性，译者通过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在译文对这一词组的零翻译中进行了勘误式的改动。

- (7) 原文：就像那些在雍和官外佛具商店里购买电子佛盒的人们，摆在家里，按动按钮，它便会开始诵读经文，每逢正点或者设定好时间，还会发出跟庙里敲钟一样空旷幽远的“duang”一声。

译文：In a way, I'm not too different from the throngs of shoppers at the Buddhist shop outside Yonghe Lamasery vying to buy electronic “Buddha boxes.” They bring the box home, push a button, and the box starts chanting sutras. On the hour (or at designated times), the box will even emit a tranquil, meditative duannnnng, like the ringing of the bell in a temple.

在这个例子中，原文中的象声词“duang”是为了描述寺庙敲钟发出的深沉悠远的声音，这一声音词的表达在中文读者脑海中可以很容易地浮现出来，但大部分英文读者对“duang”所要传达声音特色却是陌生的，为了更好地传达这一音响特征，译者不仅通过零翻译进行原形转移，而且还创造性地在单词中添加了四个“n”。鼻音/n/是低沉的，连续不间断的鼻音会产生一种浑厚、悠长、共鸣的音响效果，正似轻敲钟声所产生的效果。译者所增加的这几个“n”，看似简单，但却独具匠心，可视为一种音韵修辞手段，形象贴切地向英文读者传达出了钟声余韵连绵不绝的音响效果。

综上，我们认为可以对“原封不动地移译”这一零翻译的定义进行修正，使其能够真正体现出概念的包容性与拓展性。综合上述考量，零翻译的概念可界定为：按照译入语结构和表达的规范与习惯要求，在不改变符号性质的前提下，将源符转移到译符的翻译方法。具体来说，零翻译中未发生变化的仅是符号本身的属性，其具体形态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要以其所在的语境（包括语篇和文化语境）为参照，即使“不作任何处理”，也是译者在思考和权衡之后所采用的一种翻译方法。我们认为，现有零翻译的定义过于强调“原封不动”，正是对零翻译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所难以认同的。从本文所讨论的实例可以看出，零翻译并不完全是“照抄不译”，“没有翻译”“原封不动”仅是零翻译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所修订的定义侧重翻译过程中符号属性不发生变化，可以适用于理论研究者关注零翻译的多种表现形式，有助于这

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此外，在翻译方法上，如果译者抱有零翻译即“不作任何处理”的认识，在翻译实践上就会对原文特殊语言符号采取简单机械地跨语际挪移，忽视对其功能和效果的分析，可能导致不当翻译的出现，这样的定义无疑也是有害的。本文所做的修正将零翻译纳入到“译”作为翻译方法和现象的范畴，不仅从实践上肯定了零翻译中有译者行为的体现，而且要求译者在运用零翻译时应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指出了该定义在翻译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迅猛，各国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英汉语言，甚至汉语与其他语系语言之间的相互混杂也会越来越普遍（刘学、薛笑丛 107-10）。在此背景下，零翻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在解决由于语言混杂而难译的问题上很有研究价值。作为翻译现象中的一种边缘存在，我们应该重视对零翻译的研究，从而推动零翻译在实践中的深入应用，推动翻译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然而，由于现实的翻译实践具有客观性和复杂性，零翻译既然属于翻译，那其定义的精准性和完整化的探索必然是道阻且长。语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反映，也随着新的社会实践而不断丰富，只要社会在发展，必然会有新的翻译现象产生，翻译应用中也会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漠视，应重视对特殊的探讨，对特殊的反复推敲，这也能促进我们对以往所忽视的特殊现象的全面理解，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相应领域的理论实践体系的完善，进而推动学术不断进步。

注释 [Note]

- [1] 文中所有译例选自《未来镜像：〈克拉克世界〉中国科幻作家作品》。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其中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Fei, Chengzhi. "The Expression of the Plural Nouns in Modern Chinese." *Modern Chinese*, no. 11, 2016, pp. 122-24. [费成志：《现代汉语名词复数的表达方式与标记》，载《现代语文》2016年第11期，第122-24页。]
- Han, Ziman. *Hybridity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5. [韩子满：《文学翻译杂合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Huang, Dexian, and Zhizhuo Li. "Transparent Translation of Civil Aviation Terminology."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o. 1, 2017, pp. 110-14. [黄德先、黎志卓：《民航术语的透明翻译》，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0-14页。]
- Huang, Zhonglian, et al. *Applied Translatology*.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2013. [黄忠廉等：《应用翻译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 Jia, Ying. "Zero-translation or Untranslatibilit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02, pp. 75-77. [贾影：《“零翻译”还是“不可译”——试与邱懋如教授商榷》，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75-77页。]
- Leng, Ziyang, and Aijun He. "The Evaluation and Readers Attitudes to Zero-translation." *Modern Chinese*, no. 10, 2016, pp. 9-12. [冷姿颖、贺爱军：《“零翻译”的利弊分析与读者的文化态度》，载《现代语文》2016年第10期，第9-12页。]

- Lenin, Vladimir Ilyich. *Selected Works of Lenin(Volume 4)*. People's Publishing, 1995.[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Li, Dan. "Zero Translation Belongs to Transference."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5, 2019, pp. 120-27. [李丹:《零翻译可安身于移译——兼与彭利元教授商榷》,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120-27页。]
- Li, Fengdong. "A Functional Study of Hyphen in English Word-making." *Journal of Jinan Vocational College*, no. 2, 2010, pp. 120-21, 124. [李凤东:《英语构词法中连字符构词功能分析》,载《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120-121, 124页。]
- Li, Jiachun. "On the Types of Zero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3, 2013, pp. 93-96. [李家春:《零翻译类型研究》,载《外语学刊》2013年第3期,第93-96页。]
- Lin, Chaolun. *Field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5. [林超伦:《实战笔译汉译英分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Liu, Ming, and Chunrang Shi. "Zero-translation in News Discourse." *News Research*, no. 2, 2011, pp. 108-10. [刘明、石春让:《新闻语篇中的零翻译摭谈》,载《新闻知识》2011年第2期,第108-10页。]
- Liu, Xue, and Xiacong Xue. "The Zero-translation of English Lettered-word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6, pp. 107-10. [刘学、薛笑丛:《与零翻译策略探析》,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第107-110页。]
- Peng, Liyuan. "Zero-translation is not a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 2017, pp. 86-91. [彭利元:《零翻译非翻译——兼与译界同仁商榷》,载《中国翻译》2017年第5期,第86-91页。]
- Qin, Jun. "The Non-translation Strategy in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 2018, pp. 102-108. [覃军:《译,贵在不译——翻译中的非翻译策略》,载《中国翻译》2018年第5期,第102-108页。]
- Sun, Deping, and Guoqiang Zhao.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Zer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no. 3, 2017, pp. 107-14. [孙德平、赵国强:《对“零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载《语言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7-14页。]
- Shi, Chunrang, and Lei Yang. "The Type and Function of Translating Terms on Zero-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2, 2014, pp. 82-85. [石春让、杨蕾:《术语零翻译法的类别与功能》,载《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第82-85页。]
- Wang, Tiantian, and Xin Cheng. "Translating the Letter A in Maritime English."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8, pp. 6-8. [王甜甜、程昕:《海事英语中字母“A”的翻译策略》,载《中国科技翻译》2018年第3期,第6-8页。]
- Wang, Ning. "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Definition, Function and Future Orient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3, 2016, pp. 88-93.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翻译及翻译研究:定义、功能及未来走向》,载《外语教学》2016年第3期,第88-93页。]
- Wu, Jianguo, and Wenjia Qin. "'Zero Translation' Reconsidered."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1, 2016, pp. 76-81, 94. [吴建国、秦闻佳:《词语“全球化”——“零翻译”原则与策略探析》,载《上海翻译》2016年第1期,第76-81, 94页。]
- Xiong, Bing. "The Clarification of Some Concep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4, pp. 82-88. [熊兵:《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载《中国翻译》2014年第3期,第82-88页。]
- Yuan, Yiping. "The Zero Trans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rm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 3, 2010, pp. 13-17. [袁宜平:《科技术语的零翻译》,载《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10年第3期,第13-17页。]
- Zhang, Bin, and Yushu Hu.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Grammar*.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9.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 Zhang, Lili. "Sci-tech Loanwords in Dictionaries."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 2014, pp. 33-35, 15. [张立丽:《词典中的零翻译科技外来词》,载《中国科技翻译》2014年第2期,第33-35, 15页。]

FLC

语 言 学 研 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阿富汗语言政策演变及启示研究

◎ 郭建荣

内容提要: 阿富汗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商贸枢纽,亦是当今“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成员国,以多民族、多部落、多语言、多方言为显著特点。本文根据阿富汗官方语言的变化情况,分析其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并总结其特点及启示。文章最后指出,要重视国家通用语言的主导地位,有效发挥语言政策对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加大支持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研究和利用,建立我国安全语言规划,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 阿富汗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一带一路” 语言安全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124-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周边国家语言政策对新疆语言规划的影响和对策研究”(17BYY076);新疆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言安全视角下新疆周边国家语言战略研究”(17BYY080)

作者单位: 新疆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3

Title: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Language Policy in Afghanista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Afghanistan is not only the trade hub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racterized by multi-ethnicity, multi-tribe, multi-language and multi-diale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policy in Afghanistan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to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It is essential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promo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unity, and increase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of cross-border language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Keywords: Afghanistan,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nguage security

Author: Jianrong Gu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Teacher's College, Urumqi, Xinjiang, China.

阿富汗全称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地处西亚、南亚、中亚交汇处,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和通向南亚大陆的“锁钥”,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节点,它是当今“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成员国。从地缘政治上,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延伸的大陆桥,并且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意愿强烈的合作伙伴;从地缘经济上看,阿富汗地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交汇点,是连接“一带”与“一路”两条线路的重要通道,亦是影响未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的关键外因。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领域广、基础好、契合度高(李青燕 14),在推进“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可发挥独特作用。

“一带一路”,语言铺路;国家出行,语言先行(李宇明 2-9)。了解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对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学者对于阿富汗有大量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在为数不多的涉及阿富汗语言问题的研究中,斯齐夫曼(Harold F. Schiffman)探讨了阿富汗及其邻国的语言分布及语言政策(31-52)。与国外相比,国内的阿富汗研究起步晚,成果少,主要为几部通史和概况类的专著,其他专题著述还不多见。研究文章多以现状为导向,主要关注阿富汗的重建、地区安全、反恐、毒品、大国政治、民族关系等,以及阿富汗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黄民兴、陈利宽 16-31;朱永彪、魏丽珺 100-16),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仍是空白,尤其针对阿富汗语言问题,缺乏专门性研究,多附带于民族问题的个别章节中(寇耀清 10-13;闫伟 147-51)。因此,阿富汗语言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是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课题。本文旨在深入研究阿富汗语言国情和语言政策,分析其政策演变特点,并以语言问题为抓手,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为我国语言规划及与周边邻国的互联互通奠定语言文化基础。

一、阿富汗语言概况

阿富汗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和民族迁徙的走廊,自古以来就以多民族、多部族、多语言、多方言为显著特点。根据阿富汗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3 月最新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阿富汗人口为 3160 万^[1],包括约 30 个民族,其中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为四大主要民族,分别约占 40%、25%、19%、8%^[2]。阿富汗境内还有一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如艾马克人、土库曼人和俾路支人,约占 4%。其他民族如基齐勒巴什人、努里斯坦人、帕萨伊人、古加尔人、帕米尔人、吉尔吉斯人、布拉灰族等,约占 4%。

阿富汗民族构成呈分裂性,没有一个民族占绝对多数。此外,阿富汗是中南亚地区主要的跨境民族聚居区,其主体民族也不例外,跨境民族人口比例之高、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为其他国家所不能比。

阿富汗约有 30 多种语言,涵盖了印欧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和闪含语系四大语系,如表 1 所示。其中,印欧语系的使用者最多,占人口的 80%。印欧语系中的达里语和普什图语是官方语言,也是阿富汗使用最广的两种语言,分别约占 77%、48%^[3]。

历届政府的一切正式文件、法律、法令、条约、协议均以此两种语言为准。

表 1 阿富汗境主要语言情况表^[4]

印欧语系	普什图语、达里语、俾路支语、努里斯坦语、帕萨伊语、基齐勒巴什语、达尔迪克语等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蒙古语等
达罗毗荼语系	布拉灰语
闪含语系	阿拉伯语

普什图语又称帕图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是普什图人的民族语言。普什图语使用人口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东部、南部、西南部和东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区，首都喀布尔即在普什图语区。普什图语有众多方言和土语，按照语音和词汇等特点，分为两大方言系统，即以白沙瓦为中心的东部方言系统和以坎大哈为中心的西部方言系统。

达里语又称“阿富汗的波斯语”，亦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是阿富汗族际交往的通用语言，广泛应用于公共领域。操达里语的民族主要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基希尔巴什族、艾马克族，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中西部、中北部和东北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地区。达里语与伊朗使用的现代波斯语可相互理解，但由于使用环境的巨大差异，两者在用词、发音和使用习惯上有所不同。达里语的语法结构并不接近现代波斯语，而是更接近现代塔吉克语。达里语方言大体上可分为阿富汗西部和南部及伊朗呼罗珊地区居民讲的达里语和阿富汗北部及中亚地区居民讲的达里语两大区域。

阿富汗其他语言还有乌兹别克语和土库曼语，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地区。两种语言均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阿富汗另有俾路支语、努里斯坦语、帕萨伊语、基齐勒巴什语、吉尔吉斯语、布拉灰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使用俾路支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区；使用帕萨伊语、努里斯坦语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阿富汗东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区。英语主要在阿富汗中上层通用，西部与伊朗临近省份的民众能听懂波斯语，北部部分地区居民可用俄语交流。

二、阿富汗语言政策演变

斯波斯基 (Bernard Spolsky) 认为，语言政策是“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国家整体的所有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相关管理决策” (8)。语言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国家利益方向，反映了各利益阶层的关系 (李雅 74)。语言规划通常是某种语言政策的体现，是国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开展的各种工作的统称，是对语言文字问题做出的有组织的、主动的反映和调节，它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功能规划等 (赵蓉晖，《中国外语规划》1-7)。语言政策与规划不仅事关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稳定，而且对经济、文化和

教育等各方面发展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按照阿富汗建国后的年代顺序,根据阿富汗官方语言的变化情况,分成五个主要历史阶段来梳理阿富汗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为更清晰、直观地阐述其过程,现将主要内容列表如下:

表2 阿富汗语言政策历史演变的主要阶段、政策及影响

阶段	主要语言政策	官方语言变化	影响
第一阶段: 19世纪中期至 20世纪30年 代中期	1. 阿曼努拉国王统治期间颁布第一部宪法(1923年),用普什图语书写,官方译成达里语和其他语言; 2. 穆沙希班王朝统治期间,政府将普什图语设为官方语言和国语(1936年)。	官方语言发展时期,首次确立了普什图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和国语。	1. 普什图语得到优先发展,但达里语在政治、经贸和文学等领域处于主导地位; 2. 由于未做好语言习得规划,致使政府和教育系统出现混乱。
第二阶段: 20世纪40年 代中期至80年 代初	1. 十年宪政时期,1964年宪法规定:普什图语为国语,达里语和普什图语为官方语言;国家实施有效措施强化国语; 2. 在教育系统推行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双语教育政策。	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双语并行时期,两种语言均成为官方语言。	1. 政府着力强化普什图语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中的影响,虽效果不佳,但该语得到发展; 2. 达里语在教育体系、商业交往和行政管理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阶段: 20世纪80年 代至90年代初 期	1. 人民民主党政期间,1978年政府发布政令:所有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将七大民族的语言都设为国语; 2. 1987年宪法规定:国会的法律和决议及法庭审判使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发布,也可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发布。	多种官方语言并行时期,七种语言均设为国语。	1. 政府支持少数民族参与政治,鼓励少数民族学习母语和出版报刊书籍; 2. 普什图语失去了重点发展的优势,国歌由普什图语改用达里语演唱。
第四阶段: 90年代中期 至新政府成立 (2004年)前	1. 塔利班统治期间,普什图语是实际上的官方语言,首次成为政府机构唯一使用的语言; 2. 反塔联盟时期,达里语获得大力发展。	普什图语和达里语使用此消彼长。	1. 政府机构单独使用普什图语引起诸多不便和不满; 2. 达里语的使用更加普遍。
第五阶段: 2004年新政府 正式成立至今	1. 2004年新宪法规定:普什图语、达里语和一种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同为官方语言;国歌以普什图语写成,且用普什图语演唱; 2. 《教育法》(2009)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选择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之一;提供学习第三官方语言机会。	三种官方语言并行时期,宪法没有规定国语	1. 重点保障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的官方语言地位; 2. 兼顾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通过语言政策团结不同部落和族裔群体。

在第一阶段,阿富汗政府从没有明确规定官方语言到规定一种官方语言,政府主要对普什图语的地位进行了初步规划,这也是普什图语蓬勃发展的时期。1747年阿富汗建国后,达里语一直在重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自19世纪中叶,普什图语走上了发展之路,出现了大批有影响的作家。阿富汗国王希尔·阿里·汗(Sher Ali Khan)时期(1863—1866, 1868—1879),波斯语被认为是外来语言,因此开始在政府和军事部门推广普什图语,将其用于正式场合。20世纪初,随着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兴起,改革和独立成为两个中心议题,关于语言问

题的争论凸显。拥有阿富汗“报刊之父”称号的代表人物马赫迈德·贝格·塔尔齐（Mahlud Beg Tarzi）在其1911年创办的达里语半月刊《光明新闻》中多次发表关于语言问题的文章。在塔尔齐看来，普什图语是在阿富汗“马赛克”民族社会中构建统一国家和统一民族的重要一环，阿富汗应当推广普什图语，并提高其地位。他的这些想法也得以付诸实践，在哈比布拉·汗（Habibullah Khan）时期（1901—1919），普什图语被定为学校的教学语言之一。

在第二阶段，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ed Daoud）主政时（1953—1963），为构建统一的普什图观念，推行了政府公文普什图语化运动。一些非普什图语的政府人员，在传递达里语文件时，需先找人译为普什图语。如果接收方同样是非普什图语的使用者，又得把这些文件再译回达里语。在多次转译过程中，难免出现讹误，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普什图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电台节目和新闻媒体中的使用率大幅度提升。“十年宪政”时期（1963—1973），语言问题再次凸显。1964年宪法是阿富汗颁布的第一部涉及语言政策的法律，该宪法第3条规定了国语和官方语言（张敏 380）。在这一时期，阿富汗将原先的波斯语更名为达里语，以示与伊朗波斯语的区别，突出本土性。政府规定，讲达里语的公务员必须参加普什图语业余培训课程，成绩不达标的将扣工资；普什图语是发行货币和打印银行账单的唯一用语；具备普什图语读写能力成为出国的基本条件等。此外，政府还发起了普什图语文化运动，但这些举措成果非常有限。

在第三阶段，人民民主党上台后（1978—1992），尤其是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执政时期（1979—1986），阿富汗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深受苏联的影响。1978年，人民民主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所有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将阿富汗七大民族的语言（普什图语、达里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努里斯坦语、帕萨伊语和俾路支语）都设为国语（Schiffman 43-44），普什图语成为多个官方语言之一。在此之后的纳吉布拉（Najibullah）政权沿袭了民族语言平等政策。1987年宪法第98条规定：“法庭审判使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或者当地多数居民使用的语言。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懂审判时使用的语言，有权通过翻译了解案件的相关材料和文件，也有权要求法庭使用自己的母语。”政治权力的丧失导致普什图人在语言文化领域的影响衰落。以普什图语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和出版的报刊大幅下降。而此前，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在公共媒体的使用率几乎各占一半。苏联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持续到90年代初期。这种以区域、民族为基础的语言政策，突出了一个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差异性，为民族和语言的地区分裂提供了平台，不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也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

在第四阶段，以普什图族为主体的塔利班统治期间（1996—2001），虽没有颁布语言政策，但普什图语实际上是官方语言。“9·11”事件以后，塔利班政权土崩瓦解。讲达里语的反塔联盟（即由塔吉克、哈扎拉和乌兹别克等民族的武装力量组成的“北方联盟”）迅速崛起，使达里语获得了大发展，使用更为普遍，而普什图语呈现出萎缩局面。

在第五阶段，阿富汗新宪法第1章第16条规定普什图语和达里语为官方语言。同时，在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帕夏语、努里斯坦语、俾路支语和帕米尔语主要分布地区，以上任

意一种语言可作为第三种官方语言，但其使用必须遵守法律。国家将制定方案发展所有语言，在出版和大众媒介中可自由使用所有语言，但学术界和国家行政部门的专门用语保持不变。

三、阿富汗语言政策特点

（一）阿富汗语言政策不稳定，实施效果乏力

纵观阿富汗百年来的语言政策，往往与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息息相关，并随着社会、政治情况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具有不稳定性。其官方语言的规定也从推行一种官方语言开始，到推行两种乃至多种（七个），最后演变到目前的三种官方语言。政府在宏观层面对官方语言的地位进行了规定，主要目的在于推动语言主体性的发展，强化国家认同，提高民族向心力。语言不只是人与人沟通的工具，还有政治关联性，语言政策也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语言政策作为民族政策和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调解民族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阿富汗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来说，如何通过语言政策来强化国民的国家概念，增强民族意识，提高凝聚力，成为紧迫的问题。

由于国家长期动荡、国民受教育程度低、国家意识淡薄等原因，从整体上看，历届阿富汗语言政策的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严重滞后于地位规划，因而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实现政府期待的“语言统一下的多样性”。从阿富汗语言政策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社会稳定是语言政策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同时，国家的经济状况、良好的语言教育也是语言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和语言和谐发展的社会基础。阿富汗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语言本体和语言习得的规划力。

（二）优先发展普什图语，但受到达里语严重挑战

从20世纪30年代至1978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建立及现在的新政府统治期间，阿富汗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发展和推广普什图语为主。政府重视普什图语的研究和应用，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讲普什图语的民族比例最多；它体现了主体民族普什图人的特性。总体上看，普什图语得到有力发展，达里语受到压制。

普什图语和达里语虽同为官方语言，但达里语的使用和影响更为普遍，一直保持更高地位。达里语是所有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共同的书面语言，能说达里语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虽说普什图人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从杜兰尼王朝建立到现在，普什图语基本只局限于普什图人使用。达里语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名副其实的“族际间的交际语”。阿富汗语言问题的症结在于，虽然普什图人长期处于政权的中心，主导国家政治，但其语言和文化却不占优势，其人口也不占绝对多数，因而使用达里语的人口远多于使用普什图语的人口。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富汗的语言政策致力于提高普什图语的地位，强化普什图语在政府机构和教育系统中的应用，同时减弱达里语的影响，以便扭转看似错位

的语言结构。

在阿富汗，多民族国家的语言的象征性（身份标志作用）和实用性（交际作用）处于矛盾对立状态，因而普什图语与达里语一直存在官方语言地位之争。直到今天，竞争仍未分结果，没有一家可以独大。一种语言文字的地位，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法律政策所体现的决策者、当政者的态度和感情，而取决于该语言文字能否承担起法律与政策赋予它的人际交流、信息承载、文化传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周庆生、魏丹 2）。语言问题如同民族问题一样，它的解决需要遵照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

四、对我国语言规划的启示与建议

中国和阿富汗两国山水相连，同为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研究阿富汗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可为我国的语言规划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重视国家通用语言，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治国安邦的重器。通过语言规划实施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使用共同语言对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是最佳选择，因为使用共同语言能够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加速共同心理的形成，提高人民的凝聚力，提升国家的认同感，推动国家稳定统一。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都非常重视语言的统一与和谐。阿富汗政府虽然在不同政治时期推行不同的语言政策，但在建国后大部分时间里，普什图语都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政府致力于通过语言政策的调节，来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统一。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 70%，约 70% 的人口掌握汉语拼音，95% 以上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为保证国家的政令畅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架设了沟通桥梁。2016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发展目标。为确保这一目标实现，两部委于 2017 年发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强国必先强语，强语助力强国”，“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的方针政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富裕，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国家通用语绝不是哪个民族的语言，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母语”和各民族之间的族际共同语。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二）加大跨境语言研究利用，进行安全语言战略规划

阿富汗与中国共同边界为 92.45 公里，与中国存在着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吉克语

等多个跨境语言，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了解和研究它们关乎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语言管理、教育合作和情感联系。赵世举认为，跨境语言是独特的语言资源、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政治资源，是联系邻邦的独特桥梁，维系边疆民族团结的粘合剂和特殊的安全资源（1-11）。语言是把双刃剑，“正确对待和有效利用跨境语言，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7）。我国需要科学规划国内跨境语言，建立跨境语言资源数据库，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跨境语言活力，提升跨境语言服务国家大局的能力。

语言政策不只是用来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或是与本国政治、经济上的利益问题，外语教育规划还必须紧扣国家安全这个主题，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有力武器（赵蓉晖，《安全视域的外语规划》16）。语言规划的得失，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首先，我国要制定关键语言计划，储备相应的外语人才。我国外语关键语种规划中应包括世界较为热点地区且与我国安全直接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以及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方语种。但目前我国与阿富汗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开设普什图语专业的高校仅3所，开设达里语专业的高校仅有1所（北京外国语大学），而且是近年新增专业，尚无毕业生，高校培养的语言专业人才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其次，要大力扶持语言交叉学科，加快“外语+”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尤其要加强有关热点地区文化知识的深度学习，形成综合一体的语言文化和区域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最后，还应建立国家安全关键语种人才培养基地，对维护战略语种人才储备发挥积极作用。

阿富汗是我国西部边陲的重要邻国，是彼此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基于睦邻友好、建设“一带一路”，还是维护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阿富汗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应充分利用与阿富汗地缘、民族、语言联系的优势，丰富两国教育合作形式，将“语言相通”打造成为打开“民心相通”大门的金钥匙，在此基础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开展的合作与交流才会更加富有成效。阿富汗语言政策的历史变迁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不单纯是语言选择与实践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重大问题。制定语言政策，筹划语言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充分认识语言的多重功能，加强对我国的语言管理，重视国家通用语言的主导地位，有效发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之力在促进国家认同和提高民族凝聚力中的重要调节作用，建立国家安全语言规划，构建主体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和谐语言生态秩序。

注释 [Notes]

[1]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阿富汗动态”，2019年3月13日，af.china-embassy.org/chn/afhdt/t1653970.htm

[2] “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国别（地区）指南，阿富汗（2019年版）”，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

- [3] CIA, The World Factbook: Afghanistan, 11 Oct. 2015, 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af.html.
- [4] 资料综合整理自 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UP, 1980, pp. 66-74; 张敏:《阿富汗文化和社会》, 第10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Huang, Minxing, and Likuan Chen. "Afghanista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hoice in Regional Multiple Competition." *West Asian Africa*, no. 2, 2016, pp. 16-31. [黄民兴、陈利宽:《阿富汗与“一带一路”建设:地区多元竞争下的选择》,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16-31页。]
- Kou, Yaoqing. *A Study on the Ethnic Relation in Modern Afghanistan*. Thesi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08. [寇耀清:《当代阿富汗民族关系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8。]
- Li, Qingyan. "The Situation of Afghanistan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no. 3, 2016, pp. 9-16. [李青燕:《阿富汗形势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载《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3期,第9-16页。]
- Li, Ya. "Change of Language Policy after Independence of Tajikistan."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 2014, pp. 74-86. [李雅:《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语言政策演变》,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74-86页。]
- Li, Yuming. "On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Global Governance."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5, 2018, pp. 2-9. [李宇明:《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载《外语界》2018年第5期,第2-9页。]
- Schiffman, Harold F., editor.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Brill, 2012.
- Spolsky, Bernard.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UP, 2004.
- Yan, Wei.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f Afghan Nation-State Building*. Diss.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4. [闫伟:《阿富汗民族国家构建的多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4。]
- Zhang, Ming. *Culture and Society of Afghanistan*. Kunlun, 2007. [张敏:《阿富汗文化和社会》。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
- Zhao, Ronghui.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 2010, pp. 12-16. [赵蓉晖:《国家安全视域的中国外语规划》,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2-16页。]
- .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n China: Essential Issues."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 2014, pp. 1-7. [赵蓉晖:《中国外语规划与政策的基本问题》,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7页。]
- Zhao, Shiju. "On the Value of Resources from Cross-Border Languages."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no. 2, 2016, pp. 1-11. [赵世举:《跨境语言的资源价值》,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1页。]
- Zhou, Qingsheng, and Dan Wei. *Nation, Ethnicity and Language: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Language and Culture, 2003. [周庆生、魏丹:《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 Zhu, Yongbiao, and Lijun Wei. "Afghanistan's Security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outh Asian Studies*, no. 3, 2017, pp. 100-16. [朱永彪、魏丽珺:《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载《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0-16页。]

◇责任编辑:易佳

巴基斯坦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研究

◎ 贾春燕

内容提要: 本文从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两个层面,介绍了我国重要邻国巴基斯坦的语言状况,并分析了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特点。巴基斯坦语言生态丰富,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在语言政策方面,一方面通过语言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乌尔都语和英语在其国内的博弈却从未停止。通过借鉴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我国应当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同时,加大对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的研究,通过“语言铺路”“语言搭桥”,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

关键词: 巴基斯坦 语言生态 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13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周边国家语言政策对新疆语言规划的影响和对策研究”(17BYY076);新疆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言安全视角下新疆周边国家语言战略研究”(17BYY080)

作者单位: 新疆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3

Title: A Study of Language Ecology and Language Policy in Pakist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ecology and language polic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anguage situation of Pakistan, an important neighbor of China,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kistan's language policy. Pakistan is a multi-ethnic and multilingual country. In terms of language policy, on the one hand, it strengthens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language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Urdu and English has never stopped. Learning from Pakistan's language polic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national language to enhance the Chinese identity and carry out more researches on Pakistan's domestic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policy. Through "language bridging," the further research will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Pakistan, language ecology, language policy

Author: Chunyan Jia, Lecture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Teacher's College, Urumqi, Xinjiang, China.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地处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东连印度，西接伊朗，南邻阿拉伯海，北隔阿富汗“瓦罕走廊”，西北与阿富汗交界，东北与我国新疆地区毗邻，是南亚第二大国。巴基斯坦整体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北部和西部多山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东部为印度河平原，经济相对发达。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正式建国。

巴基斯坦是我国通向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海湾地区的十字路口。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巴基斯坦是我国推行南亚和中亚政治的桥头堡；从地缘经济来看，是中国连接中亚、南亚的能源和贸易通道。中巴两国长期以来建立了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双方始终致力于推进全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是从我国西部推进至欧洲、波斯湾、地中海、印度洋等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是从中国经南海到印度洋并延伸至欧洲。“中巴经济走廊”正是打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两个战略的连接区、交汇区、受益区。巴基斯坦则处于“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核心范围。

巴基斯坦是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但国内学界目前对巴基斯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政治、经济、中巴经济走廊，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对于巴基斯坦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现有研究主要有：田莎从语言状况和宏观语言政策两个维度，概述和分析了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1-6）；满在江等从语言与民族关系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乌尔都语被确立为国语的原因及乌尔都语与英语、乌尔都语与孟加拉语之间的关系（16-20）；官忠明、王锐俊从语言规划的视角介绍了巴基斯坦建国后语言规划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和由此产生的一些语言问题（60-64）；官忠明以语言问题的维度介绍了巴基斯坦建国后乌尔都语的地位规划历程及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挑战（59-62）。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对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研究更多关注乌尔都语，全面梳理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状况的研究还比较少；对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地位规划方面，对其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都鲜有涉及。本文以语言生态理论和语言规划理论为基础，尝试描述和分析巴基斯坦的语言国情，以加深我国对巴基斯坦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的了解。

一、理论基础

语言生态这个概念始于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他认为“语言所处的环境受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影响。语言数量、人口、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内

容构成社会环境；地理分布、动植物状况、气候等影响着自然环境；而人们对语言态度和对语言的选择则是心理环境”（325）。因而语言的发展壮大或是消亡是语言使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语言生态环境做出的相应选择。豪根提出的语言生态观点为语言规划研究添加了生态学的视角，从语言生态的角度去探究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变化能更好地解释其政策背后的动因。

库帕（Robert Cooper）认为，“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部分。语言的地位规划就是划分语言的功能（如指定国语、官方语言等），确定语言的地位，使得它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语言本体规划则是发展语言的文字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习得规划，其主要内容是确定教学媒介语 [medium of instruction] 及规划本国语言及外语的教育”（30-31）。语言政策实际上是通过立法或者政府调节手段，对本国的语言生态（一种语言或者多种语言）进行调节。

哈尔曼（Harald Haarmann）提出，应该在以上三个维度上增加另外一个维度，即声望维度。他认为“语言规划发生在政府活动、机构活动、群体活动和个人活动等四个不同的层级中，这些层级反映不同的声望，代表不同的组织影响的效率”（103-26）。周明朗进一步提出语言秩序的概念，他认为“语言秩序实际上就是多语秩序，即使在语言比较单一的社区或者国家也存在着标准语和非标准语之间的等级关系，在多语秩序中，语言有不同的等级”（48）。语言声望和语言秩序的提出，有利于学者根据语言的流行程度和中心度，来判定语言的交际价值和语言地位。

语言生态学使语言规划理论从聚焦单一语码变量扩展到多变量参与的语言生态中来，在研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同时考虑语言生存、发展、功能等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通过语言生态学的视角，可以更好地分析和理解现存语言存在的历史动因，以及语言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语言所处的环境，从而解决语言冲突和矛盾，构建更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

二、巴基斯坦的语言生态

（一）巴基斯坦主要民族

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据世界银行 2018 年统计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总人口为 2.12 亿^[1]。按民族所占的人口分布来分，主要有旁遮普族、普什图族、信德族和俾路支族。

旁遮普人是第一大民族，人口约 7600 万。旁遮普人主要聚居在旁遮普平原，旁遮普省也是巴基斯坦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旁遮普人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旁遮普人在高级文官中约占 80%，约占军队将领人数的 70%，所掌握的工商业资产约占全国的 75%。

普什图人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在巴基斯坦生活的普什图人约有 2600 万。巴基斯坦国内的普什图人与阿富汗境内的普什图人属于同一民族。普什图人惯常以部落形式生活，在巴阿边境的普什图人，其民族认同感强于国家认同感。

信德人是巴基斯坦的第三大民族，主要分布在信德省，巴基斯坦的原首都卡拉奇也在信德省。信德人多从事农业，种田放牧。近年来随着卡拉奇等大城市的城市化不断推进，部分信德人开始务工经商。

俾路支人聚居在俾路支高原，自然条件较差，经济比较落后。俾路支人也属于跨境民族，且与普什图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二）巴基斯坦主要语言概况

巴基斯坦是个多语言的国家，目前国内主要使用乌尔都语（Urdu）、旁遮普语（Punjabi）、普什图语（Pashto）、信德语（Sindhi）、俾路支语（Balochi）和英语；此外还有超过 59 种少数民族语言。

1. 巴基斯坦国家语言：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乌尔都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乌尔都语共有 54 个音素，其中元音 12 个，辅音 42 个，采用波斯语体阿拉伯语字母书写。同一字母在单词的前、中、后位置都用不同的书写形式。动词的时、体、态在不同语境中也都发生变化，名词和部分形容词也有性和数的变化。

乌尔都语最早起源于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军队，“乌尔都”本意为军队，它是北印度德里方言的一种，后来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下，乌尔都语逐渐吸收了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发音和词汇，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词汇系统。如今的乌尔都语中约有 40% 的词汇来源于波斯语，20% 来自于阿拉伯语，约有 15% 的词汇来源于英语。它在经历了德干时期、德里时期、勒可瑙时期、拉合尔时期后发展成为南亚次大陆一种重要的语言。乌尔都语的诗歌尤其丰富，因此乌尔都语也成为了“诗的语言”。

然而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乌尔都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英国出于分而治之的理念，将当时的“印度斯坦语”划分为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划分的依据则是乌尔都语更多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而印地语更多地使用梵语词汇。印巴分治之前，印度穆斯林认为乌尔都语能代表他们共同的身份，将其视为连结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之间的纽带，而印地语则代表着印度教徒。随着两个教派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乌尔都语和现代印地语逐渐成为了现在的两种语言。

1947 年英国实行印巴分治以后，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成立了巴基斯坦。因此，虽然巴基斯坦只有不到 8% 的人以乌尔都语为母语，但是乌尔都语却被认为是能够唤起巴基斯坦民族意识、象征民族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本土语言，被确定为国家语言。一方面，乌尔都

语作为国家语言有其历史原因，另一方巴基斯坦历届政府也通过不断立法，强调乌尔都语的国语地位。

2. 巴基斯坦官方语言：英语

英语随着英帝国对南亚次大陆的入侵，被强加于南亚次大陆。1861年，英国统治者在南亚次大陆推行新的法典，采用英国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基本原则，并以英语作为法庭语言和官方语言。“因此，全印度的政府公职人员为了工作，不得不学习英语。而随着这个政策带来的改变是英语学习不但为他们提供了谋生的手段，而且使他们更加接近统治者”（刘成琼 72）。正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7）以巴基斯坦国的创建者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为首的巴基斯坦知识精英，一方面认同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对南亚次大陆的重要作用，不断强化乌尔都语的国语身份，以更好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放弃西方社会在巴基斯坦的政治、法律和文化遗产，他们比普通穆斯林民众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先进性。英语作为西方社会在巴基斯坦的文化缩影，已不仅仅是人际交往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权力身份的象征。巴基斯坦建国之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大力推行乌尔都语。但是由于历史和科技的原因，英语作为权力语言的这一现象并没有减弱，巴基斯坦大量私立学校的出现，精英阶层对英语的纯熟掌握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在显性层面上，语言地位受制于不同执政党的政治考量，乌尔都语和英语的地位之争此消彼长，但是在隐性层面上，英语始终是精英阶层象征这一点从未改变。

3. 巴基斯坦主体民族语言

旁遮普语是旁遮普人的母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与乌尔都语相似。旁遮普语有 35 个字母。由于旁遮普人宗教信仰的差异，所以不同教徒分别采用不用字母进行书写，故而旁遮普语有天城体、师成体和波斯体 3 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旁遮普语是旁遮普省主要族际交流语言，广播电视均有旁遮普语节目，拉合尔还设有旁遮普语学会，致力于旁遮普语言和文字方面的研究。

信德语是信德人的母语，主要通行于信德省、俾路支省东部和印度古吉拉特邦。信德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信德语有 54 个字母，其语音系统复杂，受阿拉伯语影响强烈，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信德语使用波斯体阿拉伯语字母书写。信德语在信德省的地位也很高，是该省的官方语言之一。

普什图语是普什图人的母语，在巴基斯坦主要流行于开普省、俾路支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区。普什图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普什图语的语法与梵语相似，词汇中大量吸收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地语词汇，其中波斯语词汇最多。普什图语有 40 个字母，其中 8 个为纯普什图词汇，剩余为阿拉伯语字母和波斯语字母。在开普省，普什图语和乌尔

都语并用，中小学一般使用普什图语授课，省内出版大量普什图语书籍、报纸和杂志。

俾路支语是大部分俾路支人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是波斯语的一种方言，采用波斯语字母书写。俾路支语在俾路支省政府的支持下，也作为该省的中小学教学语言使用（孔亮 137-39）。

三、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

（一）巴基斯坦的语言地位规划

巴基斯坦自建国以来，语言政策一直受到历届政府的权力影响，语言政策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真纳在 1948 年的达卡会议上宣布乌尔都语为巴基斯坦的唯一国语。他指出：“巴基斯坦的国语只能是乌尔都语而非其他语言，任何试图误导巴国人民（否认乌尔都国语地位）的都是巴基斯坦的敌人。”（150）而 1956 年政府又接受东巴基斯坦的要求，将孟加拉语也确立为巴基斯坦的国语，不再强调乌尔都语作为国语的唯一性（官忠明、王锐俊 60-64）。1956 年的宪法规定，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分别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英语是官方语言。

1971 年孟加拉国独立之后，巴基斯坦于 1973 年颁布宪法明确了乌尔都语为国家语言，英语为官方语言。1973 年宪法第 251 条规定：（1）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为乌尔都语，在 15 年内乌尔都语将成为官方语言并用于其他领域；（2）根据第一条，在乌尔都语取代英语之前，英语仍作为官方语言；（3）在不轻视国家语言乌尔都语的前提下，为了促进本省语言的使用，省级议会可自行确定本省的教学语言。

2015 年 9 月 9 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发布命令，要求政府部门将乌尔都语确定为国家官方语言，全面取代英语的地位。最高法院要求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及 4 个省份不可做不必要的拖延，要计划在 3 个月内完成“官方语言转换”工作。最高法院方面同时表示，“巴基斯坦国民不应该因为不懂英语错失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机会”。

（二）巴基斯坦语言的本体规划

乌尔都语的地位规划，实际上始于英国殖民时期。1813 年第一本乌尔都语的海军术语词典问世。19 世纪 40 年代，用乌尔都语教学的德里学院新创了很多表达科技思想的乌尔都语词汇。建国以后，为了支持和发展作为国语的乌尔都语，巴基斯坦在 1952 年成立语言委员会资助乌尔都语研究，并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书籍，同时还根据英语创新乌尔都语科技新词语，出版乌尔都语词语手册等。1973 年宪法颁布之后，特别是穆罕穆德·齐亚·哈克（Muhammad Zia-ul-Haq）主政之后，利用宗教和语言统一思想，努力提高乌尔都语的地位。1979 年成立的 国家语言局，进一步促进了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的使用，将英语中有关科学和法律的词汇运

用于乌尔都语中,促进新的乌尔都语词汇的产生。在现代乌尔都语中,很多科技名词都是从英语直接转写而来,字母采用乌尔都语字母,而发音基本和英语一致,以此来推动本土语言在科技中的应用。

在语言的现代化方面,由于乌尔都语字母在单词的拼写中需要根据字母在词首、词中和词尾的具体位置变化书写形式,且字母高度不一,这些给乌尔都语输入法带来了巨大困难,制约了计算机本土语言化的普及。1980年,科技大学率先发明了乌尔都语输入法,并将其应用于报纸排版中。1995年,国家语言局采用了巴基斯坦数据管理服务商(PDMS)研发的计算机输入法系统。1998年,计算机中的乌尔都语编码系统标准化。2002年,计算机可以辅助乌尔都语和英语进行相互翻译。随后巴基斯坦政府网站中乌尔都语网页也正式上线。巴基斯坦政府所倡导的一系列措施推动了乌尔都语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乌尔都语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

(三) 巴基斯坦的语言教育政策

巴基斯坦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不同教育领域的侧重点不同。按教学语言的不同,巴基斯坦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乌尔都语学校、英语学校和宗教学校。

巴基斯坦的公立学校大多数采用乌尔都语作为教学语言,英语只是一门课程。公立学校虽然由国家出资,但是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仍需缴纳学费和课本费。即便如此,公立学校的教学师资和教学水平都难以保证,因此学生多来自中下阶层。

在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鼓励私人办学。私人学校教学条件设备优良,师资优秀,学费昂贵,学生大多数来自中上阶层。这类私立学校采用西式教学,引进国外课文,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而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独立于政府,由宗教组织或私人管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是其主要的教学语言,学生免费入学,甚至还无偿提供课本、食物、住宿、衣物,有些还提供免费医疗。因此宗教学校对贫困的普通民众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学生主要来源于巴基斯坦的社会下层,一定程度上是穷人的学校。

在巴基斯坦这三类学校的教学语言明显不同,这也导致了这三种教育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不平等。

(四) 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秩序

周明朗指出“在合理的、稳定的多语秩序中,每个等级的语言都有自己的位置,各种不同等级的语言各有所责,各司其职”(48)。根据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的流行度和中心度可以看出,巴基斯坦的高阶语言为英语和乌尔都语,中阶为旁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和俾路支语这些主体民族语言;低阶语言为其他的59个少数民族语言。如表1所示,这几种主要语言的声望呈现由大到小,逐渐变弱的趋势。虽然乌尔都语贵为国语,但英语作为精英阶层的象征,

声望最高；乌尔都语作为国家认同的象征，是国内的通用语言；旁遮普人、信德人、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在各自省内和族群内都广泛使用着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族际交流；其他 59 个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语言活力指数较低，声望值排在最后。

表 1 巴基斯坦主要语言及其作用

语种	作用	声望趋势
英语	国际通用语、精英阶层的象征	
乌尔都语	国语，国家认同的象征	
旁遮普语、普什图语、信德语、俾路支语	主要的民族语言，民族身份象征，族际交流工具	
其他 59 个少数民族语言	少数民族群的交流工具	

四、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特点

（一）通过语言认同来增进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国家凝聚力

从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的地位、本体和习得规划上都不难看出，在宏观层面上，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一直都在强化乌尔都语国语的地位。政府通过立法来确定乌尔都语至高无上的国语地位；通过推进乌尔都语词汇的科技化和计算机化进程来推动乌尔都语和国际语言接轨；在公立学校明确将乌尔都语作为教学语言；巴基斯坦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战斗报》、《时代之声报》和巴基斯坦电视有限公司的节目都使用乌尔都语作为媒体语言。这些举措都促进了乌尔都语的发展。乌尔都语虽然只是少数人的母语，但由于国家层面的不断支持，其国语地位被牢牢地确定下来。在与英语的博弈中，虽然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态度左右摇摆，但是乌尔都语相对于国内其他民族语言，其地位在建国以后得到不断加强，成为巴基斯坦国内最具权威的通用语言。

这也反映了巴基斯坦的语言意识形态：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乌尔都语地位的不断强化，有利于培养巴基斯坦国民共同体意识，通过语言增进民众对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同时也可以弥合宗教、地区和族群矛盾带来的分歧，促进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英语在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重视英语，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之一，独立后的巴基斯坦仍然将英语作为其行政语言，用于政府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政府人士、国内事务、法院，以及国家的领导阶层都通过英语来处理公务（满在江等 16-20）。虽然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乌尔都语的发展和推广，以维护联邦政权和国家团结，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在这些显性的语言政策之外，英语的语言地位却未被削弱。在巴基斯坦社会中，英语始终

与权力、地位、财富联系在一起。精英阶层表面上制定和推广乌尔都语，树立国语的地位，但是暗地里却抵制乌尔都语。“很多精英阶层甚至乌尔都语团体的领导者都倾向于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英语）学校就读”（官忠明、王锐俊 64）。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英语作为全球语言地位的上升及巴基斯坦公立教育的不如人意，很多中产阶级甚至并不富裕的家庭的父母们，也竭尽全力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就读。巴基斯坦民众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强化了英语的地位，以期后代有更好的工作前景。

五、启示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国界相连，睦邻友好。两国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在对巴基斯坦的语言状况 and 语言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笔者也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为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更多的语言助力。

（一）通过语言认同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作为南亚的重要国家，巴基斯坦历届政府不断提升乌尔都语的国语地位。通过乌尔都语的普及和教育促进和增加巴基斯坦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在民族统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分歧和冲突，增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通过语言这个纽带，打造巴基斯坦民众的国民意识。

目前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尚未完全普及。《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村普通话水平显著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我国有些较为偏僻的民族地区，如新疆南疆地区，还存在着只能用本民族语言交流，不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现象。这一现象有可能被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打着所谓“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号，刻意强调和夸大本民族语言的地位，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因此，我国要不断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通过语言认同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二）培养多语种外语人才，对接“一带一路”发展

加大对巴基斯坦语言生态的研究，培养多语言人才，对接“一带一路”发展，实现“语言铺路”“语言搭桥”。通过梳理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状况，不难看出该国语言生态丰富，语种多样。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国家，中巴经济走廊更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因而对巴基斯坦的语言人才储备，除了其国家语言乌尔都语外，还应储备普什图语、俾路支语和旁遮普语等这些族际交流语言人才，这样才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中达到“民心相通”的目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增强语言文字服务能力，使

语言文字工作更加适宜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求，并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语言学习和实用的需求”。因而，国内语言学界应加强对巴语言状况、文化状况的研究及语言人才的培养工作。要积极培养既了解中国国情又熟悉巴基斯坦文化的高端复合型语言人才，为“一带一路”倡议做好语言人才的储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投资不断加大，中方人员在与巴基斯坦员工的交流中，出现明显“水土不服”，主要表现在语言不畅和文化不通融方面，这些都对语言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时期的新要求。目前我国开设乌尔都语专业的院校不足10所，每年的毕业人数不足百人，且不是每年连续招生；除了我军有为数不多的通晓普什图语、旁遮普语和俾路支语等语言的人才以外，全国通晓上述语种的人才凤毛麟角，难以适应新时期语言人才的需求。

针对上述情况，首先应在教材更新上加大力度，加快教材开发的速度，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其次更新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针对有需求的企业研发不同层次的语言课程和文化课程，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再次重视师资的培养，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加快师资队伍的培养，以保障教学质量的稳定。

（三）增加领域语言研究，提高语言产业服务能力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不断推进，中国和巴基斯坦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领域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入，如连接中巴两国的喀喇昆仑公路的升级改造工作、投资超过20亿美元的塔尔煤电项目、中国三峡公司与巴旁遮普省签署的卡洛特水电站项目、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大沃风电项目、中国特变电工投资建设的真纳太阳能发电站项目，等等。

但是由于对巴基斯坦各省地方政府法律政策的不了解，对巴国语言文化背景的知识掌握不足，在不同地区的建设项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沟通障碍，导致项目受阻。语言学界应加大力气开展针对巴基斯坦不同经济领域的语言服务工作。我国学者沈骑提出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应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语言文化培训、语言智力支持和语言研究助力三个方面服务，在跨文化语言培训、不同领域的语言培训、语言咨询和语言翻译等方面来扫除语言、文化障碍（42）。

虽然中巴两国历史发展轨迹和现实国情不同，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也各不相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巴基斯坦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的梳理可以为我国处理好语言国情、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巴基斯坦与我国的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全面细致地了解巴基斯坦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有助于促进两国互联互通和人文交流。

注释 [Note]

[1] 数据来源: 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巴基斯坦。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ooper, L. Robert.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P, 1989.
- Guan, Zhongming. "On One of Linguistic Issues of Pakistan since Her Independence."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 no. 1, 2002, pp. 59-62. [官忠明:《巴基斯坦独立后语言问题之一》,载《南亚研究季刊》2002年第1期,第59-62页。]
- Guan, Zhongming, and Ruijun Wang. "Language Planning and Controversy in Pakistan since Its Independence." *All-round Southeast Asia*, no. 7, 2004, pp. 60-64. [官忠明、王锐俊:《巴基斯坦独立后的语言规划及纷争》,载《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7期,第60-64页。]
- Haarmann, Harald.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Ligh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no. 1, 1990, pp. 103-36.
-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tanford UP, 1972.
- Huntington, P.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Xinhua, 2007.
- Jinnah, M. *Jinnah: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1947-1948*. Oxford UP, 2000.
- Kong, Liang. *The Overview of Pakistan*. World Publishing, 2016. [孔亮:《巴基斯坦概况》。广州:世界图书出版社,2016。]
- Liu, Chengqiong. "Pakistan's English Languag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 no. 6, 2003, pp. 72-76. [刘成琼:《巴基斯坦的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学》,载《南亚研究季刊》2003年第16期,第72-76页。]
- Man, Zaijiang, et al. "Language and Nation in Pakistan." *Journal of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 2011, pp. 16-20. [满在江等:《巴基斯坦的语言与民族关系探析》,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6-20页。]
- Shen, Qi, and Tian Xia. "Fundamental Issues of Languag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itiatives.'"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 2018, pp. 36-43. [沈骑、夏天:《“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的基本问题》,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36-43页。]
- Tian, Sha.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Pakistan on Belt and Road View."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no. 24, 2017, pp. 1-6. [田莎:《“一带一路”视角下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研究》,载《高教学刊》2017年第24期,第1-6页。]
- Zhou, Minglang. "Language Ideology and Order: Globalization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US and China."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1, 2009, pp. 45-52. [周明朗:《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全球化与美中两国的多语(教育)战略》,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45-52页。]

◇责任编辑:易佳

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的习得影响研究

◎ 陈敏哲 侯芳 钟峰婷

内容摘要: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比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更有利于英语语法教学。本文基于互动假设,采用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习得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使用不同的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时,初中生对英语一般过去时感知效果不同,后测结果差异明显。后测中的写作产出结果显示,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一般过去时产出能力的影响优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尽管即时后测的结果表明内隐和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效果无明显差异,但是延时后测结果显示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优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

关键词: 一般过去时 内隐/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 感知效果 产出能力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2-0144-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英语语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湘教通[2015]291号);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基于FonF教学法的英语动词实证研究”(16WLH25)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广州市番禺区毓贤学校,广东 广州 510630

Title: Effects of the Pre-emptive FoF Instruction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English Simple Past Tense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xplicit pre-emptive FoF instruction (EPFoFI) is more effective in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an the implicit pre-emptive FoF instruction (IPFoFI).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Hypothesis, this paper studies EPFoFI's and IPFoFI's effect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English simple past ten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PFoFI's and IPFoFI's effects on the subjects' perception of English simple past tense are different. The results of the writing post-test indicate that the subjects' production proficiency of English simple past tense under IPFoFI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under EPFoFI. Although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ost-test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simple past tense under the two instruc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delayed posttest tell that the effects of IPFoFI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EPFoFI.

Keywords: simple past tense, explicit / implicit pre-emptive FoF instruction, perception, production proficiency

Author: Minzhe Chen,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Fang Hou, Ph. 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Fengting Zhong, Yuxian School,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自1964年教育部确定英语为中学第一外语以来,英语课堂教学方法发生了许多变化,英语语法课堂教学方式也因此产生诸多转变。概言之,先后出现了3种主要的英语语法课堂教学方法:PPP法(Present-Practice-Produce Instruction)、过程法(Processing Instruction)和形式聚焦法(Focus on Form Instruction, FoFI)。

PPP法易操控、易评价,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英语语法课堂教学方法^[1],其理论基础是信息加工理论^[2]和技能学习理论^[3]。前者认为语言学习就是加工输入的文本,然后进行理解和产出;后者认为技能学习就是将有关规则和系统的显性知识(陈述性知识)转化为运用规则和系统的技能(程序性知识)(Anderson 369-406)。此教学法中,教师首先向学生讲解某个语法知识点,随后针对该语法知识点要求学生做口头和笔头操练,最后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交际活动机会,并要求他们在交际活动中尽量使用该语法知识点,提升使用的自动性和准确性(DeKeyser, "Beyond Explicit Rule" 195-211; Doughty and Williams 49; Norris and Ortega, "Effectiveness" 500; Sheen 226; Larsen-Freeman, "On Dynamism" 51-63)。现在对该教学法的批评,主要来自学者们对“惰性知识问题”的认识,即学生们明白了语法规则,但在实际交际中却不能自动地使用这些规则(Ellis, "The Structural Syllabus" 91-113; Larsen-Freeman, *Teaching Language* 100-104; DeKeyser, "Introduction" 1-18; Tomlinson 1-31)。

过程法旨在帮助外语学习者克服“很难同时自动地兼顾意义和形式”的问题(VanPatten, "Attending" 287-301),改变阻碍外语学习者准确理解输入文本的加工策略,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输入文本理解加工策略。该法包含3个关键要素:1)提供特定目标语法形式清晰易懂的信息;2)明白易懂地讲解实施某种加工策略会导致学习者错误地理解输入文本;3)使用结构性输入活动(VanPatten, "Attending" 287-301; *Input Processing and Grammar Instruction* 67-70; "Input Processing in Second" 5-32; "Input Processing in Adult Second" 115-35; Ellis and Shintani 121-23)。过程法对一些概念的属性特征界定比较模糊,如对输入文本的“意义”(meaning)或是“有意义”(meaningful)、输入文本加工、输入文本的句法分析递增等概念缺乏清晰界定(Carroll, "Putting 'Input' in Its Proper Place" 337-88; *Input and Evidence* 1-36, 65-118, 260-73; "Some Comments" 297-314; DeKeyser et al. 805-23; Harrington, "Second Language" 91-124; "Commentary" 81-94),使得该方法在教学中较难操作,变量较难控制,评价不易,不如PPP法运用广泛。

形式聚焦法以交际教学法为基础,重视处理输入文本意义,比过程法更系统地关注语言形式,不会干扰学习内容,因此能够加快外语学习者的习得进程,提升其最终的外语习得水平(Long, "A Design Feature" 45-47)。典型的形式聚焦法包括:输入强化法,即通过视觉强化(如彩色文字、下划线、黑体字等)、听觉强化(如口头重复等)等具体形式实现(Sharwood 165-79; Wong 109-32);针对性的大量输入(Input Flooding),即大量输入包含某一特定语法形式的语篇(Mackey and Gass 173);可理解输出,即迫使学习者从语义加工过程推进到句法

加工过程, 产出可理解的语篇, 习得者在此过程中, 会注意到自己原先不知道的或一知半解的语言形式特征, 甚至发现自己的错误 (Swain, “Communicative” 235-53, “Three Functions” 129; White 85-113; Long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184-88; Swain and Lapkin 99-118; Shehadeh 155-71; Toth 319-95; Long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373-94; de Graaff and Housen 737; Shintani 36-62; Ellis and Shintani 17-20)。

国内外对于形式聚焦法的研究偏重理论延展, 实证研究大多着眼于形式聚焦法与全形式法 (Focus on Forms Instruction, FoFs) 对比。例如, 洪炜、王丽婧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显示, 全形式法中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效果更显著 (264-75)。另一些研究关注外显形式聚焦法, 发现显性教学方式比隐性教学方式更适合于我国的二语教学 (李清平 399-407; 李菲、孙云梅 447-58, 481), 任务前形式聚焦法好于任务后形式聚焦法 (徐锦芬、李颀颖, 《任务前后语言形式》 74-80)。本文基于互动假设, 探讨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法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习得的影响。

一、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及其应用研究

(一) 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的基本概念

罗昂 (M. Long) 和鲁滨逊 (P. Robinson) 首先区分了全形式法 (FoFsI)、意义聚焦法 (focus on meaning Instruction, FoMI)、形式聚焦法 (FoFI) 在教学中的不同 (15-23); 形式聚焦法由互动假设驱动, 兼顾形式与意义, 在英语语法课堂教学中方兴未艾。互动假设认为, 二语习得过程既不能单纯用语言先天论, 也不能纯粹用环境论进行解释。环境对习得的贡献在于, 通过选择性关注和发展二语加工能力, 使得二语学习者进行调整, 并且该调整在意义构建过程中, 虽非充分条件, 但却是必要条件 (Long, “Input, Interaction” 259-78; “The Role” 414; Mitchell 679)。由于“形式聚焦”这个术语的理解和应用可以有多种方式, 形式聚焦法被进一步分为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 (Pre-emptive FoFI, 或 Planned FoFI) 和反应形式聚焦教学法 (Reactive FoFI, Incidental FoFI) 两个大类, 前者是预先选择相关内容进行聚焦, 后者则需要教学者密切关注习得者在习得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及时解决。在此基础上, 依据显性或隐性教学方式, 可以进一步分为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外显反应形式聚焦教学法和内隐反应形式聚焦教学法 4 个小类 (Doughty and Williams 198; Ellis,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ing* 271-306)。

(二) 相关实证研究回顾

近年来, 各种聚焦形式的教学法成为了外语习得研究者和外语教师的研究热点。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 一些研究试图通过检验基于产出和输入的语法教学有效性, 来验证

二语习得的技能培养和输入处理模型的理论主张，一部分研究则探讨纠错问题。这一时期，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研究理解性问卷调查（Ellis, *Form Focused 2*）。

诺瑞斯（J. M. Norris）和奥尔特加（L. Ortega）（“Effectiveness” 417-528）对1980—1989年间学者们应用形式教学法进行语法教学的49项实验和准实验结果进行梳理，发现外显教学比内隐教学更有效，但形式聚焦法与全形式法的教学效果差异甚微。该研究还发现，在后续课堂教学实验中，显性形式教学占据主导地位，多数实验只聚焦外显教学，不注重对内隐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探究。

埃利斯（Rod Ellis）等学者深入研究了不同形式聚焦教学中反馈的作用^[4]，他们认为反应形式聚焦法包含外显性和内隐性两种纠正性反馈。重构（recast）是内隐性反馈的常见方式，其缺点是干扰性较大，易分散习得者注意力，损害语言交际的流畅性；外显性反馈具有多种实施方式，能够引导习得者注意正确的语言形式，不过却易将交际活动转化为语言获取活动。总体而言，相对学习者外显知识，纠正性反馈对学习者的内隐知识影响更大。前摄形式聚焦教学过程中，通常通过学生向教师提问，引发教学反馈。提问虽然能弥补学生语言知识不足，但却易削弱交际活动，并且提问学生的知识缺陷并不能代表全班学生都有类似的知识缺陷，因此其他学生可能从教师反馈中获益甚微，甚至一无所获。也有学者通过实验证明，运用前摄形式聚焦法，习得者的外语产出能力更好^[5]；还有一些学者集中研究了形式聚焦教学法对成人学习者的外语语法判断能力、口语模仿能力、元语言测试等方面的影响^[6]。

国内形式聚焦法教学研究前期集中在理论综述，如俞洪亮和林梅等人梳理相关理论、定义，探讨形式聚焦法教学的形式、特点及局限，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7]。刘逸峰从哲学视角阐释胡塞尔（E. Husserl）将前摄视为时间意识意向性，指出滞留的意向性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对过去的前摄意向性保持，为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提供心理及理论支撑（24-30）。后期相关实证研究或注重任务后语言形式聚焦，如李茜研究任务类型及任务频次对产出的影响（42-48）；或侧重任务形式聚焦教学，如徐锦芬、李昶颖对任务前后差异的对比（《任务前后语言形式》74-80）；或偏重显性教学，如李菲、孙云梅关于虚拟语气习得的研究（447-58，481）。研究受试集中度较高，除少部分为教师群体（曹丽梦、朱勇 18-27；徐锦芬、李昶颖，《初中英语教师》12-18）之外，其它大部分实验集中在大学生群体（Gao 46-48）或成人学生为主体（周殿军 126-29）。

此外，国内将形式聚焦教学法较少应用于语法教学，研究项目仅涉及词汇、语用和口语教学（陈中毅 22-28），缺乏对中学生的外语习得研究，尤其是以初中生的英语语法教学情况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我们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运用高级检索方式，查找我国学者近20年来研究形式聚焦发表的论文^[8]，共获得满足条件的论文43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仅为9篇，没有1篇以中学英语教学为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针对中学生英语学习的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效果，国内外的专项实验研究很少，

论述学习者产出能力和感知效果差异的更少。因此,本研究以八年级学生英语一般过去时习得为研究对象,尝试回答以下3个问题:(1)外显和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Explicit / Implicit Pre-emptive FoF Instructions, EPFoFI / IPFoFI)对初中生习得英语一般过去时的感知效果产生了什么影响?(2)两种形式聚焦教学下初中生习得英语一般过去时的产出能力有何不同?(3)两种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习得英语一般过去时存在哪种时效差异?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国内某中学八年级学生进行实验,这些受试来自两个平行班,A班52名学生,B班53名学生,共计105名受试参与该项实验。受试均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具备一定的英语知识和能力。两班由同一位英语教师上课,采用相同的英语教材,两个平行班分别作为外显组(EPFoFI G)和内隐组(IPFoFI G)。整个实验周期中,其英语课程分别采用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法(EPFoFI)和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IPFoFI)。英语前测成绩表明,两组受试间英语水平差异不显著($p=0.838>0.05$)。

实验前,根据初中生学习特点和《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版)对英语语法项目的要求,认真筛选研究项目。我们发现,尽管八年级学生小学时就学习过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但是因汉语(母语)缺乏与英语(目的语)对应的时态屈折标记,学生缺乏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造成理解错误;在语言产出过程中,母语负迁移现象频繁出现,一方面忽略英语过去时屈折标记,另一方面则过分依赖过去时间状语的存现,语言产出的准确性大打折扣。

本实验持续8周,每周3次,每次15分钟,学习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在参加实验前、8周实验后,受试各参加1次测试,并在实验结束3周后,进行1次延时测试。3份测试卷测试项目相同,均包含20道单项选择、15道填空和1道写作题。为使受试不易揣度测试目标,每套试卷均设计5道单项选择题和5道填空题作为干扰项。单项选择题主要针对学生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在20道单项选择题和15道填空题中,15道题有明确的时间状语,20道题无明确时间状语,目的是考察受试对一般过去时标记存现的依赖程度。填空题和写作题考测受试一般过去时的产出能力,为使相关项评判一致,这2部分均由同一位教师评阅。测试时长每次60分钟,总分为50分。

数据分析阶段,我们将前后测中包含时间状语的试题单列出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写作成绩以15分计,进行四表格卡方检验,总成绩以50分计,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上相关分析由Spss 25.0和Excel 2016进行,数据由软件直接导出。

三、结果与讨论

(一) 习得者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差异

实证研究中, 习得者自身感知能力是影响习得的重要因子之一。在充分考虑受试英语理解能力的基础上, 依据试题中是否有时间状语, 对相关测试题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以探究习得者对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差异, 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外显组和内隐组一般过去时感知能力测试结果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类型		外显组 (n=52)			内隐组 (n=53)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 (双尾)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 (双尾)
前测	1	.6206	.17775	.000	.5285	.13861	.010
	2	.3952	.12920		.4557	.14665	
后测	1	.8804	.09206	.014	.8892	.10196	.119
	2	.8548	.08980		.8528	.13460	

表 1 中, 均值为百分比, 即测试中所包含时间状语的选择题和填空题的得分比例。表 1 显示, 外显组和内隐组在前测 1 (含时间状语的试题) 的得分比例分别为 62.06%、52.85%, 在前测 2 (不含时间状语的试题) 的得分比例分别为 39.52%、45.57%; 在后测 1 (含时间状语的试题) 的得分比例分别为 88.04%、88.92%, 在后测 2 (不含时间状语的试题) 的得分比例分别为 85.48%、85.28%。外显组实验前 $P=.000<.050$, 证明有无时间状语对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影响差异显著; 外显组实验后 $P=.014<.050$, 数据显示: 实验后有时间状语对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影响依然显著, 然而实验后, 受试对无时间状语的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却有了极大的提升。内隐组实验前 $P=.010<.050$, 证明有无时间状语对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实验后 $P=.119>.050$, 表明有无时间状语对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能力不存在显著影响。上述数据显示, 无论试题中是否有时间状语, 两组受试在实验后, 对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都提高了。

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后, 无时间状语的试题得分均值, 外显组高于内隐组 (.8548>.8528), 而实验前内隐组高于外显组 (.4557>.3952); 实验前, 有时间状语的试题得分均值, 外显组高于内隐组 (.6206>.5285), 而实验后内隐组高于外显组 (.8892>.8804)。据此我们认为, 此次实验后, 无论有无时间状语, 所有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能力都有显著提高。其中, 有时间状语时, 内隐组感知能力上升更显著; 无时间状语时, 外显组的感知能力提高更显著。这也许是因为前摄概念涵盖了时间意识的意向性 (刘逸峰 24-30), 使得无论哪种前摄形式聚焦教

学都有利于提高受试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 增进了受试对该项目的理解。同时, 两组受试对有无时间状语感知能力的差异, 也体现出前摄概念下, 各自时间意识意向性的不同, 难分伯仲。

(二) 习得者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产出能力差异

为研究习得者一般过去时产出能力实验前后的变化, 我们将写作试题得分单独列出, 进行卡方检验, 具体比较结果见表 2。

表 2 外显组和内隐组产出能力前、后测结果卡方检验

时间	组别	正确产出	错误产出	总产出
前测	外显组	230	282	512
	内隐组	249	289	538
	总数	479	571	1050
		显著性=0.658		$X^2=0.196$
后测	外显组	440	111	551
	内隐组	480	85	565
	总数	920	196	1116
		显著性=0.025		$X^2=5.013$

表 2 显示, 前测中外显组正确产出数 230, 错误产出数 282, 错误产出高于正确产出; 内隐组正确产出数 249, 错误产出数 289, 错误产出大于正确产出。两组卡方检验 $P=0.658>0.05$, 说明实验前, 两组受试产出能力差异性不显著。后测显示, 内隐组正确产出数 480, 错误产出数 85, 正确产出数大幅超过错误产出数; 外显组正确产出数 440, 错误产出数 111, 正确产出数也大幅超过错误产出数。两组产出数据对比, 内隐组的正确产出数高于外显组, 而错误产出数低于外显组。这表明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习得者产出能力有良好的影响。最后 $P=0.025<0.05$, 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

上表显示, 内隐形式教学组受试产出效果高于外显形式教学组。本组数据对比与诺瑞斯和奥尔特加 (“Effectiveness” 417-528) 的研究结论相悖, 即外显形式教学优于内隐形式教学。可能的解读是, 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强调输入, 且过程中未干预习得者的自我习得过程, 让受试有更多时间, 根据不同的语境和语义表达需要, 主动注意到动词一般过去时的形态变化, 从而摆脱对时间状语存现的依赖。在此过程中, 习得者逐渐学会将一般过去时的形式与其意义、功能结合起来, 形成对语言形式的准确理解。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中, 尽管输出有利于习得者注意并反思语言形式, 进而利于特定目标的综合加工 (李清平 399-407), 但是若受试口语反馈积极, 教学者容易忽视受试对教学内容的真实习得程度, 从而导致产出能力差异。不过,

本研究没有研究任务类型和任务频次对习得者一般过去时产出构成的影响。

此外,产出与理解练习的相对有效性既取决于问题结构的形态句法复杂性,也取决于练习与测试之间的时延长度;输入练习有利于综合技能的发展,输出练习有利于产出技能的发展(DeKeyser and Sokalski 82)。本研究表明,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输入较多,受试的综合能力提升,产出技能也相应提高,从而产生了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受试的差异。

(三) 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法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教学效果的对比

为更好理解实验后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法对受试习得一般过去时的整体影响,我们对外显、内隐组的三次测试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总体样本的描述性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外显组和内隐组一般过去时习得总分描述性数据统计结果

时间	组别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前测	外显组	52	17.211	4.55613	.63182
	内隐组	53	17.0377	4.14154	.56888
即时后测	外显组	52	30.3654	2.79375	.38742
	内隐组	53	30.3962	3.83977	.52743
延时后测	外显组	52	27.3077	4.33200	.60074
	内隐组	53	28.8302	3.0111	.41361

整体而言,受试一般过去时习得水平在实验后明显呈上升趋势。与即时后测结果相比,延时后测结果显示受试一般过去时掌握程度变化幅度不大,但两项测试的结果与前测结果相比均有大幅提升。

实验前,外显组前测均值为17.211,标准差4.55613;即时后测中,均值为30.3654,增长了13.1544;延时后测中,均值为27.3077,较前测增加了10.0967,相较即时后测下降了3.0577。这说明外显组实验后,受试对一般过去时的习得水平有所提高,且延时后测持续增长。外显组标准差从4.55613、2.79375到4.33200,这表明习得者的一般过去时习得水平整体提升,但其内部离散程度未发生明显变化。

实验前,内隐组前测均值为17.0377,标准差4.14154;即时后测中,均值为30.3962,上升了13.3585;延时后测均值为28.8302,较前测增加了11.7925,相较即时后测下降了1.566。这表明实验后,内隐组的一般过去时习得水平有明显提高,且延时后测持续增长。内隐组标准差从4.14154、3.83977到3.0111,说明习得者的一般过去时习得水平在整体提升情况下,习得者内部离散程度也未发生显著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内隐组和外显组实验前测均值差别细微,且内隐组均值略低于外显组。

然而，不论是即时后测还是延时后测，内隐组成绩均值均略高于外显组。为进一步说明其中差异，我们对此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4），分析两组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4 外显组和内隐组一般过去时习得总分独立样本 T 检验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F	Sig.	t	df	Sig.(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前测	假设方差齐性	.024	.878	.204	103	.838	.17380	.84942
	假设方差不齐性			.205	107.673	.838	.17380	.85019
即时	假设方差齐性	5.628	.020	-.047	103	.963	-.03084	.65637
	假设方差不齐性			-.047	95.041	.963	.03084	.65443
延时	假设方差齐性	5.928	.017	-2.094	103	.039	-1.52250	.62692
	假设方差不齐性			-2.087	90.800	.040	-1.52250	.72936

表 4 显示，外显组和内隐组前测 $t=.204$ ，取方差齐性 P 值，其 $\text{sig}=.838$ ，显示两组水平无差异。即时后测中 $t=-.047$ ，应取方差不齐性 P 值， $\text{sig}=.963$ ，体现两组水平在实验后差异不显著。不过，即时后测中内隐组均值略高于外显组，且延时后测中 $t=-2.094$ ，取值 $\text{sig}=.040$ ，两组存显著性差异。与此同时，外显组在延时后测中，比内隐组下降幅度大，内隐组延时测试均值高于外显组。

这个研究结果与一些学者所持的“显性教学比隐性教学更有效”观点不一致（Norris and Ortega, “Type of Instruction” 157; 席加蕾 147-48），但与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如周殿军相近，他认为隐性教学在学生的成绩均衡方面要优于显性教学（126-29）。陈中毅则认为只有极端隐性的 FoFi 具有长期效果（22-28）。由此看来，显性教学方法与隐形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问题，还有待进一步通过实验来验证。但是我们推测，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教学中受试习得一般过去时的延续性高，这可能源于学习任务聚焦性强，并能引发习得者关注，因而易被习得者吸收掌握。同时学习过程中，附加了适当教学诱导及反馈，习得者内驱动能更高，习得结果也更好。

本研究采用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法进行教学实验，实验对象为八年级学生（初中二年级），教学内容为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研究表明：虽然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和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实验后即时测试结果无明显差异，但是延时后测结果却显示二者差异明显。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教学效果优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法。研究结果还显示，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对受试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产出能力和感知能力方面效果更好。另外，当语境中有时间状语时，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的教学效果好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法；当语境中无时间状语时，则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法的教学效果好于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此外，

教学过程中激发习得者内驱力,保持其学习兴趣,都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关切。本研究尚存一些不足,比如样本量过小,只有两组,共计105人。一些影响因子未作考量,如受试性别、学习基础、测试方式等。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实验还可采取三组研究,同时增添不同测试方式,并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方能使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实证研究更深入。

注释 [Notes]

- [1] 参见 M. Celce-Murcia and S. Hilles, *Techniques and Resources in Teaching Grammar*. Oxford UP, 1988, pp. 27-37; P. Ur, *Grammar Practice Activities: A Practical Guide for Teachers*. Cambridge UP, 1988; P. Skeha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UP, 1998.
- [2] 参见 R. Atkinson and R. Shiffrin, "Human Memory: A Proposed System and Its Control Processes."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2)*, edited by K. Spence and J. Spence, Academic, 1968, pp. 89-195.
- [3] 参见 Stuart E. Dreyfus and Hubert L. Dreyfus, *A Five-Stage Model of the Mental Activities Involved in Directed Skill Acquisition*. Storming Media, 1980.
- [4] 参见 R. Ellis, et al., "Doing Focus-on-form." *System*, vol. 30, no. 4, 2002, pp. 419-32; R. Ellis, et al., "Implicit and Explicit Corrective Feedback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2 Grammar."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 28, no. 2, 2006, pp. 339-68.
- [5] 参见 J. Gholami and S. Aliyari, "The Impact of Planned Preemptive Focus on Form on Iranian EFL Learners' Essay Writing 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agogies and Learning*, vol. 10, no. 3, 2015, pp. 234-45.
- [6] 参见 Sasan Baleghizadeh, "Focus on Form in an EFL Communicative Classroom." *Novitas-ROYAL (Research on Youth and Language)*, vol. 4, no. 1, 2010, pp. 119-28; L. Gholami, et al., "Formulaic Focus-on-form Episodes in Adult EFL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s." *System*, vol. 68, 2017, pp. 72-86.
- [7] 参见俞洪亮:《国外以形式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研究:历史与现状》,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4期,第1-8页;林梅等:《国外“形式聚焦”理论综述》,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4期,第82-87页。
- [8] 设定的检索条件如下:(1)查询范围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信息科技”和“经济与管理科学”这5类论文;(2)2000—2019年发表的论文;(3)论文的篇名且关键词中包含有“形式聚焦”;(4)文献来源任选:匹配方式为模糊匹配;(5)检索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nderson, J. C. "Acquisition of Cognitive Skill."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89, 1982, pp. 369-406.
- Cao, Limeng, and Yong Zhu.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SL Teachers' Use of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no. 3, 2017, pp. 18-27. [曹丽梦、朱勇:《对外汉语教师形式聚焦教学个案研究》,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017年第3期,第18-27页。]
- Carroll, S. "Putting 'Input' in Its Proper Place."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no. 15, 1999, pp. 337-88.
- . *Input and Evidence: The Raw Material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enjamins, 2001.
- . "Some Comments on Input Processing and Processing Instruction." *Processing Instruc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edited by B. VanPatten, Lawrence Erlbaum, 2004, pp. 297-314.
- Chen, Zhongyi.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tudies on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 *Journal of*

-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4, 2016, pp. 22-28. [陈中毅:《国内形式聚焦教学研究综述(2003—2018)》,载《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2-28页。]
- de Graaff, R., and A. Housen.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and Effectiveness of L2 Instructio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Teaching*, edited by M. Long and C. Doughty, Blackwell, 2009, pp. 726-55.
- DeKeyser, R. M. "Beyond Explicit Rule Learning: Automatizing Second Language Morphosyntax."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 19, no. 2, 1997, pp. 195-221.
- . "Introduction: Situating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Practice in a Second Language: Perspectives from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edited by R. M. DeKeyser, Cambridge UP, 2007, pp. 1-18.
- DeKeyser, R. M., and Karl J. Sokalski. "The Differential Role of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From Focused Instruction &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edited by Rod Ellis, Blackwell Science, 2001, pp. 81-112.
- DeKeyser, R. M., et al. "What Gets Processed in Processing Instruction? A Commentary on Bill VanPatten's 'Update.'" *Language Learning*, vol. 52, no. 4, 2002, pp. 805-23.
- Doughty, C. J., and J. Williams, editors. *Focus on Form in Classroom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UP, 1998.
- Ellis, Rod. "The Structural Syllabu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ESOL Quarterly*, vol. 27, no. 1, 1993, pp. 91-113.
- .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and Language Pedagogy*. Blackwell, 2012.
- Ellis, Rod, and N. Shintani. *Exploring Language Pedagogy through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Routledge, 2014.
- Gao, S. "Focus on Form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vol. 2, no. 2, 2009, pp. 46-48.
- Harrington, M. "Second Language Sentence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edited by P. Robinson, Cambridge UP, 2001, pp. 91-124.
- . "Commentary: Input Processing as a Theory of Processing Input." *Processing Instruc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edited by B. VanPatten, Lawrence Erlbaum, 2004, pp. 81-94.
- Hong, Wei, and Lijing Wang. "The Role of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in CSL Vocabulary Learn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cus on Form' versus 'Focus on Forms.'"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no. 2, 2016, pp. 264-75. [洪炜、王丽婧:《Focus on Form和Focus on Forms两种教学法对汉语二语词汇学习的影响》,载《世界汉语教学》2016年第2期,第264-275页。]
- Larsen-Freeman, D. *Teaching Language: From Grammar to Grammaticing*. Thomson / Heinle, 2003.
- . "On Dynamism of Grammar in Contextualizing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China*, vol. 2, 2006, pp. 51-63.
- Li, Fei, and Yunmei Sun. "Effects of Different Explicit Instructions on the Learning of Subjunctive Mood by EFL Learners: A Depth-of-processing Per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3, 2019, pp. 447-58, 481. [李菲、孙云梅:《不同显性教学方式对EFL学习者虚拟语气学习的影响:基于加工层次理论的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3期,第447-458,481页。]
- Li, Qian. "Effects of Task Type and Task Frequency on EFL Learners' Oral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Post-task Focus on Form."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6, 2015, pp. 42-48. [李茜:《任务类型及任务频次对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影响——以任务后语言形式聚焦为情境》,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第6期,第42-48页。]
- Li, Qingping. "Effects of Instru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FL Learners'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 4, 2009, pp. 399-407. [李清平:《教学导引对英语学习者的社交语用能力发展的影响》,载《现代外语》2009年第4期,第399-407页。]
- Liu, Yifeng. "On Protention as Intentionality of Tim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 2018, pp. 24-30. [刘逸峰:《论前摄作为时间意识的意向性》,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24-30页。]
- Long, M. H. "Input,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379, Dec. 1981, pp. 259-78.

- . “Focus on Form: A Design Fea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K. de Bot, et al., John Benjamins, 1991, pp. 39-52.
- .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dited by W. C. Ritchie and T. K. Bhatia, Academic, 1996, pp. 413-68.
- . “Focus on Form in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Policy and Pedagogy: Essays in Honor of Ronald Walton*, edited by R. D. Lambert and E. Shohamy, John Benjamins, 2000, pp. 179-92.
- .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Teaching*, edited by M. Long and C. Doughty, Wiley-Blackwell, 2009, pp. 373-94.
- Long, M., and P. Robinson. “Focus on Form: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cus on Form in Classroom Language Acquisition*, edited by C. Doughty and J. Williams, Cambridge UP, 1998, pp. 15-41.
- Mackey, A., and S. Gass.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 28, no. 2, 2006, pp. 169-78.
- Mitchell, Rosamond. “Current Trends in Classroom Research.”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Teaching*, edited by M. Long and C. Doughty, Wiley-Blackwell, 2009, pp. 675-705.
- Norris, J. M., and L. Ortega. “Effectiveness of L2 Instruction: A Research Synthesis and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Language Learning*, vol. 50, no. 3, 2000, pp. 417-528.
- . “Does Type of Instruction Make a Difference? Substantive Findings from a Meta-analytic Review.” *Language Learning*, vol. 51, supplement 1, 2000, pp. 157-213.
- Sharwood, M. Smith. “Input Enhancement in Instructed SLA: Theoretical Ba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 15, no. 2, 1993, pp. 165-79.
- Sheen, R. “Focus on Form: A Myth in the Making?” *ELT Journal*, vol. 57, no. 3, 2003, pp. 225-33.
- Shehadeh, A. “Learner Output, Hypothesis Testing, and Internalizing Linguistic Knowledge.” *Systems*, vol. 32, 2003, pp. 155-71.
- Shintani, N. “The Effect of Focus on Form and Focus on Forms Instruction on the Acquisition of Productive Knowledge of L2 Vocabulary by Young Beginning-level Learners.” *TESOL Quarterly*, vol. 47, no. 1, 2013, pp. 36-62
- 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dited by S. Gass and C. Madden, Newbury House, 1985, pp. 235-53.
- . “Three Functions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rinciple and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edited by G. Cook and B. Seidlhofer, Oxford UP, 1995, pp. 125-44.
- Swain, M., and S. Lapkin. “Focus on Form through Collaborative Dialogue: Exploring Task Effects.” *Researching Pedagogic Task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nd Testing*, edited by M. Bygate, et al., Longman, 2001, pp. 99-118.
- Tomlinson, B. Introduction.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edited by Tomlinson, Cambridge UP, 2011, pp. 1-31.
- Toth, P. “Processing Instruction and the Role for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vol. 56, no. 2, 2006, pp. 319-95.
- VanPatten, B. “Attending to Form and Content in the Inpu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 12, no. 3, 1990, pp. 287-301.
- . *Input Processing and Grammar Instruc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blex, 1996.
- . “Input Processing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cessing Instruc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edited by B. VanPatten, Lawrence Erlbaum, 2004, pp. 5-32.
- . “Input Processing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dited by B. VanPatten and J. Williams, Lawrence Erlbaum, 2007, pp. 115-35.
- White, J. “Getting the Learners Attention: A Typographical Input Enhancement Study.” *Focus on Form in Classroom Second*

- Language Acquisition*, edited by C. Doughty and J. Williams, Cambridge UP, 1998, pp. 85-113.
- Wong, W. "The Effects of Textual Enhancement and Simplified Input on L2 Comprehension and Acquisition of Non-meaningful Grammatical Form."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 vol. 14, no. 2, 2003, pp. 109-32.
- Xi, Jialei.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Instruction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Grammar."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no. 10, 2015, pp. 147-48. [席加蕾:《英语语法隐性教学与显性教学效果对比研究》,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第147-48页。]
- Xu, Jinfen, and Changying Li. "The Effects of Pre-task and Post-task Focus on Form on Grammar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1, 2018, pp. 74-80. [徐锦芬、李昶颖:《任务前后语言形式聚焦对英语学习者语法习得影响的对比研究》,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期,第74-80页。]
- . "Research into Junior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3, 2019, pp. 12-18. [徐锦芬、李昶颖:《初中英语教师形式聚焦教学实证研究》,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3期,第12-18页。]
- Zhou, Dianjun. "Study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Grammar Instructions on Syntax Attrition."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Edition)*, no. 11, 2017, pp. 126-29. [周殿军:《显性和隐性教学对英语语法磨蚀研究》,载《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7年第11期,第126-29页。]

◇责任编辑:陈忠平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8,000~12,000字左右,综述性文章8,000字以内,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一般为4,000字左右,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邮箱: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http://wywh.cbpt.cnki.net>
6. 联系方式:电话0731-88873041,邮箱jflc@hunnu.edu.cn,公众号“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